

词学同人群的建构：《憩园词话》研究  
THE CONSTRUCTION OF A CI GROUP:  
A STUDY OF *QIYUAN CIHUA*

张园林

ZHANG YUANLIN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硕士学位论文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4

## **Acknowledgements**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ly gratitude to all the people who support and accompany me during the period of my Master study.

First, my whole-hearted thanks go to my supervisor, Associate Professor Lam Lap. I have learned so much from his patient guidance, warm encouragement and kindly help, which can never be fully expressed. I also want to extend my thanks to all the teachers and staffs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and Chinese Library, in appreciation of their kind assistance during the two years.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my friends, with whom I had such a wonderful time in NUS. Special thanks go to Han Xin, Yap Sze Sze, Zhou Liqin and Zhao Hui, for all the accompaniment, assistance and suggestions.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appreciate to my whole family, for their continuous support and understanding, especially my husband. Thank you for always being on my side, guarding me and guiding me.

Finally, I am much indebted to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 cannot focus on my Master study without the finance assistance it provided. This period will be my precious memory forever.

## 目录

Acknowledgements.....	i
Abstract.....	i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目的.....	1
第二节 文献综述.....	3
一. 咸同之际江淮地区词人研究.....	3
二. 词人群体研究.....	7
三. 群体建构和身份认同.....	9
第三节 各章内容.....	10
第二章 《憩园词话》的书写.....	12
第一节 《憩园词话》的书写目的.....	12
第二节 《憩园词话》词学观与存人存词标准.....	14
一. 《憩园词话》词学观.....	14
二. 《憩园词话》存人部分.....	17
三. 《憩园词话》中词学观与存人标准的矛盾.....	20
第三节 《憩园词话》的叙事策略.....	21
第四节 《憩园词话》中叙事情感的复现.....	26
第五节 总结.....	30
第三章 《憩园词话》词人群体的聚合.....	32
第一节 作为词学家的杜文澜.....	32
第二节 杜文澜词学交际概述.....	38
一. 词社活动.....	38
二. 唱酬活动.....	43
三. 其他活动.....	47
第三节 《憩园词话》中的词学同人网络及其“差序格局”.....	49

第五节 总结.....	58
第四章 太平天国事件在《憩园词话》中的书写.....	60
第一节 黄鹤已去，杜郎须惊——太平天国与《憩园词话》的城市形象建构60	
一. 记忆、现实与城市.....	61
二. 传统的取舍和集体记忆.....	66
第二节 东风回首，不是江南——《憩园词话》同人词作中的“昔盛今衰”	70
第三节 转徙流离，得传是编——太平天国战争中“同人”词作的整理.....	77
第四节 总结.....	80
第五章 余响与结语.....	82
第一节 《憩园词话》的余响.....	82
第二节 研究小结.....	87
附录.....	91
表一·《憩园词话》所录词人表.....	91
图一·《憩园词话》差序网络交际表格.....	99
参考书目.....	100

## Abstract

*Qiyuan Cihua* 憩园词话 (*Ci Discourse of the Leisure Garden*), written by Du Wenlan 杜文澜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reflects the social network of ci-poets in Zhejiang, Jiangsu and Hubei area during the Xianfeng 咸丰 and Tongzhi 同治 period.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purpose of “collecting his friends’ ci-poems”, over 100 ci-poets and their works are included in this ci discourse. Although these poets lived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belonged to different schools of ci, Du Wenlan still classified them as belonging to the same ci group.

Current researches tend to separate this ci group by the regions and schools, which is apparently against Du’s intention of “identifying those poets as one group”. Therefore, this thesis seeks to reveal the whole structure of the ci group mentioned in *Qiyuan Cihua*, and interpret the strategies Du Wenlan utilized to compiling it. The composition of those poets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is also used as a case to study the formation of identity among those poets.

# 词学同人群的建构：《憩园词话》研究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目的

清咸丰三年，公元 1853 年，年近 40 岁的杜文澜（字小舫，1815-1881）出任淮北监掣<sup>1</sup>。时值太平天国之乱，南京被困，江南兵戈方盛，士民流离<sup>2</sup>。蒋春霖（字鹿潭，1818-1868）时于东台任富安场大使，同时词人金安清（字眉生，1816-1878）二月亦从金陵城突围而出，汇合于两淮之地<sup>3</sup>。是时同在两淮流域的词家尚有姚辉第（字子箴，1818-?）、丁至和（字保庵，1811-1883?）、潘曾玮（字季玉，1819-1886）等人。一时两淮之地的词学活动迅速兴起，唱酬之盛，自兹而始。至同治元年（1862 年），时任两淮盐运督转的金安清至泰州组成“军中九秋词社”，江淮地区的词学活动达到顶峰，后人遂冠名这批词人为“淮海词人

---

<sup>1</sup> 冯其庸，《蒋鹿潭年谱考略，水云楼诗词笺校》（济南：齐鲁书社，2006），页 30。淮北监掣一职，参见王定安等，《重修两淮盐法志》，卷一百三十三，〈职官门·职名表〉，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八百三十五，页 365。另，本文所录词人生卒年参见朱德慈，《近代词人考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sup>2</sup> 见【清】宗湘文〈水云楼词续序〉：“同治壬戌以后，予居泰州数年，兵戈方盛，人士流离，渡江而来，率多才杰。”见冯其庸，《蒋鹿潭年谱考略，水云楼诗词笺校》，页 211。

<sup>3</sup> 其事参见冯其庸，《蒋鹿潭年谱考略，水云楼诗词笺校》，页 30。

群”<sup>4</sup>。而这一时期的活动，也成为杜文澜此后词学活动的开端。

按照惯例，后人对词人群体交际的研究往往是以派别或地域为界定的，派别本身也多以地区为名，这种“地区”多为该词派主要代表人的籍贯，或大略囊括该词派的影响范围<sup>5</sup>。派别或地域之间虽然也偶有唱酬<sup>6</sup>，然而发展为一个联系紧密的社交网络却并不多见。在这一情况下，被命为“淮海词人群”的这一批乱世孤城中文人的自娱就显现出其特殊性了：这批活跃在咸同之际两淮词坛的词家分属于不同的派别，譬如其中丁至和属于浙派，潘曾玮被认为归属于常派，而蒋春霖则被认为不被流派所束<sup>7</sup>。然而流派上的不同却并没有影响这一群体的词学交流，唱酬活动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至当事人晚年，仍不乏酬答的作品。

咸同之际两淮地区的词学活动只可谓杜文澜词学生涯的开始，而这种跨越派别的唱酬则延续了杜文澜的一生。他所接触的词人范围涵盖了其所游宦的各个区域，且和早期在淮海地区的唱和一样，这些词人或推崇吴中词派的格律之说，或追尚浙派的醇雅词风，或受常派比兴寄托影响颇深，并没有一定的流派归属。他晚年编纂的《憩园词话》中，详述了这些词人的生平交游。在这部词话的开篇，杜氏即明言其创作目的为“录友人近词”，并以“同人”统称其书中记录的这群词人<sup>8</sup>，以此为基础记述了当时词坛发生的各类唱酬及活动。

《憩园词话》中收录了大量词人资料与词坛故实，为研究者研究词学群体的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然而，正因为这一词人群体涵括地域、流派之广，研究者们往往倾向于截取词话中某一时段、某一地域或某一流派来分别研究——如上

---

<sup>4</sup> 其活动始末参见陈水云，〈咸丰、同治时期淮海词人群体综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60卷第6期，页824-830。

<sup>5</sup> 按清代著名词派阳羨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临桂词派皆以地域为名。

<sup>6</sup> 如浙西词派宗主朱彝尊即坦言受到阳羨词派陈维崧的影响，并在其词论与词作诸如〈迈陂塘·题其年〈填词图〉〉等对其大加褒扬。

<sup>7</sup> 参见莫立民，《近代词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页243。

<sup>8</sup> 【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1734，页225。

文提及的“淮海词人群”倾向于杜氏早期在江淮流域的词学活动，而另一些学者对“吴中词派”的研究又倾向于杜氏晚年在苏州地区的交游<sup>9</sup>。这些研究所展示的词坛网络与《憩园词话》的“同人”网络有着或大或小的交集，但并不能以偏概全地反映杜氏所建构“同人”网络的复杂面貌。一方面，杜文澜视其所录词人皆为“同人”，其中所载词坛人物故事虽然庞杂，但却正可视为以杜氏为核心的一个完整不可分割的交际网络；另一方面，杜文澜与这些词人的交游跨越了不同的时期与地域，如在其晚年宦居苏州之时，与早年扬州的词友也保持着词作唱和与词学交流，以某一时间段为界显然无法展示这一“同人”团体活动的全貌。

因而，本文试图以《憩园词话》一书所收录的词学“同人”为研究对象，阐述以杜文澜为核心的这一词学共同体建构的始末，展示从这一同人团体成分的构成，组织结构，到最终记忆的书写和获得的回应的全部过程，以探究一个跨地域的复杂词学群体如何形成的过程。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在开始本文的论述之前，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对这批词人及整个词人群体的研究历程，并简要介绍一下本文将使用的理论方法。

### 一. 词人研究

本文以咸同之际收录于《憩园词话》中的词人为研究对象，探索其构成一个词学群体的可能，因而所征引的原始文献皆围绕杜文澜和与他有交游的词人展开。杜文澜，字小舫，一作筱舫，号采香舟主人，祖籍浙江秀水<sup>10</sup>。杜氏本身的词作《采香词》现存三个版本，分别为：《清名家词》一卷本，咸丰十一年曼陀罗华阁刻二卷本和同治四年秀水杜氏刻《曼陀罗华阁丛书》四卷本；其所撰《憩

---

<sup>9</sup> 参见沙先一，《清代吴中词派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sup>10</sup> 关于杜氏生平，可详见【清】俞樾所撰《江苏候补道杜君墓志铭》，辑录于【清】繆荃孙《续碑传集》（台北：明文书局，1985），卷三十八，页203。



园词话》收录于唐圭璋所辑《词话丛编》，另有福建师范大学馆藏清钞本及以此为基础影印的《续修四库全书》本，及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sup>11</sup>；此外，杜氏的词学著作尚有《词律校勘记》、《词律补遗》<sup>12</sup>及《宋七家词笺注》<sup>13</sup>几种。

《憩园词话》中所记叙杜氏交游词人共计 101 人，其中该书提及到有词集行世者凡 60 人。现根据朱德慈的《近代词人考录》<sup>14</sup>及吴熊和等人所编辑的《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sup>15</sup>，对其所载词人别集进行爬梳，而今尚有词集传世的词人亦有 60 人，然而杜氏当年眼见词稿，现有部分已散佚不存或毁于劫灰，而另有些杜氏未载词集却流传至今。盖因杜氏其书虽为“存人”，却并非对当时江淮词人词作的系统归整，更倾向于一种“经眼录”性质的个人经验的书写，所以收录中或有遗漏，或省略不谈。然而无论是就杜文澜当时眼见，或现今所存词集，当时词人词集刊刻流传的比例，仍可想见当时当地词风之盛。

作为历经咸同光三朝江淮地区的代表性词人，晚清词坛不乏对杜文澜词学成就的评价，除去为其词集《采香词》作序的李肇增（字冰叔，1821-1864）、如山（字冠九，生卒不详），其他词家如谢章铤（字枚如，1820-1903）、江顺诒（字子谷，号秋珊，1822-1889）、俞樾（字荫甫，1821-1907）、张德瀛（字采珊，？-1914）等人在其著作中也均对杜氏著作有所评论。鉴于当时杜氏《憩园词话》尚未刊刻，其时评价主要针对于杜氏词集《采香词》。<sup>16</sup>这些传统词论的评价往往继承了中国

---

<sup>11</sup> 《词话丛编》本与福建师范大学钞本的详细异同比较林滢在其论文<《憩园词话》版本小考>中有较详细的介绍，见《剑南文学》，2003 年第 1 期，页 77、87。黄琪雅在其硕士论文中针对林滢论文的遗漏之处增补了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并对三者间的差异予以了更为严密的考证，参见《杜文澜及其<憩园词话>研究》，国立中央大学硕士论文，2014，页 77-81。

<sup>12</sup> 【清】万树著，恩锡、杜文澜校刊，《词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sup>13</sup> 【清】戈载著，杜文澜笺注，《宋七家词选》（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8）。

<sup>14</sup> 朱德慈，《近代词人考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sup>15</sup> 吴熊和、严迪昌、林枚仪合编，《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

<sup>16</sup> 孙仲权于《清人词话》（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一书中辑录了晚清诸家对杜

古代文论简练而零散的特性，如张德瀛在《词征》一书中“杜小舫词，如四壁秋蛩，助人叹息”的简短断语<sup>17</sup>，这样以富于启发性的语言评价文学作品，不免有感受性较强，然缺乏系统性与分析的遗憾。除了对《采香词》的评价之外，杜氏对《词律》及《草窗词》、《梦窗词》的校订工作也引起了诸多词家注意，如江顺诒即有“杜氏又为万氏（树）之功臣”<sup>18</sup>的评价。

随着收录于《词话丛编》中《憩园词话》的面世，杜文澜的词学观显露于学界视野之中，然而当代学界关于杜氏本人的研究却并不甚丰富，早期研究多为收录于词史类著作的泛泛介绍，包括严迪昌《清词史》<sup>19</sup>，曹济平、马兴荣、吴熊和《中国词学大辞典》<sup>20</sup>，莫立民《近代词史》<sup>21</sup>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朱德慈《近代词人行年考》中〈杜文澜行年考〉<sup>22</sup>一节，此文考证了杜氏生平与词学经历，颇具史料价值。

以杜文澜的词论与词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也屈指可数。沙先一于2003年发表于《苏州大学学报》的〈论杜文澜的词学主张与创作〉<sup>23</sup>是第一篇单独关注杜文澜词学的论文，在文中，作者把杜文澜归于吴中词派的范畴进行讨论，概括了杜氏的词学主张，简要分析了杜文澜的词作，最后对杜氏在词史上的地位进行了归纳。戴倩于2011年发表于《安徽文学》的〈词清笔媚，言外殊多感——杜文澜《采

---

文澜的词学评论，在此不予赘述，页1523-1525。

<sup>17</sup> 【清】张德瀛，《词征》，参见唐圭璋辑《词话丛编》，页4186。

<sup>18</sup> 【清】江顺诒，《词学集成》，参见唐圭璋辑《词话丛编》，页3237。

<sup>19</sup> 严迪昌，《清词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sup>20</sup> 曹济平、马兴荣、吴熊和，《中国词学大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sup>21</sup> 莫立民，《近代词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页243。

<sup>22</sup> 朱德慈，〈杜文澜行年考〉，《近代词人行年考》（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页29-56。

<sup>23</sup> 沙先一，〈论杜文澜的词学主张与创作〉《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10月第四期，页28-33。

香词》二卷初探<sup>24</sup>则侧重于分析杜文澜《采香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并未论及其词论主张和流派归属。限于篇幅，两篇文章都只是对杜氏词学观或词创作进行了大略的介绍，没有进行深入讨论。此外，关于杜文澜词学研究的还有福建师范大学林滢的硕士论文《杜文澜词学研究》<sup>25</sup>，以及辽宁师范大学夏迎春的硕士论文《〈采香词〉笺注》<sup>26</sup>。前者将杜文澜视为浙派晚期词人，主要侧重于对杜文澜本人词集词律校勘、词学创作及理论等方面成就的全面概述，涉及《憩园词话》的部分亦主要以介绍杜氏词学观为主，对其与词人的交游情况只有小篇幅论及；而后者则纯粹为对杜氏词集《采香词》的笺注。

在诸多研究文献中，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国立中央大学黄琪雅的硕士论文《杜文澜及其〈憩园词话〉研究》<sup>27</sup>，本文收集了大量史料，补充、修订和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依据杜文澜家世、生平、交游梳理了杜氏年表，并对杜文澜各类著述的版本与年代进行了考证，可谓现有对杜氏研究详尽可靠的总结性资料。

在杜文澜所交游的词人当中，蒋春霖是公认词学成就最高，也最受到广泛关注的一位。其词作《水云楼词》被多次出版刊刻，以其为对象的研究成果也颇为可观。冯其庸在《蒋春霖年谱考略》中对其生平和交游进行了详尽的考证，黄嫣梨的《蒋春霖评传》<sup>28</sup>则以蒋春霖的生平为线索评述了其人际、词作等方方面面。除此之外，尚有大量论文及专著对蒋氏其人其词展开多重探索，具体可参见《蒋春霖研究史述略》<sup>29</sup>，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除了杜文澜与蒋春霖之外，其他词人受到较多关注的尚有周之琦（字稚圭，1782-1862）、戈载（字顺卿，1786-1856）、谢元淮（字默卿，1792-1874）、宋翔

---

<sup>24</sup> 戴倩，〈词清笔媚，言外殊多感——杜文澜〈采香词〉二卷初探〉，《安徽文学》，2011年第8期，页91-92。

<sup>25</sup> 林滢，《杜文澜词学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

<sup>26</sup> 夏迎春，《〈采香词〉笺注》，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

<sup>27</sup> 黄琪雅，《杜文澜及其〈憩园词话〉研究》，国立中央大学硕士论文，2014。

<sup>28</sup> 黄嫣梨，《蒋春霖评传》（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

<sup>29</sup> 陈水云，〈蒋春霖研究史述略〉，《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16卷第2期，页46-78。

凤（字于庭，1779-1860）和潘氏词人群。重要的研究论文如关于谢元淮的硕士论文《谢元淮词学研究》<sup>30</sup>，期刊论文《谢元淮年表》<sup>31</sup>，关于宋翔凤的《宋翔凤年谱》<sup>32</sup>，《考据与微言——宋翔凤的词学与经学》<sup>33</sup>《论宋翔凤词学思想与意义》<sup>34</sup>，关于周之琦的《清代词人周之琦研究》<sup>35</sup>等，然而这些论文多属于对词人生平的考据或对其词学观点的总结或介绍，并没有对其创作及交游进行细致的分析探讨。而关于其他声名未显的词人的论著则更为寥寥。

## 二. 词人群体研究

### 1. 《憩园词话》词人群体研究

除了对这一群体词人的分别研究之外，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将这些词人定位为一个词学群体。

对这一群体首先产生兴趣的是冯其庸，在其《蒋春霖年谱考略：水云楼诗词笺校》一书中，作者在整理蒋氏年谱的同时，不仅对鹿潭本人的生平和词作进行了考证，也关注了其交游网络及周边词人的生平及事迹。在本书的最后部分，冯氏对蒋春霖及其周围词人的唱酬进行了整理，在〈词话〉一节中还统计了这些词人在彼此及后人词话中所得到的评价。这些文献资料本身对后学已具有巨大的利用价值，然而本文只是进行了文献的整合，并未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

陈水云于〈咸丰、同治时期淮海词人群体综论〉一文紧承其师冯其庸的研究成

---

<sup>30</sup> 刘超，《谢元淮词学研究》，河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6月。

<sup>31</sup> 刘崇德、刘超，〈谢元淮年表〉，《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10月第36卷第5期，页17-22。

<sup>32</sup> 李南，《宋翔凤年谱》，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5月。

<sup>33</sup> 陈桂清，〈考据与微言——宋翔凤的词学与经学〉，《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8卷第5期。页73-77。

<sup>34</sup> 朱惠国，〈论宋翔凤词学思想与意义〉，《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页77-83。

<sup>35</sup> 李献伟，《清代词人周之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果，开始关注于这一批词人的词学主张与创作。他总结了淮海词人群体的词学活动，并分别介绍了各位词人的词学特点，然而文章却并未分析这一群词人之所以从属于一个群体的原因。而且作者文中列举了两淮之地的词人交游，以“九秋词社”的创立为鼎盛之际，以蒋春霖之死为群体活动的结束，事实上是建构了一个以蒋春霖为核心的交游圈。然而，这一批词人群虽以蒋氏成就最著，而事实上由于声名地位等原因，他却并非这一词学团体的主导者。从地域上来说，蒋春霖去世之际，杜文澜事实上已在苏州开藩，这一群体已不限于两淮之地，在交游上，杜氏与两淮之际结识的很多词人的友谊是终身的，并未因蒋氏的死亡而终止，而其他词人的唱和活动也在继续进行。这就意味着作者对这一词人群体的活动的分析在时间上做了人为的切断，而并非切合该群体自然发展的规律。

相比于陈水云对杜文澜身在两淮时词学活动的关注，沙先一所著《清代吴中词派研究》中，则将杜文澜归为吴派词人一类，认为《憩园词话》亦属一部收集吴派词人的总集。固然杜氏受吴派影响颇深，且其词话收录了大量可归于“吴派”的苏州词人，但这种说法明显忽略了《憩园词话》中大量非吴派词人的存在，且收录吴派词人亦绝非杜文澜创作该词话的目的所在，对《憩园词话》的这一定位显然是不够准确的。

## 2. 词人群体研究范式

本文拟研究一个词学群体聚合的原因及维持的方式，就目前词学研究而言，所涉及的词学群体有以下四种不同类型：

第一是以词派或社团分类。词派和词社是相对稳固的词人群体，参与其中的词人对他们的身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认同。无论是词派或是社团，都有其明确的宗旨。关于这一批词人的研究占据了近代以来词学群体研究的主导地位，清代以来重要词派如阳羨词派、常州词派、浙西词派、吴中词派的理论与创作均有大量研究论著探讨，其代表作诸如《常州词派通论》<sup>36</sup>，《清代临桂词派研究》<sup>37</sup>，《清

---

<sup>36</sup> 朱德慈，《常州词派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

<sup>37</sup> 巨传友，《清代临桂词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代词社研究》<sup>38</sup>等。

第二是以政治倾向进行分类。这类词学群体的聚合往往处于国家危亡之际，一些词人因为抱着相同的政治情感，而集聚在一起唱酬。他们或在词学观点上有一定相似之处，但聚合的原因却是由于政治倾向，由政治倾向聚合的词人多为异代之际的遗民词人。其代表作如王兆鹏的《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sup>39</sup>，周焕卿的《清初遗民词人群体研究》<sup>40</sup>。另如林立师的《沧海遗音——民国时期清遗民词研究》<sup>41</sup>，关注了在政治和文化上皆处于小众地位的遗民词人群体通过何种方式建构了自身的群体身份，并通过这种词学群体的建构进一步强化自身的遗民地位，更是将遗民群体的聚合的内在原因揭示出来。

第三是以性别分类的研究。传统词史多是以男性视角书写的，女性词人游离于词学传统外，以其性别成为一个有别于传统词学研究对象的群体。相对于前两种词人群体，女性词人群组成之际往往并未有明确的自我意识，在词学观点上也多是依附于当时的男性文人。其自发组成的群体多是由于亲属关系或师承关系这种较为密切的私人交际圈构成，而更多女性词人则完全没有建构群体的意识，而是由后世的研究者以时代或词学风格的相似性将其定名为一个群体。关于女性词人群体，海外学者孙康宜及方秀洁的研究著作颇多，其余如黄嫣梨的《清代四大女词人——转型中的清代知识女性》<sup>42</sup>等皆是将女性词人作为一个群体而进行研究。

第四即是以地域来区分。受乡邦意识影响，至清代以来，词学区域意识日渐突出，很多地区的词人有着强烈的构建本乡地域词学的热忱。和女性词学群体一样，以地域来分的词学群体多半并非出于词人基于自身词学观点的自发选择，而

---

<sup>38</sup> 万柳，《清代词社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

<sup>39</sup> 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

<sup>40</sup> 周焕卿，《清初遗民词人群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sup>41</sup> 林立，《沧海遗音：民国时期清遗民词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

<sup>42</sup> 黄嫣梨，《清代四大女词人——转型中的清代知识女性》（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

只是以其出生地或主要词学活动发生的地点进行归类。尤其是近代以来诸如《粤词雅》<sup>43</sup>《国朝湖州词录》<sup>44</sup>等以地域为界限辑选的词集面世，更是促进了地域词学群体研究。

然而《憩园词话》所录“同人”与上述研究所述的状况均不相同。《憩园词话》的“同人”们所属不同流派，也很难概括其活动的地域范围，虽政治倾向相仿，也绝非构成词学群体的主要原因。相对于前人研究的界定分明的群体来说，这一同人团体更近似于一种自发构成的社交网络。

### 三. 群体建构和身份认同

宇文所安的《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给了本文最初的启发，著者认为，文化记忆承载于特定的时间、地点及事物之上，作者通过这些媒介和前代的作者产生联系，而后世的作者又将会通过同样的媒介追忆作者，从而达成一种致使其声名与时地物共存不朽的“契约”。<sup>45</sup>这一观点与社会学中文化记忆的理论可谓不谋而合。涂尔干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的《论集体记忆》<sup>46</sup>是关于集体记忆理论的开山之作。他认为记忆存在于由人们组成的聚合体中，尽管进行记忆的是群体中的每个个体，然而所有的记忆却根植在社会情境或结构当中，并借由相同的情境或拥有共同记忆者的描述唤起。这些论述恰好阐释了中国传统文人为何乐于将自己投入到某种传统当中，这种传统或是时间上对共同事物的吟咏，也可以是对一个地域的自觉归属。在这个意义上说，杜氏的《憩园词话》正是一个唤起群体记忆的个体记录，

---

<sup>43</sup> 【清】潘飞声，《粤词雅》，参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

<sup>44</sup> 朱祖谋辑，《国朝湖州词录》（上海：上海书店，1994）。

<sup>45</sup> Stephen Owen, *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中文译文部分参见郑学勤译，《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北京：三联书店，2004），页 1-19。

<sup>46</sup>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ies*, Edited,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ewis A. Cos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而潘钟瑞（字麟生，1822-1890）在该书完成后对其的点评则恰可视为这一集体记忆的共同拥有者对被唤起记忆的回答。

上述观点为阐释杜氏“同人”群体存在的原因提供了途径，而费孝通于《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及的“差序”格局理论，则为解释《憩园词话》中特殊的“同人”格局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支持。在本书中，费氏将中国社会所呈现的“差序格局”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相对立。相对于西方社会中界限分明的团体，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交网络往往呈现的是以每个个体为中心的结构，“每个人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会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同的”<sup>47</sup>。对于《憩园词话》的同人来说，这样围绕杜文澜所建构的差序格局的圈子显然并非杂乱无章的。如同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场域（field）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权力、资本、惯习等各个方面都会成为影响场域内部结构的因素<sup>48</sup>。上述论述皆会成为本文分析《憩园词话》“同人”网络产生的理论依据。

### 第三节 各章内容

本文共计五章，本章为第一章，主要对整篇论文的写作目的以及所征引的文献进行简要介绍，其余各章则将分别就咸同之际江淮词人群体构成的某一方面进行分析论述。以下为二到五章的内容概述：

第二章将介绍《憩园词话》一书的书写情况，包括杜文澜书写此书的写作目的，书中所包含的存人及存词标准，以及通过与丁绍仪（字杏龄，1815-1884）《听秋声馆词话》<sup>49</sup>书写模式的对比分析杜氏书写此书所采用的书写策略，并对书中

---

<sup>47</sup> 费孝通，《乡土中国与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 24-30。

<sup>48</sup> Pierre Bourdieu, Loïc J. D.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97. 中文译文参照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页 133—134。

<sup>49</sup> 【清】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卷 1734，页 53。



反复出现的“过去”与“现在”对比的叙事模式进行分析。

第三章将以《憩园词话》中的同人聚合为核心，着重介绍这一同人网络的词人构成与词学活动，分析潜藏在同人网络中的差序结构，以及影响这一格局的各项要素。

第四章则以“太平天国”为个例，从同人们词作中对地点的描写，对时间流逝的敏感，及词学同人们相互帮扶的活动，探讨《憩园词话》词学同人建构身份认同的可能性。

第五章为全书的结论部分，将通过校订者潘钟瑞的批注来展示杜氏所建构记忆获得了怎样的回响，并总结全文，探讨这一案例对当时及后世词坛的影响和意义。

## 第二章 《憩园词话》的书写

### 第一节 《憩园词话》的书写目的

在《词话史》一书中，朱崇才认为词话“就其外延讲，可以有广、中、狭三种定义”，其中狭义是指“以‘词’这一诗歌样式为表述对象的、原已成卷的专门著作”，中义则还包括“经后人改题、辑录而成的成卷专著”，广义是指“所有涉及词的话语”<sup>1</sup>。就这个定义而言，广义与中义的词话形式多为零散的，作者在书写时也并未具有理论建构的自觉，它们或为藉由他人辑录而成书，或为序跋书信中零星出现的吉光片羽。相比而言，狭义的词话则承载着作者“立言”的主观愿望，因而往往具有明确的书写纲领与目的，体制上相对来说也比较系统和成熟，有的作者更会直接点明其创作目的和相对前人词话独特价值。作为集体记忆的收集者和书写者，杜文澜在《憩园词话》中集合了江淮一带词坛的故人和往事，这种收集自然也并非无心之举。在杜氏的成书背后，一条始终如一的写作目的贯穿着全书看似零星的章节，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在针对其他人其他词话的反思中，杜文澜开始了《憩园词话》的创作。以至我们在书成之后原其初心，其脉络仍清晰可见。

和其他的作者相似，在《憩园词话》开篇，杜文澜即自述写作目的云：

近人词说皆评白唐、宋旧词，所辑近词甚少。又皆详于话而略于词，载全阙者尤罕觐。余闲居无俚，就同人所谱新词，或已刊行，或存稿本，均为摘录数阙，自遣吟怀。其人之字籍宦途及平时交谊，亦备书之。更有同辈商榷之词，及平生游历所涉长短句者，附为记述。积有月日，汇集成编，暇时展观，如亲故人，如游旧地，诚闲中之乐事也。<sup>2</sup>

<sup>1</sup> 以上均引自朱崇才，《词话史》（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30。

<sup>2</sup> 【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卷1734，页225。

通过作者的自述，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杜氏针对“近人”词话的不足，选择了一种存人、记事与存词并重的书写方式，其所收录词人的时间段为“近世”，词人身份为“同人”，而所记录的内容除了词之“全阙”之外，更包括词人的字籍宦途、作者的平时交谊、词坛的同辈商榷以及平生游历的所涉词稿。一方面，选词精严而广泛，弥补了以往词话“详于话而略于词”的缺陷，另一方面，叙事又详尽而具体，旨在收录当时当地的词人资料与词坛故实。这两方面明确的定位让《憩园词话》在众多记事与存人并重的词话作品中，也具有着相当独特的价值。和相近年代相近体例的词话相比，《本事词》对轶闻掌故的记录尚且处于对“每藉倚声，遂留佳话”<sup>3</sup>等绮情或灵异故事的猎奇，《听秋声馆词话》又采取的是“拉杂书之，藉以消耗岁月”<sup>4</sup>这样古今远近兼收并蓄的态度。相比而言，虽然《憩园词话》亦旨在创作出同时综合存人、存词与记事的作品，但是由于它对所选人事范围的限定，使这部词话并不显得过于庞杂，其对时间、身份、内容的定位就令其具有明确的针对性，“暇时展观，如亲旧人，如游旧地”，具有了展现当时、当地词坛全貌的独特价值。

因而后人对《憩园词话》的评价，也多针对此书在收录词人及记载事件的贡献而言。诸如严迪昌在《清词史》一书中即评价此书说：“他的《憩园词话》记载了一大批与蒋春霖有交往的词人情况，有史料价值”<sup>5</sup>。而陈水云在<咸丰、同治时期淮海词人群体综论>中也将此书视为淮海地区词人群体活动的记录<sup>6</sup>。

然而今人以蒋春霖为中心或以江淮、吴中地域为中心的概括，或多或少受到了时代意见的影响，虽反应了部分事实，并不能尽然还原杜文澜当时创作的全部动机。事实上，虽然《憩园词话》中所记载的时间、地域及作者身份有一定的规律可寻，然而亦只是如实记载了与杜文澜自身有交往的词人情况，这主要受制于

<sup>3</sup> 【清】叶申芑，《本事词》自序，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页 2295。

<sup>4</sup> 【清】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卷 1734，页 53。

<sup>5</sup> 严迪昌，《清词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页 482。

<sup>6</sup> 陈水云，<咸丰、同治时期淮海词人群体综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 年第 60 卷第 6 期，页 824-830。

作者本人的经历而非特意筛选的结果。这样以自身交游为中心的特殊写法及明确定位，令其成为了一部得以记载当时当地词坛交际网络的回忆录式作品。

## 第二节 《憩园词话》词学观与存人存词标准

就杜文澜自述《憩园词话》的写作目的看，他似乎旨在通过这本书追忆其所处词学共同体。然而实际上，《憩园词话》的结构却分为了两大部分。第一卷除了类似自序的简短纲要外，主要介绍了杜文澜自身对词学的理解以及阅读他人著作后的评价，从第二卷开始到第六卷，以人物为条目罗列了杜文澜社交网络中各位词人及词人之间互动。二者各成体系，关系并不密切。如果仅仅着眼于其中任何一个部分，都不可谓完整了解《憩园词话》的全貌。

### 一.《憩园词话》词学观

在第一卷中，杜文澜阐释了自身的词学观点。关于杜氏词学观，前人研究杜文澜的文章及著作中已予以备述<sup>7</sup>，简要归纳，《憩园词话》中杜文澜的词学思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言之。

#### 1.声律观

在杜文澜本人的各项词学观点中，声律观所被论述的次数最多，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与杜文澜本身校订过万树《词律》有关，杜氏对“审定调律，讨论宫商”<sup>8</sup>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敏感与关注。总的来说，杜氏的声律观可用“谨慎”两字概括。

首先，他主张平仄四声要和律精严。杜氏反复强调词人作词用律应谨慎认真，

---

<sup>7</sup> 如沙先一在《清代吴中词派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中第七章〈杜文澜与〈憩园词话〉〉，萧鹏，陈水云在〈咸丰、同治时期淮海词人群体综论〉，黄琪雅在《杜文澜及其〈憩园词话〉研究》等文中，皆对杜文澜的词学观有了全面而细致的概括，因而本文对杜氏词学观只予以简要归类，不再重复做细致分析的工作。

<sup>8</sup> 【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卷1734，页228。

“宋人多明宫调，其兢慎尚如是。今去古益远，安可不恪遵之”<sup>9</sup>，“何必涉疑似之间，供人指摘”<sup>10</sup>。受当时吴中词坛的主流观点影响<sup>11</sup>，他认为作词不仅要细究平仄，也应该辨明四声，“今之为词者，必依谱律所定字句，辨其平仄，更于平声中分为入声所代，上声所代，于仄声中分为宜上、宜去、宜入，音声允恰，始为完词”<sup>12</sup>。这些四声的变化不仅适用于词中单字，他们的组合在词作中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在词话中，杜氏花费大段笔墨集合前人对“上去”、“上入”等四声组合用法的心得见解，并加以阐述发明，杜氏认为四声的协调造成了词这一文体的独特美感，对前辈词家如万树“词律但于各调附注去声之妙，尚未知用去上有定律也”<sup>13</sup>深为遗憾。

其次，用韵是在平仄外词学声律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在词话中，杜文澜在词的用韵上也颇有心得。杜氏的韵学观以“协韵”为最高原则，他认为“词仍以韵律为主”<sup>14</sup>，在协韵的基础上“第勿用哑音，及庸俗生涩字而已”<sup>15</sup>。因而他极力肯定了戈载手定《词林正韵》之功，赞其“考订精详，洵可传世”<sup>16</sup>。除了戈载之外，杜文澜也对杨守斋（即杨缵，约1219-1267）《作词五要》中“随律押韵”<sup>17</sup>的观点颇为赞赏。杜氏本人在词韵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涉及对当时

---

<sup>9</sup> 同上，页241。

<sup>10</sup> 同上，页247。

<sup>11</sup> 道咸之际，以戈载为代表的活动在吴中地区的“吴中七子”标榜声律，或被人称为“吴中词派”，对当地词坛风气影响颇深，杜氏久客吴地，流风所及，其论词颇受前辈影响。至于词分四声的观点自宋季张炎《词源》中即时被论及，元初仇远亦有所发挥，然而多为泛泛而论，四声具体如何应用在词作中至清代才被广泛讨论，尤其重声律的吴中词派更是对这一问题阐发颇多。

<sup>12</sup> 【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卷1734，页229。

<sup>13</sup> 同上，页236。

<sup>14</sup> 同上，页244。

<sup>15</sup> 同上，页237。

<sup>16</sup> 同上，页247。

<sup>17</sup> 同上，页234。

的韵书词谱拣择、不同反切方式的调查，及宋词中暗藏短韵的总结。

最后，杜文澜在词话中对失传的词乐与宫调也展示了浓厚的兴趣。由于宋词宫调的失传词之旧制已无从恢复，杜氏对此事一直抱有惋惜的态度，批评了明人自度曲与自度腔对词体的损害，冀望“得乐府之遗，复大晟之旧”<sup>18</sup>。

## 2.创作论

在词的创作论上，杜文澜则十分推崇常州派的周济（字保绪，一字介存，1781-1839）。在书中，杜氏多次引用周济《宋四家词选》序及《介存斋论词杂著》等著作，除了少数关于声律的段落外，多是关于如何进行词学创作的简介。他认为周氏《宋四家词选》的学词途径“抉择极精，深得词中三昧”<sup>19</sup>，而对周济所提倡的“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sup>20</sup>、“学词先以用心为主”<sup>21</sup>、“感慨所寄，不过盛衰……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sup>22</sup>这些以“寄托”为核心的常州词派的典型观点也极示赞同。

## 3.尊体与辨体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杜氏也参与到当时“尊体”与“辨体”的风潮中<sup>23</sup>。在《憩园词话》中，杜氏对词之为词，诗、词、曲之辨皆有所发明，“近人每以诗词词曲连类而言，实则各有蹊迳”<sup>24</sup>，“余谓诗、词分际，在疾徐收纵轻重肥瘦之间，娴于两途，自能体认。至于词之与曲，则同源别派，清浊判然”<sup>25</sup>。尤其针

---

<sup>18</sup> 同上，页 228。

<sup>19</sup> 同上，页 230。

<sup>20</sup> 同上，页 243。

<sup>21</sup> 同上，页 242。

<sup>22</sup> 同上，页 243。

<sup>23</sup> 尊体与辨体一向是清代词学界极为关注的话题之一，关于这点很多前人均已予以详细论述，可参见颜妙容，《清代词学尊体之论述研究》，国立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论文，2004。

<sup>24</sup> 【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卷 1734，页 250。

<sup>25</sup> 同上，251。

对当时为尊体而将诗词并称的说法，更是加以阐释辩论，力求厘清词之所以区别于诗的自身特点，从而建构词作为一个独立文体的形象。

根据以上三点看来，杜氏所倡导的词学观并不复杂，几乎大多数都可以从当时比较流行的理论中找到源头——在声律上，他倾向于格律精严的吴派词观，在创作上，他倾向于寄托遥深的常派词观。在词话中，他并不吝于花费大段篇幅去筛选和摘录他人观点，自身只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简单的评价，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摘录的过程中，杜文澜能够不为流派所限，取法各家所长。这当然不是对前人观点的简单捏合与重述，事实上，杜文澜对所引诸家之说均做了深入的思索与扬弃。因而第一卷与其说展示了杜文澜本人的词学思想，不如说是旨在通过引用与评价，集合杜文澜所赞同的词学观点，集采百家之长，建构一种杜氏所认同的理想词学观。在他的词学观里，格律要精严，创作须深入，风格上也要具有词学所独有的审美，这样的要求无疑是将词视为一个严格与严肃的文体进行思考与创作。无论在格律、思想内容还是诗词之辨等各个方面，在宽松与严格二途上，他总倾向取法乎上，这反映了他对词学创作谨慎严肃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视为杜文澜对词学创作态度的核心。

## 二.《憩园词话》存人部分

第二卷到第六卷是《憩园词话》中真正追寻作者词坛记忆的部分。在这部分里，作者选择了当时比较流行的以人物分列条目记事存词的方式<sup>26</sup>。除个别身世不详的词人外，杜氏详细记述他们每个人的姓名、籍贯、官职、著作、与己相识经过或从何处得到其人词稿，并从他们的作品中筛选出符合其词学思想和审美品位的词作，有时也会对其人其词加以评点。

在这部词话中，杜氏共收录了 101 位当时的词人。就其所选人员的身份来看，其中大多数都属于中层或底层的官吏，就其活动范围来看，则多数分布在吴县、淮海及作者少时寄居的湖北一带，均与杜氏自身的交际圈大略一致。如附录一所

---

<sup>26</sup> 这种方式在清代以记事、存词或评论为主的词话中非常常见，如之前提及的丁绍仪的《听秋声馆词话》，叶申芗的《本事词》均是以这种体例书写而成。

示，这些词人多数为杜氏本人所识，如丁至和，蒋春霖等，另有一些则为朋友引荐，如姚辉第、陈元鼎（字实庵，1817-1867）等，其余小部分则并不为杜氏所相识，作为词坛先贤或边缘人物而存留在杜氏等人的神交和讲述中<sup>27</sup>。

既以“存人”为纲领，杜氏对词人的甄选标准自然是研究这部著作作用心的关键着眼点。这些标准可以从《憩园词话》第一卷伊始类似自序的章节中找到明确提示：

第近来词学海内风行，即以江浙二省计之，何虑数百千家，而所录止于此，盖既未实具鉴裁之识，何敢虚存采辑之心。其人苟非所知，其词即无从欣赏。昔人选诗词每惧窒漏，今所录只万中之一二，更无窒漏之足云。<sup>28</sup>

今录友人近词，专以协律为主。稍一背驰，虽有佳词，亦从割爱。<sup>29</sup>

这两段话一者关注于所选者人物身份，一者关注于对词作本身的要求。就身份来看，“其人苟非所知，其词即无从欣赏”，与“今录友人近词”、及上文提到的“同人所谱新词”相呼应，反复彰显了作者在“存人”方面的首要标准是其人身份须是在杜文澜社交活动范围内的“友人”与“同人”。而在选词标准上，杜氏则只仅仅提出了“协律”这一项最基本的条件。从这两条标准看，在《憩园词话》中，相对于选词标准，杜氏更注重对词人身份的限制，而在艺术手法上对友人词作则没有提出过多要求。

很多例子都印证了杜氏在存人方面的宽容。第六卷中，杜文澜摘录并介绍了曾国藩（字子诚，1811-1872）于新年和胡焯（字光伯，1804-1852）与顾文彬（字蔚如，号子山，1811-1889）的六首《浪淘沙》<sup>30</sup>。其一云：

---

<sup>27</sup> 详见表一：杜文澜《憩园词话》交游人物表。

<sup>28</sup> 【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卷1734，页226。

<sup>29</sup> 同上，页229。

<sup>30</sup> 同上，页603。



坐耗尚方钱。饱食安眠。我生清洁不如蝉。作楫济川无实用，空号天船。  
佳梦五湖边。万苇延缘。一双鸥鸟自飘然。明岁秋风吾去也，明日新年。

就这首词来说，词境开阔，遣词造境也颇为放旷，并不符合杜文澜所欣赏的词律婉转寄托遥深的审美。且作为一首和词，这首词显然受原词牵掣，在构架与衔接上也有生涩之处，质量并不算上乘。杜氏本人在词话中也坦承曾国藩“唯词绝不留意”<sup>31</sup>，只是因为这六首词在友人顾文彬处惊为仅见，而加以采录。点评者潘钟瑞在眉注中也直言“曾文正本不以词名，此六阕中，酌存一二阕可矣”<sup>32</sup>，然杜氏将其所见六首词尽皆收录，其对存词的宽容可见一斑。

《憩园词话》中不以词名者绝非仅曾国藩一人，杜氏存章存元（字子善，1845-1866）词，亦只摘录其一阕十三岁所作的<十六字令><sup>33</sup>一首：

听。隔着黄河撼笛声。西风紧，吹起故园情。

评论所说“虽才力薄弱，而能清顺无疵”<sup>34</sup>，虽可视为对自家小辈的谦辞，但就艺术水准来看，这首词无论从立意、遣词各个方面皆乏新意，确然只能算作大略“无疵”的少年习作。

这样的事例在《憩园词话》中绝非仅见。在很多情况下，杜文澜收录这些词人显然并非因其词作达到了令杜氏欣赏的艺术高度，而如果从收录同人旧词的考量中则很容易找到杜文澜采录这些词人的原因。事实上，适才案例中所提之二人确实与杜文澜有着相当密切的私人关系。曾国藩对杜文澜有提携之功<sup>35</sup>，文学上

---

<sup>31</sup> 同上，页 603。

<sup>32</sup> 【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唐圭璋辑《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页 2859。

<sup>33</sup> 【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卷 1734，页 498。

<sup>34</sup> 同上，页 498。

<sup>35</sup> 据【清】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4）所载“秀水杜小舫方伯文澜始以钱幕入仕，曾文正至金陵，颇不然之。适由行台移节府，见堂室所揭楹联，于人地事

对杜氏也极为赏识。俞樾在《江苏侯补道杜君墓志铭》中记录了一则轶事，曾国藩听闻俞樾将去吴下，随即介绍杜文澜与其相识<sup>36</sup>，对杜文澜的器重与对其文学才能的欣赏可见一斑。曾国藩在杜文澜的仕途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杜氏也相当感念曾国藩的提携之情，因而在自己意在“如亲故人”的词话中收录其作品亦是理所当然。这样的案例在《憩园词话》中不为仅见，同样因感念提携之情而予以收录的还有杜氏恩师恩锡（字竹樵，1818-1877）<sup>37</sup>。在第二个案例中，章存元则为杜文澜之婿，从小被杜文澜收养抚育，杜文澜对章氏亲自指导，寄予厚望，无奈章存元年仅二十余岁即英年早逝，这可谓是杜文澜私人生活中一项创痛，在《憩园词话》中收录其少年词作，自有为早逝之人存言的私心所及。这些人物虽然词学造诣远未达到杜文澜本人的词学要求，然而杜氏却仍一意将其收录，其中不难看出杜文澜“存人”时将社会关系置于词学标准之上的态度。

### 三.《憩园词话》中词学观与存人标准的矛盾

正因为杜氏秉持着这样将社会关系置于词学标准之上的“存人”态度，导致《憩园词话》一书中出现了很多前后矛盾之处。其中最明显一点，是在第二到六卷的叙述中他有时会表现出与第一卷自己所倡导的词学观全然不同的立场。譬如杜氏在第一卷中特地摘录出孙麟趾（字清瑞，号月坡，1791-1860）“作词须择调，如满江红、沁园春、水调歌头、西江月等调，必不可染指，以其音调粗率板滞，必不细腻活脱也”<sup>38</sup>以示赞同，然而在之后对友人词的选录中，却对这些词调并无避讳，乃至记录了金安清偶园落成，同人赓和《满江红》的盛况，以为佳话<sup>39</sup>。

---

事切合，奇赏之。询为杜之手笔，即延见，谈至盐务、洋务，尤指画详明，并条陈利害，灼然可行，叹为奇才。旋奏署江宁藩司，由是徧历三司五道，然未曾引对入都也。及沈文肃公葆楨莅任，乃以嗜好太深，劾之去职”。页 1436。

<sup>36</sup> 参见【清】俞樾《江苏侯补道杜君墓志铭》，载于缪荃孙《续碑传集》卷三十八（台北：明文书局，1985），页 117-203。

<sup>37</sup> 【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卷 1734，页 344-346。

<sup>38</sup> 同上，页 245。

<sup>39</sup> 同上，页 347-351。

更有甚者，杜文澜的词学观中最看重的是“声律”，并把这一点认为这是词之所以为词的关键要素。然而在词话中，杜氏有时为了存人存词，声律的标准也可以选择从宽。譬如在卷四中杜文澜收录了词人徐汉苍（字荔庵，1797-1868）的词作，并评价其词云：“所作不拘声律，为诗人之词，而老健清空，尚多佳句”<sup>40</sup>，这显然已与杜氏本人所言“稍不协律，即从割爱”的存人原则相违背了。

这样的矛盾在书中常常可见，杜文澜自身词学观的严格与筛选友人词作时的宽容似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只选择其中的任一方面理解杜文澜的词学观，都不足以概括《憩园词话》的全部内容。这就令读者对杜文澜的写作态度与《憩园词话》一书的真实性与严肃性愈发难以把握。而事实上，这一问题并非难以理解，造成这种前后矛盾的原因其实是和《憩园词话》中将论词部分与存人部分截然分开的体例是密不可分的。正如龙榆生在《选词标准论》一文中提及词选的四种目的：“便歌”“传人”“开宗”“尊体”<sup>41</sup>，无论“存词”或者“存人”，作者的都影响着作品的构架和词人或词作的取舍。一般词话或词选只存在一种目的，“传人”要求收录全面而广泛，而“开宗”“尊体”则要求筛选的严格，选词存人都为了阐述自身的词学观点。这二者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兼顾的，《憩园词话》中杜氏所秉持的词学理论与选词标准矛盾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就是第一卷与二到六卷写作目的间的矛盾。

伴随着写作目的的矛盾，杜文澜本人同时也扮演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叙述身份。第一卷叙述的发出者是作为词学家个体的杜文澜，第二卷到第六卷叙述的发出者则是作为词学共同体一员的杜文澜。作为词人的杜文澜对词的格律作法等有着诸多的要求，敢于批评流俗之见，而作为团体一员的杜文澜，则笔端常带感情，虽然不能摆脱个人意见的影响，但对其记录的群体则抱有着广泛的宽容。

### 第三节 《憩园词话》的叙事策略

---

<sup>40</sup> 同上，页 445。

<sup>41</sup> 龙榆生，《选词标准论》，载于《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页 63。

乔斯·卡洛斯·贝尔梅霍·巴雷拉（Jos Carlos Bermejo Barrera）在<创造历史与讲述历史><sup>42</sup>一文中，认为要弄清用某种方法讲述历史是否还有意义，首先需要解答这样一系列的问题：

在历史文本中是谁在诉说？

历史文本中的叙述是针对谁而发的？

叙述者是以何种身份来讲述历史的？

叙述者所诉说的是什么？

一段相同的历史用不同的眼光或为不同的人所书写将会呈现出全然不同的面貌，因而在历史研究中，编撰者个人的身份、目的及偏好在历史书写中占据的位置一直成为学者们探讨的重要对象。《憩园词话》的第二卷到第六卷记录了杜文澜整个词学社交网络的活动状况，从一个角度看，正可以视作当时江淮流域的一部纪传体词史。在这样一部“词史”<sup>43</sup>中，作为书写者，杜文澜的身份、目的与态度显然也影响着整本词话的书写方式。

这样书写方式的差异，在和《憩园词话》时代相近的《听秋声馆词话》的对比中更为突出。《听秋声馆词话》也是采用与《憩园词话》一样以人物为纲领的记事方法，这部词话作于1869年，作者丁绍仪是江苏无锡人，词话完成于福州。时间上说，《憩园词话》比《听秋声馆词话》略晚，一直持续到杜文澜的晚年，在这个过程中，丁绍仪与杜文澜是否有过交集或杜氏是否曾参阅过丁氏的作品已无据可考，然而这两部词话创作时间大抵相近，在记述的“近世”人物上有很多重合之处。然而虽然这两部词话确实在编撰体例、记录的人物等方面均有很多相

---

<sup>42</sup> Jos Carlos Bermejo Barrera, “Making History, Talking about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40.2 (2001): 190. 本文所引翻译部分参见杨小辉译<创造历史与讲述历史>，《书写历史（第一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页45。

<sup>43</sup> 这里的词史并不指相对于“诗史”的“词史”，即记录反映历史之词，而指词史的本意，词学的历史。

同之处，但二者在书写目的上却有着明显的分歧——相比于杜文澜对收录对象为“同人”的明确定位，《听秋声馆词话》显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脉络主旨，正如丁绍仪本人所言，“或因词及事，或因事及词”<sup>44</sup>，整部词话编排结构随性，所论词人也涵盖自宋至明清的各色人等。

这样不同的书写目的，直接影响了两部词话的写作风格。哪怕关于相同人物的记录方式，这两部词话也有着显著的不同。我们不妨对比一下两本书中关于当时金陵殉国名臣汤贻汾（字雨生，1777-1853）的章节。

阳湖汤贞愍贻汾，为凤山令大奎孙。凤山公与子荀业，同殒林爽文之难。公由世袭云骑尉，历官乐清副将，乞病归，卜居金陵。咸丰三年城破，赋绝命词，于二月十二日投水死。蒙恩赐谥。公字雨生，善诗词，能画，兼工琴，晚自号琴隐，固彬彬儒将也。……武将能诗者多，能词者少，得之于公，尤为可宝。公歿后，海内文人咸赋诗词志挽。<sup>45</sup>

汤雨生都督贻汾，江苏武进人。祖及父均殉台湾之难，荫云骑尉，官至乐清协镇。解组归，卜居秣陵，筑琴隐园。后又构别墅，曰狮子窟，饶有幽泉峭石之致，啸咏其间。书画诗文名满天下。粤寇陷白下，时年逾七旬，赋绝命诗，从容投荷池以殉。事闻，赐谥贞愍，国史馆立传。忠义大节，照耀千秋。其诗词稿，为李子禄名盐参军从间道携出。旧友吴平斋，其戚曹恺堂诸君，重为刊刻。<sup>46</sup>

这两段均介绍了汤氏家世及殉难经过，然二者相比较，在叙述风格上却各有特点。

首先，《听秋声馆词话》中，侧重记录的是客观的事件，如汤氏父祖官职、殉难时间等，均是有据可考之实，笔法也较为平实；而杜氏的记录则细节丰富，

<sup>44</sup> 【清】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卷1734，页53。

<sup>45</sup> 同上，页70-71。

<sup>46</sup> 【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卷1734，页386-387。

在干枯的历史本事中，加入了诸如“其诗词稿，为李子禄名盐参军从间道携出”的轶事和“饶有幽泉峭石之致，啸咏其间”之类的细节描写。

其次，丁绍仪的描写主要倾向于汤贻汾本人人生历程与词学历程，关于汤贻汾与当时文坛的互动，只以“海内文人咸赋诗志挽”概括带过；而杜文澜则详述了汤氏诗词稿如何辗转而出的情况：携其诗稿而出者是与杜氏同为盐官的李禄名，而为其刊刻者则是杜文澜词友吴平斋（即吴云，1811-1883）及其亲戚曹恺堂，通过这些叙述，汤贻汾和江淮词坛诸人的联系被加强了。

最后，在《听秋声馆词话》中，对事件发生的时间及地点都有着明确的记录，譬如同为描写汤氏殉难之事，丁绍仪备述“咸丰三年城破，赋绝命词，于二月十二日投水死”，事件的时间经过非常清晰明确。然而针对同样的事件，在《憩园词话》中则只以“粤寇陷白下”一语带之，并未对事件进程进行详细介绍。

如果将眼光投向历史学家对书写历史问题的见解，会发现这些理论为杜氏颇具特点写作方式的内在原因提供了丰富的佐证。经过二十世纪中后期关于历史领域“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的讨论，历史更多被视为一种叙述与建构而非客观事实本身。美国学者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他的《元史学》<sup>47</sup>一书中阐述了历史叙述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联，并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归纳而言，他认为，“只要历史学家继续使用通常的教育言辞和写作，他们关于往昔的表述以及他们关于这些事物的思想仍将保留‘文学性’——‘诗化’和‘修辞’——一种完全不同于任何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话语方式”。<sup>48</sup>在这个层面来说，书写者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很难不加入想象与虚构的成分，而将零散的历史骨架组织成叙事化的历史陈述。因而在历史书写中，选择什么样的材料，并如何对这些原始文献解读，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作者本人的文化感知、体验乃至回忆等维度的影响，以为自己的立场与目的佐证。

---

<sup>47</sup>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sup>48</sup> Hayden White, “An old Question Raised Again: Is Historiography Art or Science”, *Rethinking History*, 4.3 (2000): 391。本文所引翻译部分参见杨小辉译〈创造历史与讲述历史〉，《书写历史（第一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页19。

回到本节最初提到的问题,《憩园词话》的诉说是为谁而发?杜文澜又是以何种身份来讲述这一段历史?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联系着杜文澜一直在书中试图重现的“故人”、“故地”,以及试图在文字中重现回忆与建构联系的努力,这些选择与建构恰恰印证了杜文澜在《憩园词话》中汇集“同人”的野心与历史事件本身的互动。“同人”是一个双向的词语,它牵扯到这一词语发出者和诉诸的对象,并试图把二者联系成一个整体。在杜文澜的叙述中,始终将自身置于江淮词学圈的“同人”中,他与他们共享一个社交网络,对相同的事件也分享着相似的情感记忆,杜文澜的叙述是为他们而发,也是作为其中一员而发,这种采录“同人”的执着造就了杜文澜叙事的针对性——杜文澜在对材料的选取与编排中致力于将被记叙者编织到他所建构的社交网络。在这个层面上,上文提及的其与《听秋声馆词话》相对的三种书写方式都可以得到解读。

在《听秋声馆词话》中,大多是由时间、地点、人物及简略事件组成的历史骨架,叙事化程度较低;而《憩园词话》则偏重于叙事,并在其中添加了很多细节——我们自然不能证实汤贻汾临死前从容投池的姿态,杜氏也并未亲见其啸咏于自家园林的场景,虽然这些补充不能说一定是不实的,但得到这些细节的过程中,必然包含着杜文澜本人的推测和想象。历史由很多独立的事件构成,其中或许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杜文澜在选择或建构这些细节时,相比于丁绍仪中规中矩的叙述,明显突出了生活细节与社交关系的方面,而对具体时间则选择从略。譬如通过对细节的刻画,杜文澜建构了汤贻汾筑园啸咏的日常生活形象,这种与同在江淮词学圈词人的生活相类的描写,无疑会令该书的潜在读者产生内心情感的共鸣。又如在描写汤氏殉国一事,作者特地点出其所投之处为寄托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出淤泥而不染”理想的“荷池”。在这样的叙述中,汤贻汾的身份从传统史传中,也即丁绍仪叙述中的一门忠烈的爱国将领,向更接近于杜氏词坛同人身份的传统意义上坚贞不屈的士大夫中靠近。同样,关于汤贻汾词稿如何被携出也强化了他与这一词学团体间的联系,这些要素在杜文澜的叙述中都被放大了。作为相反的例证,杜氏之所以忽略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首先自然是因为其定位并不在于以个人为中心的词人传记,另外,鉴于“粤寇陷白下”这一事件对当时江淮地区的词人群体来说是一件众所周知的集体记忆,这种忽略也即成了一种身

份的强化。

不同的叙事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读者的认知，从而达成作者预设的目的。通过这两部词话的刻画，汤貽汾给读者带来了极为不同的印象。丁绍仪笔下用大段笔墨描写汤貽汾及其父祖辈的仕宦经历，塑造汤貽汾是传统史传中常常出现的忠君爱国的将领形象；而杜文澜的叙述中则成功将汤貽汾建构成生活在江淮地域的老年词人，加强了他的词人身份而淡化了他的武官身份，从而实现了其隐藏在书写策略之后的建构身份野心。

#### 第四节《憩园词话》中叙事情感的复现

正如上文所言，《憩园词话》的书写者和书写对象共处于一个相同的社交网络当中，在词史的变迁之外，他们也共享着相同的生活经验，相似的生活际遇，以及一个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作为讲述者，杜文澜的身份是他们中的一员，在他的描述中，关于词人的叙述和个人的经历、情感及社会历史的叙述混杂在一起，而词作本身也成为了记忆和往昔生活的载体，杜文澜很难跳出自身的经历，去看待这些作品。这就导致了《憩园词话》不可能成为纯粹意义上的“词”话，而不可避免得在关于词学、词史、词人的叙述中夹杂了整个词学网络所包含的集体情感与记忆。这种情感与记忆汇集在一起，令《憩园词话》本应客观的词人记事之中，带有了某种普遍的情感。我们可以试看以下几个段落。

姚稚香大令辉第，一字子箴，河南辉县人。弱冠与道光戊戌科进士，以知县即用发江苏，一权上海县，以催科被议。复官后，抑郁而终。<sup>49</sup>

才子福薄，今古同归，如吾乡张仲甫舍人，垂老孤穷，抑郁而歿。差幸逾八秩，耳聪目明，得鹿鸣重宴，或所谓将寿补蹉跎耶。舍人名应昌，由归

<sup>49</sup> 【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卷1734，页281。



安籍改归钱塘，为兰堵中臣次君。孝友驯谨，无贵介气。嘉庆庚午举于乡，时中丞抚闽疏谢，奉仁庙硃批，有览奏欣慰之谕。援例为内阁中书，将补官，疾作，幡然南归，键户著述。有春秋属词辨例编六十四卷，夏子松侍郎疏呈乙览。此外辑录甚夥。诗集名彝寿轩，附烟波渔唱词四卷。君之子若孙均先逝，遇寇乱，依兄子惕斋太守于江西。未一年，惕斋又故，不得已客苏州。当道怜之，延主平江书院，修葺甚微。余以世执得相往还，手赠诗词集。今舍人亡已数年，重读所作，辄复悲之。<sup>50</sup>

吾乡宦裔凋零，以沈西隰观察为最。观察名涛，一字匏庐，嘉兴籍，嘉庆庚午举人。由江西知县，官至福建兴泉永道。罢官后，以其次子健亭刺史需次江苏，侨居泰州，旋终旅邸。观察幼有神童之誉，精赏鉴，富收藏，酷好碑刻。长子花淑大令宰吴江日，曾为姜石帚建祠于垂虹桥侧，亦有风雅名，惜早逝。观察老年穷困，所藏及身，已有散失。健亭继卒，家室荡然。赖同里张少渠大令敦古谊，为求佳传，列入新修府志中。其诗词稿无人为之刊刻。余与往还日，已不复能谈文墨矣。<sup>51</sup>

丽生诗友，有同里孙次公广文澍，其诗曾刊行。并有避月词，惜已同归劫火。归禾后，访知住小绿坡，双目已瞽。曾因丽生索余分书楹联，潦草应教，欲访晤，遽闻考终。<sup>52</sup>

在《憩园词话》中，这样的情节比比皆是。往日的欢乐对照着后来的抑郁，往日的辉煌对照着后来的穷困，往日的风雅才华对照着后来的不复文墨，往日的贵介显赫对照着后来的声名败落，往日的生对照着后来的死，过去的的生活总是和眼前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昔盛今衰”式的叙事情节贯穿了《憩园词话》记事部分的始终。

---

<sup>50</sup> 同上，页 337-339。

<sup>51</sup> 同上，页 342-343。

<sup>52</sup> 同上，页 426。

从《诗经》中的〈黍离〉开始，这样的昔盛今衰之感往往与重大国变联系在一起。诸如《陶庵梦忆》中“以笠报颡，以蕢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絺，仇轻暖也”<sup>53</sup>，命运的强烈对比在回忆中被记录与放大，形成了巨大的悲剧张力。《憩园词话》中蕴含的情感内涵正与这种传统的慨叹十分相类，所区别的是，张岱（字宗子，号陶庵，1597-1679）的切入点是个人的自我命运，而杜文澜则是以旁观者的角度书写其平生交游的词坛同人的命运；《陶庵梦忆》本身即是回忆式的个人生活史，而《憩园词话》的叙事则是隐藏在“词话”的形式背后。

然而不管表现为何种形式，既然是“今昔对比”，在书写者心中，“今”与“昔”之间大多横亘着某种巨变。据金吴澜（字螺青，生卒年不详）〈杜小舫方伯校注戈选宋七家词序〉<sup>54</sup>记录，杜氏开始着力于词学活动大致始于咸丰七年任泰州签判和蒋春霖等人交游之后，其时正值太平天国之际，自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军攻破南京成立天京以来，江南地区一直是两军交战的重要战场，从而承受了巨大的灾难。大量人口死亡散佚，经济凋落，荒村遍野，仅就当时杜文澜游宦的扬州地区而言，咸丰三年、咸丰六年（1856年）和咸丰八年（1858年）扬州城就曾被三次攻克。据《李文忠公奏稿》所载，同治二年李鸿章奏称“苏省民稠地狭，大都半里一村，三里一镇，炊烟相望，鸡犬相闻。今则一望平芜，荆棒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sup>55</sup>，昔日繁华倏忽间化为乌有，更遑论战时大量死伤的官绅军民，这样强烈的冲击显然对亲历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但是，尽管历史本身为杜文澜提供了足够感怀的理由，我们却不能说杜氏叙

---

<sup>53</sup> 【清】张岱，《陶庵梦忆》（北京：中华书局，2008），页1。

<sup>54</sup> 据【清】金吴澜〈杜小舫方伯校注戈选宋七家词序〉载：“咸丰丁巳（1857），方伯由海州签判移属泰州签判，（金吴）澜与陈叶篋上舍同在署斋，时与蒋鹿潭盐尹、丁葆庵明经往来。两君皆精词学，不免故技渐痒，相与讨论。其时方伯偶一为之，亦未精善，岂知方伯专心讲求，不数月而为鹿潭、葆庵所钦佩”（《宋七家词选》，曼陀罗华阁重刊本，光绪十一年刻），可知杜氏学词历程。

<sup>55</sup> 【清】李鸿章，〈筹賑收复地方并酌請蠲免漕粮片〉，《李文忠公奏稿》卷三，民国十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金陵原刊本，页44。

事中“今昔对比”所带来的悲剧色彩只是如实记录了乱世给词人带来的悲惨命运。与张岱等遗民所经历的情况不同，长达14年的战争不像某一个易于界定的标志性时刻，将作者人生前后截然划分开来。这场对于清统治者来说胜利的胜利战争，以惨重代价后的统治的秩序重新恢复告终，大量移民被迁入，废弃的农田重新得到开垦，流离者渐渐重归故土。然而，与经历兵戈之前相比，无数人的生活与命运在变化后的这个时代毕竟已经彻底改变了。这样变与不变间的暧昧空间，并不像遗民词人之于新王朝建立的事实一样，能够轻易区分开，从而把所有欢乐都隔绝在“泾渭分明”的美好往日。因而《憩园词话》所给出的具有明显对比色彩的叙述里，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分水岭，也是模糊与因人而异的，如汤贻汾等因兵事殉国或张应昌（字仲甫，1790-1874）等因兵事四散流离者自然不乏其人，但是还有很多人的人生悲剧与咸丰兵事看似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如以“催科被议”的姚辉第或者老年穷困家室荡然的沈涛（字西雍，1792-?）。

但这样的差异并不证明杜文澜在《憩园词话》中记录诸多词人的人生的命运落差时没有其寄寓杜氏本人的情感，而只是出于如实记录这一词人群体人生命运而产生的巧合。因为无论如何，书写者本人在众多史料、回忆与轶事中选择了所记录下的内容，这种选择本身就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书写者本人对其人其事之看法和感情，如果在对不同人的记叙上，书写者所选择的事件的内容或结构发生很大程度的重合，那么这些重复之处很可能就是作者本人某种自我情感与意识的折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一书〈复现：闲情记趣〉一章中找到一种理解的通道，在这章中宇文认为回忆是一场仪式，作者在这种仪式中复现着他们自己，在这场仪式中，熟悉的故事被反复改写，而在新的场景背后，则隐藏着某种不变的核心<sup>56</sup>——这种见解与西方哲学“永恒的复现”<sup>57</sup>一说可谓不谋而合。体现在作品中，作者在表层的叙事之下，复现着

---

<sup>56</sup> Stephen Owen, *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中文译文部分参见郑学勤译，《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北京：三联书店，2004），页 113-128。

<sup>57</sup> 永恒的复现或称永恒轮回，在古典时期的埃及、印度和希腊皆有类似的见解，其后尼采受到古希腊哲学家如赫拉克利特影响，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哲学反思。这一学说认为，

某种相似的主题，尤其是当这种叙事牵涉到作者本人的情感记忆，那么作者本身无法舍弃、无法解决也不能忘却的问题常常会反复投射在叙事的深层结构当中。和《浮生六记》一样，《憩园词话》可以视作一部回忆式的作品，在《憩园词话》中，作者虽试图客观记述所收录的词人生平，然而在行文过程中，这些“昔盛今衰”式的叙述模式正是这种类似的“复现”存在。

因此，在《憩园词话》中，虽然诸多词人的人生际遇、生活背景与最终命运各不相同，但重复出现的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却同样隐含着杜氏对命运的无常与不完满的焦虑的核心。与其说咸同时期的江南兵事带来了杜氏所书写词人的命运的转变，不如说这一事件引发了杜氏对“今”与“昔”之间不可解决也无法释怀的巨大反差的关切，这种反差不停复现在杜文澜的叙述之中，从而造就了《憩园词话》中“昔盛今衰”之慨的情感模式。

## 第五节 总结

综上所述，《憩园词话》是一部杜文澜旨在记录当时词坛同人而书写的词话作品，其内容大致分为两部分，第一卷是对自身词学观的概括，第二至六卷则记录了其平生所历词人的生平、词作与交游。然而在第二部分中，杜文澜存人的标准与他第一部分所阐述的自身的词学观却有着明显的出入，归其原因是写作目的不同所致，第一部分杜文澜是以独立的词学家的身份表达自身的词学观点，而第二部分则是以词坛同人的一员来追忆其所处词学网络的故事，因而在第二部分中，杜氏在叙述中寄予了很多自身的情感，其存人的标准也与第一部分严苛的词学理论相悖。而杜文澜记录词人生平事件的叙事方式中注重细节与社交活动的特点也与其第二部分“存录同人”的目的有着直接关系。正是因为杜氏以“同人”的身份记录词坛旧事，在对很多词人叙事中，很难摆脱自身情感的影响，比如在记叙很多词人生平的过程中，常常隐藏着一种“过去”与“现在”对比的叙事模

---

宇宙间万物皆是永恒重复的，如同永远转动的轮子，只是围绕某一中心的循环。

式，这种叙事模式，恰恰是因当时当地战乱频仍而导致的“昔盛今衰”情感复现的折射。

### 第三章 《憩园词话》词人群体的聚合

#### 第一节 作为词学家的杜文澜

小楼纵目，遇骤雨初晴，万山环笑。艳游正好。看苏堤数里。垂杨芳草。  
十日行吟，遍访名岩胜沼。问啼鸟。自南渡至今，遗恨多少。

人去花事杳。倩妙手留香，怕随春老。翠云四绕。向图中认取，燕昏莺  
晓。尚悔来迟，旧约探梅误了。待重到。圣湖边、细寻鸿爪。

——〈扫花游〉<sup>1</sup>

这首〈扫花游〉并未收入杜文澜的词集《采香词》之中，而是作为压轴之作，出现在《憩园词话》的末篇。《憩园词话》第二至六卷收录了百位同人，最后以杜氏本人平生游历所闻所录八则词事结尾。在八则中最后一则，杜文澜备述其晚年所居“憩园”落成之事：“前于庚子春，在里居之西，辟地数亩，累石疏池，小葺亭榭，颜曰憩园，为归老计。至戊寅五月，始得移居园中，以消长夏”<sup>2</sup>，杜氏平日园间啸咏，忆及西湖之游，延请画家顾沅（字若波，1835-1896）为作“苏楼春眺图”，并附上了这阙题画之词，以“聊志游情，以丐同人珠玉”<sup>3</sup>结束了整部词话。

词话以憩园为题，亦以憩园结尾。此词为忆游题画之词，然而作者将此词与“憩园”落成一事并入一则，置于词话末篇，显然更有深意。同很多杜文澜的词作一样，这首词是一首忆旧之作，词上阙记游，下阙追忆。开篇以“小楼纵目”领起，登高远眺，骤雨初晴，所见为西湖胜景，再思及十日行游，所览名胜更不仅于此。上阙在这里行将结束，然而在这时作者并没有紧承之前所记良辰美景赏

<sup>1</sup> 【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卷1734，页670。

<sup>2</sup> 同上，页669-670。

<sup>3</sup> 同上，页670。

心乐事的情绪，而以“问啼鸟。自南渡至今，遗恨多少”一句作为了对杭州之游的收束。“南渡”对于杭州来说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杭州作为南宋时期的首都，是国家经历了重大变化后的寄居之地，而同时，这一素有天堂之誉的城市又因南宋定都而达到了繁华的高峰<sup>4</sup>，屈辱与繁华的矛盾在这一东南名郡身上共存，丰富了这座城市的记忆与历史，各自成为后世作者题咏的主题。而杜氏书写此词之时距宋室南渡已七百余年<sup>5</sup>，十余年前的太平天国战争在这座城市仍留下重重印记<sup>6</sup>，“国破山河在”，山水形胜依旧可堪艳游，唯有啼鸟尚知兴亡余恨，盛衰之感，不言而喻。

下阕以“人去花事杳”领起，写艳游既返的感怀和遗憾。春天与花朵代表着美好的时光，然而这样美好的时光与人一起远去了，只留下图画堪做记忆的承载，何况又误了探梅的旧约，只能期待故地重游弥补遗憾了。这里用“鸿爪”来形容作者重谱与梅花旧约愿望，化用了苏轼（字子瞻，1037-1101）“泥上偶然留鸿爪，鸿飞那复计东西”<sup>7</sup>的名句，鸿爪顷刻之间便可被雪片覆盖，如同人事缘分的偶然与短浅，然而即使如此微缈的希望，作者仍着意要“细寻”，可见对这一旧约的珍之重之。

这首题画词句句切中西湖之游与题画的主题，然而在其中又同时涵蕴了极其丰富的情感内涵——城市的兴衰变迁，人事和美好时光的离散，试图将逝去光阴呈现在纸面上的努力，与对不能实现的旧日约定的尽力挽回。我们会发现这些感怀与《憩园词话》的主题内容不谋而合，这首压卷之词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作者关于创作《憩园词话》的自述。不管是收录同人词作，记载词坛本事，还是作者

---

<sup>4</sup> 关于当时临安的繁华，可参见宋人笔记如周密《武林旧事》（北京：中华书局，2007）等，均有详尽记载。

<sup>5</sup> 靖康之难爆发于1127年，杜氏书写此词之时为1878年，相距751年。

<sup>6</sup> 杭州在太平天国期间被两次围城，士民兵卒死伤无数，佚名《东南纪略》（光绪年间刊）载杭州府曾有一次受屠14万人的记录，整个战争使“杭州府损失人口300万，人口损失率为80.6%”，参见曹树基、李玉尚《太平天国战事对浙江人口的影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五期，页33-44。

<sup>7</sup> 【宋】苏轼，〈和子由澠池怀旧〉，《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页97。

在词话中蕴含的昔盛今衰的叙事情感，都如同这幅画一样，是作者个人试图留住转瞬即逝的“鸿爪”的努力，诸多词人聚合在词话中，就如同画卷上记录的景色，以杜文澜的视角得以再现。因而我们试图通过这部词话考察这些词人的社交情况，就如同我们试图通过这幅图画回顾杭州的山水，首先需要对杜文澜本人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有所了解。因而本章旨在介绍杜文澜的个人生平经历及其参与的词学活动，藉此分析出杜文澜如何将这零散的词坛故人故事聚合成一个“同人”群体，这一群体是怎样被呈现的、有什么样的内部构架，以达成杜氏创作这部词话的初衷。

杜文澜，字小舫，浙江秀水人<sup>8</sup>，现人对杜文澜本人生平的了解，主要根据俞樾<江苏候补道杜君墓志铭><sup>9</sup>所载，及其本人《曼陀罗华阁琐忆》<sup>10</sup>以及零散存留的一些文章或序言所录。除了词学家的身份之外，杜文澜在社会中扮演了多重的角色。

作为一名官员，杜文澜主要的社会身份是一名“良吏”<sup>11</sup>与“干吏”<sup>12</sup>。杜氏少孤，依随其舅褚棨先生学法家之言，早年为襄阳府吏，以善定狱闻名，后入赘为县丞<sup>13</sup>。杜文澜入仕初期受裕泰（他塔拉氏，谥庄毅，？-1851）<sup>14</sup>提携，其后曾

---

<sup>8</sup> 关于杜文澜的身世详情，朱德慈的《近代词人考录》中有详细记载。

<sup>9</sup> 【清】俞樾，<江苏候补道杜君墓志铭>，载于缪荃孙《续碑传集》卷三十八，收录于周俊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4》（台北：明文书局，1985），页117-203。

<sup>10</sup> 【清】杜文澜，《曼陀罗华阁琐记》，咸丰同治间秀水杜氏刊，光绪十八年（1892年）上海席氏扫叶山房重修本。

<sup>11</sup>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曼陀罗华阁丛书提要>中评价杜文澜：“是文澜非独良吏材，亦词人之有深致者也”，可见杜氏在时人眼中主要身份为“良吏”，《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济南，齐鲁书社），页30-165。李肇增于<采香词序>亦有言：“余自涉江还北，旅寄东亭，时闻乡父老言杜公忧民，埽古良吏”，《采香词》，光绪十八年（1892年）上海席氏扫叶山房重修本，页1。

<sup>12</sup> 严迪昌，《近代词钞》（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文澜娴于吏治，称干才”，页879。

<sup>13</sup> 早期杜文澜官职履历参见《憩园词话》自述：“忆余入仕之初，第一知遇，为裕太傅庄毅公。次则粤东姚补之观察，番禺籍，讳华佐。由幕而官，初权湖南郴州牧，补凤凰



国藩又对其有知遇之恩<sup>15</sup>，积功至盐运使衔，其后主要担任盐务官员。杜文澜本人于其《淮鹺纪略》中曾备述其为官经历：

余少肄举子业，苦钝蹶，就学佐治家言，游诸大府幕，遂入仕。以运判荐历两淮间，计海州、通州、泰州分司三，监掣同知亦三，泰坝、淮南北是余承乏者五，惟淮南监掣未历耳。同治二年五月，猥膺荐牍，以监司督章（赣）皖楚鹺务，驻汉皋地，历俸十四载，领官六、七除，行年今已五十，皆惟管

---

同知，护辰沅道。丁艰后，拣发湖北，补襄阳府丞，总理武昌鹺局”。见《续修四库全书》，卷 1734，页 659-660。〈采香词提要〉中亦对其生平仕宦有所归纳：“文澜（嘉庆二十年至光绪七年，1815—1887），字小舫，号憩园（有《憩园词话》六卷），别号采香舟主人，（著《曼陀罗华阁琐记》二卷），又别署采香（有《采香词》二卷或四卷，卷一三十九首，卷二四十三首，共计八十二首；亦称曼陀罗华阁词），室名曼陀罗华阁（有《曼陀罗华阁丛书》十六种一百四十八卷）。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少孤，家贫，母子往依其舅，兼习刑律，久客湖北。受聘于襄阳府，以善定狱享名，旋入蕲为县丞。时值太平军兴，入为湖广总督裕庄毅（裕泰）幕僚，征湖南起义军李元发，攻克扬州，有功，加盐运使衔，历署江苏布政使，江安粮道，苏松太道，常镇通海道。”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页 16-620。

<sup>14</sup> 裕泰，满洲正红旗人，谥庄毅。时任湖广总督。详见《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98），页 11616。

<sup>15</sup> 事见【清】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4）：“秀水杜小舫方伯文澜始以钱幕入仕，曾文正至金陵，颇不然之。适由行台移节府，见堂室所揭楹联，于人地事事切合，奇赏之。询为杜之手笔，即延见，谈至盐务、洋务，尤指画详明，并条陈利害，灼然可行，叹为奇才。旋奏署江宁藩司，由是徧历三司五道，然未曾引对入都也。及沈文肃公葆楨莅任，乃以嗜好太深，劾之去职。”页 1436。又见曾国藩致曾国荃家书：“杜小舫文澜往年经郭雨三专函力保，去年又经晏彤甫函保，故余一见即器重之，许以驻汉口办督销局务。”【清】曾国藩，《曾国藩家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页 398。

榘勤冰（？）兢励雪濯焉。<sup>16</sup>

俞樾于<江苏候补道杜君墓志铭>中亦有记载杜氏“历署江藩、苏藩、苏泉、江安粮道、苏松太道、常镇通海道”<sup>17</sup>。杜氏以府吏起家，官至江苏候补道，其仕途顺利与自身的勤奋与干练不可分割。《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淮盐纪略》中记载“同治二年，曾国藩试行淮盐，以文澜习盐事，召与所定章程，皆文澜参与”<sup>18</sup>，杜氏公务之精娴，曾国藩对其之器重皆可一见。杜氏本人对政务也颇为看重，曾做有《平定粤寇纪略》<sup>19</sup>等书籍，皆有传世。

除了官吏身份之外，杜氏现存的作品还包括《古谚谣》<sup>20</sup>、《艺兰四说》<sup>21</sup>、《初学史论合编》<sup>22</sup>等，亦曾编校过《玉纪》<sup>23</sup>，此外与当时著名画家顾沅、吴昌硕等人均有交集，可见其是一个涉猎广泛，爱好丰富的人。

然而尽管杜氏本人公务繁重且爱好众多，他对词学仍倾注了相当大的精力。杜文澜本人的词学贡献简要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他本人的词学创作。杜氏本人有词集《采香词》传世，现存一卷、二卷与四卷本<sup>24</sup>。关于杜文澜的词学成就，历来多与其同时的蒋春霖并称对举，《卧

---

<sup>16</sup> 【清】杜文澜，《淮盐纪略》，载于《近代史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1987），总66号，页2。问号原文即有。《淮盐纪略》一名《淮盐纪略》。

<sup>17</sup> 【清】俞樾，<江苏候补道杜君墓志铭>，载于缪荃孙《续碑传集》卷三十八，收录于周俊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4》，页117-203。

<sup>18</sup>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页7-331。

<sup>19</sup> 【清】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光绪十八年（1892年）上海席氏扫叶山房重修本。

<sup>20</sup> 【清】杜文澜，《古谚谣》，光绪十八年（1892年）上海席氏扫叶山房重修本。

<sup>21</sup> 【清】杜文澜，《艺兰四说》，光绪十八年（1892年）上海席氏扫叶山房重修本。

<sup>22</sup> 【清】杜文澜，《初学史论合编》，光绪十八年（1892年）上海席氏扫叶山房重修本。

<sup>23</sup> 【清】陈性，《玉纪》，光绪十八年（1892年）上海席氏扫叶山房重修本。

<sup>24</sup> 关于《采香词》不同版本可参见吴熊和、严迪昌、林玫仪合编，《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

庐词话》云：“与蒋（春霖）同时唱和而工力悉敌者，有秀水杜小舫文澜。其采香词二卷，八十二首，几於首首可传”，“读蒋杜二公之词，觉白石、梅溪，去今未远。天挺二老於咸同之际，亦词界之中兴也”<sup>25</sup>。然而这种说法并非为全部人所接受。一般而言，对杜文澜词作的评价主要侧重于其委婉的风格，谢章铤评价杜文澜词云：“词清笔婉，言外殊多感慨。”<sup>26</sup>就杜氏的艺术成就而论，《续修四库全书书目提要·采香词》中对杜氏词作“以文澜与春霖并称，似乎言过其实，然蒋词博大，杜词精整，各有所长，未可忽也”<sup>27</sup>可谓确评。

其二是校订整理词学文献，杜氏校订并刊刻了梦窗词与万树词律，并有《词律校勘记》行世。这两项成绩一向被词学界广为认可，朱祖谋与吴梅在校订梦窗词时皆将杜刻本作为重要的资料加以借鉴<sup>28</sup>，而杜氏因其对词律的校订更被誉为“万树之功臣”<sup>29</sup>。

其三即是他对当时地域词坛的贡献。除了协助蒋春霖刊刻《水云楼词》之外，杜文澜还进行了很多词集的收集和整理的工作，亦参加当地词坛的唱酬，《憩园词话》中就记录了不少这样的情形，比如杜氏曾帮助姚辉第校刊词稿，他人有词作也投递给杜氏，俨然杜文澜成为当地词坛的中心人物。

然而在研究杜文澜对词坛的贡献与意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一种情况，即鉴于杜氏的身份和地位，很多词学活动虽然署名为杜氏，但可能并非全为他一人之贡献。林枚仪教授曾考证刘毓崧（字伯山，1881-1867）《通义堂文集》“有〈重刊吴梦窗词稿序〉、〈重刊周草窗词稿序〉、〈重刊吴梦窗词稿自序〉、〈重刊周草窗词稿自序〉四篇序，其中两篇〈自序〉署明‘代杜小舫观察作’，杜小舫就是杜文澜”<sup>30</sup>。

<sup>25</sup> 【清】周曾锦，《卧庐词话》，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页4645。

<sup>26</sup> 【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页3562。

<sup>27</sup>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页16-620

<sup>28</sup> 邓昭群，《晚清梦窗词学之研究——以校刊、编选为探讨范围》，国立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2007年。

<sup>29</sup> 【清】江顺诒，《词学集成》，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页3236。

<sup>30</sup> 林枚仪，〈词学研究的新资料与新方法〉，“94年度教育部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划：人

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较为纯粹的词学家如蒋春霖，面对著述的丰富和仕宦经历的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讨论作为词学家的杜文澜及其建构的词学网络时，不可避免要将其人生的其他方面纳入考量范围。

## 第二节 杜文澜词学交际概述

一般而言，词人间相互的交往与活动主要包括组织或参与词社、同辈间词学唱酬及词学典籍的辑校刊。在《憩园词话》中所体现的词学网络中，同样包括了这些词坛活动。

### 一. 词社活动

词社在清代词学的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词人们依照规律的结社时间针对一致的主题举行词学集会，建构起相对稳定的词学网络。根据《憩园词话》与《采香词》所载，杜文澜参与的主要集社活动有军中九秋词社与“竹抱轩消夏集”，另外《憩园词话》中有记载杜氏本人并未参与的顾文彬组织的“秋社”。通过这些词社，杜文澜广泛结识了一时一地的词学才俊，是杜文澜词学网络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 1. 军中九秋词社

军中九秋词社，又名“九秋社”，是当时最具规模的词学活动。据《憩园词话》所载，同治癸亥年（1863年）<sup>31</sup>，两淮军事渐趋稳定，由时任两淮盐运都转的金安清发起于当时的扬州军中，“所作秋角秋堞等题”<sup>32</sup>，参与九秋词社的词人包括金安清、杜文澜、蒋春霖、宗源瀚（字湘文，1834-1897）、钱勛（字揆初

---

文教育——提升文史哲素养；分项计划三：提升文学习作课程改进计划”讲稿（未出版），2005年。

<sup>31</sup> 陈水云，〈咸丰、同治时期淮海词人群体综论〉一文中作同治元年，即1862年，疑非。《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60卷第6期，页824-830。

<sup>32</sup> 【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卷1734，页385。

(1826-1867)、黄文涵(字子湘,生卒年不详)、张熙(字子和,1810?-1867)、黄涇洋(字琴川,1830-?)、姚辉第九人<sup>33</sup>。此社集结九人,共拟九题,故名之为九秋词社<sup>34</sup>。

目前保存比较完整的“九秋社词”见于蒋春霖词集中,据周梦庄《水云楼词疏证》所考,其所作九秋词包括:《霓裳中序第一·秋袴》、《霜叶飞·秋栢》、《长亭怨·秋堠》、《辘轳金井·秋灶》、《一枝花·秋镒》、《夺锦标·秋幢》、《烛影摇红·秋幕》、《疏影·秋堞》、《水龙吟·秋角》<sup>35</sup>。在《憩园词话》中,杜氏选录姚辉第《疏影·秋堞》一阕,另提及其本人《采香词》中收录的《辘轳金井·分赋军中九秋得秋灶》<sup>36</sup>一阕,亦与蒋氏同调同题。根据杜文澜“得秋灶”一题,当时词社应为每人一题,共计九人,分赋九种,而蒋春霖词集中九阕却涵括了所有九题,杜文澜本人于《憩园词话》亦有言“拙作<秋灶>已刊入《采香词》,余

---

<sup>33</sup> 万柳,《清代词社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中论及“另谭献《复堂词》卷二有词<最高楼·金眉老烟雨寻鸥图卷中有王定甫通政、陈实庵编修、蒋鹿潭大使、宗湘文郡守及眉老唱和词>,如果此处所指乃是九秋词社,则参与者还有王定甫、陈实庵等。”

(页256)此说为仅见。按郭嵩涛<金眉生烟雨寻鸥图卷序>所言:“同治乙丑王少鹤通政来自京师,眉生招同陈芟裳太史泛舟,为鸳湖之游,相与寻烟雨楼故址。少鹤为赋<木兰花慢>词,芟裳、眉生继之,因为图纪盛。三人者以高才负时重望而拙于仕宦,其于身世之际,凄凉感叹殆过于予,而观其所为词,抚景流连,其词甚悲。”参见郭嵩焘《养知书屋诗文集·卷六》(新北:文海出版社,1966),页239。由之可见,烟雨寻鸥图卷所载之词应为记游之词,与《憩园词话》及《采香词》中提及的“秋社”“以秋为题,分赋九种”体例不符,可见此次聚会应与九秋词社无涉,万柳所言“此处若指九秋词社”似无根据。

<sup>34</sup> 【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卷1734,页385。

<sup>35</sup> 参见周梦庄,《水云楼词疏证》(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页137-142。疏证云:“一九三三年汉文正楷印书局本水云楼词全集,收录鹿潭翁军中九秋词九阕于水云楼词补遗中。同年八月出版的词学季刊创刊号,也刊载蒋氏军中九秋词。”

<sup>36</sup> 【清】杜文澜,《憩园词话》:“拙作<秋灶>已刊入《采香词》,余未存稿。”见《续修四库全书》,卷1734,页385。此词见《采香词·卷三》,光绪十八年上海席氏扫叶山房重修本,页4。

未存稿”<sup>37</sup>，疑似亦有其余社中作品。因而可以推断词社或举行多次，或词社后有相关后续活动，以便社中诸人均得题咏诸题。

九秋词社规模虽小，然而由于清廷与太平天国连年战事，当时江北大营汇集了江南地区的各路俊才，再加之原本即在扬州的盐官群体，九人中或如金眉生、宗源瀚等一方大吏，或如蒋春霖等专精于词的词家，因此这一词社在江淮词坛亦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流风所及，对周遭文人词学创作亦有一定影响，据《憩园词话》记载：

同治甲戌秋，余权常镇道篆，丹徒赵次梅广文彦俞（1803-1875）秉铎白门，以瘦鹤轩词刊本见投。自序云：“壬戌游海陵，晤蒋鹿潭于客舍，时兴词会。鹿潭与同人作九秋词，强余拈题，得秋角，赋徵招一阕，许以能词。因知己一言，每遇好词，爱不忍释。”<sup>38</sup>

可见杜文澜所言“文墨之盛，远近所传”<sup>39</sup>洵非虚誉。

九秋词社开始于同治二年，究其时间，尚值杜氏本人学词初期<sup>40</sup>，杜文澜对这一时期的词学活动记忆犹新。这一时期的词学活动奠定了杜氏一生词学造诣的基础，词社的参与者既为军中同事，又是词学上同道，与杜氏关系亲密，很多人对杜文澜其后的词学活动和词学交际亦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 2. 竹抱轩消夏集

消夏会或消寒会往往成为文人雅集的契机，仅就江南词坛而言，嘉庆到道光年间，吴中七子曾于苏州举行过多次消寒会活动<sup>41</sup>，咸丰年间，宋志沂（字铭之，1830-1860）与王寿庭（字养初，1805-1860）亦分别举办过销夏词社与销寒社活

<sup>37</sup> 【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卷 1734，页 385。

<sup>38</sup> 同上，页 437-438。

<sup>39</sup> 同上，页 385。

<sup>40</sup> 据金吴澜<杜小舫方伯校注戈选宋七家词序>记录，杜氏于咸丰丁巳年开始致力学词。见【清】戈载，《宋七家词选》，曼陀罗华阁重刊本，光绪十一年（1885）年刻，页 1。

<sup>41</sup> 参见万柳，《清代词社研究》，页 155。

动<sup>42</sup>，同治年间，潘钟瑞亦于沪上举办过销夏词社<sup>43</sup>。杜文澜曾参与过多种由当地文人组织的消夏活动，其词集《采香词》收录三首消夏集所作词，分别为《忆旧游·竹抱轩消夏初集咏夕阳》<sup>44</sup>，《庆清朝·消夏第二集咏秋露》<sup>45</sup>，《玲珑四犯·竹抱轩消夏第三集依双调赋梧桐》<sup>46</sup>。其中提到了“竹抱轩消夏集”，据《采香词》以时间为顺序的编排体例及前后作品的时代推断，应发起于辛酉（1861年）夏季<sup>47</sup>，此时杜文澜正任职于扬州军中，同参与者为何人及“竹抱轩”位置何处今已无据可考。然而“竹抱轩消夏集”时间较“九秋词社”略早，且同为杜氏于扬州江北大营时期参与的集社，其参与人员大致应略具“九秋词社”雏形，为杜文澜学词早期的词社活动。

除去这次留有词作的消夏集之外，杜文澜还参与过其他由当地文人或官吏组织的消夏活动。《憩园词话·卷六》记载：“（张之万）尚书工书画，（张之京）太守精丝竹，同善收藏，好植花木，而又并爱交游。消夏消寒，时为文酒之燕，同

---

<sup>42</sup> 同上，页 176，页 179。

<sup>43</sup> 同上，页 178。

<sup>44</sup> 同上，页 15。

<sup>45</sup> 同上，页 15。

<sup>46</sup> 同上，页 1。

<sup>47</sup> 按此三词于《采香词》中并不连续，并分属于不同两卷，在竹抱轩初集之前，《采香词·卷二》中标注年份的词依次为《法曲献仙音·庚申长至》（页 6），《陌上花·辛酉上巳同人修葺于莲溪迫事未赴丁保庵示以诗谱此书后》（页 13），《好事近·癸丑冬与黄子湘同从军于邗上重逢话别赋此赠之》（页 14）；在竹抱轩三集之后，《采香词·卷三》标注年份的词为《长亭怨慢·甲寅春别张子和大令于扬州军中各赋长亭怨慢一阙今八年矣海陵重晤谱原调赠之》（页 1），《如此江山·癸亥春登焦山》（页 5），《扬州慢·癸亥春莫有楚江之役阻风瓜洲数日改乘轮船一日夜渡石头城矣旧游如梦余怀渺然》（页 6），《大丑·甲子六月克复金陵志喜呈湘乡爵相》（页 10），均按时间先后排列，竹抱轩诸词介于辛酉年与癸亥春之间，又为消夏之集，因此推断集社时间应为辛酉年。又因《采香词》前两卷为咸丰十一年刻本，后两卷为光绪二年刻本，而竹抱轩消夏集横亘两卷，亦可推知其集社时间应为咸丰十一年之时，即辛酉夏季。

人亦乐就之”<sup>48</sup>，然而张氏昆仲举办的拙政园雅集多作诗文琴酒之会，因爱好者寥寥，并不以填词为内容。

### 3.秋社

与其他两种社相比，“秋社”并非杜文澜本人参与的词学活动，而是由其友人顾文彬组织，杜氏慕其风雅，也予以大量收录。

关于这一词社的组织情况，如《憩园词话》中关于顾文彬的章节所载：“如道光、咸丰间，于都中举秋词社，拈百二十题，各限一调，自作三十余阕”<sup>49</sup>，另外在第六章中亦记录云“前述顾子山观察于都门集社，分咏秋词百二十阕，同作者数十家，惜多遗佚。今以存者检齐见示，如钱萍砮、金吟香、王雨生、周岷帆、朱小筠五家，皆素未见其词卷，今更录合律者各数阕”<sup>50</sup>。在词话中，杜文澜共收录顾文彬的<垂杨·咏秋柳><sup>51</sup>，钱宝青（字萍砮，生卒年不详）的<迷仙引·秋蕉>、<百宜娇·秋鬓>、<八犯玉交枝·秋藤>、<白苎·秋衫><sup>52</sup>，金宝树（字吟香，1800-1857）的<紫玉箫·秋笳><sup>53</sup>，王家亮（字雨生，生卒年不详）的<塞翁吟·秋塞>、<步月·秋屐><sup>54</sup>，周学源（字岷帆，圣祖年不详）的<凄凉犯·秋柝>、<渡江云·秋帆>、<梦横塘·秋芦>、<江城子慢·秋城>、<送征衣·秋砧><sup>55</sup>，朱锡绶（字小筠，1819-1869）的<簇水·秋菱>、<孤鸾·秋镜><sup>56</sup>，王振（字少鹤，生卒年不详）的<玲珑玉·秋磬>、<粉蝶儿·秋蛾><sup>57</sup>，潘曾玮的<谱秋霁·

---

<sup>48</sup> 【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卷 1734，页 663。

<sup>49</sup> 同上，页 360。

<sup>50</sup> 同上，页 624。

<sup>51</sup> 同上，页 360。

<sup>52</sup> 同上，页 624-627。

<sup>53</sup> 同上，页 627-628。

<sup>54</sup> 同上，页 628-629。

<sup>55</sup> 同上，页 629-632。

<sup>56</sup> 同上，页 632-633。

<sup>57</sup> 同上，页 633-635。



本意>、<惜红衣·秋荷><sup>58</sup>，张金镛（字良甫，1805-1860）的<瑶阶草·秋蘚>、<满庭芳·秋草>、<月华清·秋痕><sup>59</sup>，张修府（字蕴六，号东墅，1824-1880？）的<梦玉人引·秋魂>、<卜算子慢·秋枰><sup>60</sup>，钱国珍（字子奇，1813-1865）的<烛影摇红·秋槩>、<玉山枕·秋枕><sup>61</sup>，及无名氏的<芳草渡·秋渡>，<惜秋华·秋色><sup>62</sup>诸篇。根据所录篇名，我们可以发现，此次词社以“秋”为主题，词调与题名因人各异，且所用词牌与所咏之物意义皆有一定关联。

此词社由顾文彬举行于都中，参与者钱宝青祖籍嘉善，金宝树祖籍吴县，其他词人也均为在京的江浙官吏，规模颇为壮观。杜文澜并未参与此次词社，然而这些词人对他说来并不陌生，一些也与他有过几面之缘，如王振，钱国珍等，其余诸人也与杜文澜的社交圈有着或多或少的重合，杜文澜显然乐于与这些词人共享相同的词学传统和重叠的社交网络。

## 二. 唱酬活动

除了定期的词社之外，词人间也常通过互相唱酬切磋词学，增进彼此的联系。在杜文澜的词学历程中，其参与的词学活动可大略分为两个时期，即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活动时期与以苏州为中心的游宦时期。

### 1. 两淮时期

正如上文所言，杜文澜学词始于两淮时期，之前虽然亦有词作，但比较零碎且不成体系。杜氏本人开始对词学产生系统的兴趣与见解，正是在两淮任内与蒋春霖、丁至和等人汇聚两淮之时<sup>63</sup>。据陈水云<咸丰、同治时期淮海词人群体综述

---

<sup>58</sup> 同上，页 635-636。

<sup>59</sup> 同上，页 636-637。

<sup>60</sup> 同上，页 637-638。

<sup>61</sup> 同上，页 638-640。

<sup>62</sup> 同上，页 640-641。

<sup>63</sup> 参见金吴澜<杜小舫方伯校注戈选宋七家词序>记录，杜氏于咸丰丁巳年开始致力学词。见【清】戈载，《宋七家词选》，曼陀罗华阁重刊本，光绪十一年（1885）年刻，页1。

>考证，这段时间大约始自咸丰元年开始，至同治三年杜文澜调任至安庆结束<sup>64</sup>。在这一时期，扬州陆续聚集了诸多词人，其中与杜文澜往来较为密切的主要包括蒋春霖、丁至和、金安清等人，杜氏词集《采香词》的第一次刊刻也在此时<sup>65</sup>。

根据《采香词》所载，这一时期杜氏词作中题名或小序中提及其他词人的词作共计 23 首，涉及最多的词人为蒋春霖与丁至和，各为 4 首，此外黄文涵亦有 2 首，唱和内容则涵盖题画<sup>66</sup>、怀古<sup>67</sup>、咏物<sup>68</sup>、记事<sup>69</sup>、悼亡<sup>70</sup>、忆旧<sup>71</sup>等各个方面。由于这一时期正值战乱，扬州作为江北大营据点<sup>72</sup>，因而此时的唱和主题也多与国运相关，即便咏物、题画之作，也多有“烽火连三月，怪图中柳丝，都减春情”<sup>73</sup>，“休问相思约，江南路、西风都换花事”<sup>74</sup>之类感叹兴衰之句。《卧庐词话》中“天挺二老于咸同之际”<sup>75</sup>等称誉，即是对此时蒋、杜二人与国事相关的创作而发。

## 2. 游宦时期

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时局渐趋稳定，杜文澜本人宦途顺利，历任三司五道，

---

<sup>64</sup> 陈水云，〈咸丰、同治时期淮海词人群体综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 年第 60 卷第 6 期，页 824-830。

<sup>65</sup> 【清】杜文澜，《采香词》，咸丰十一年（1861 年），曼陀罗华阁刻本。

<sup>66</sup> 如〈瑶花·题丁保庵十三楼吹笛图即次其自题韵〉，【清】杜文澜，《采香词·卷一》，页 12。

<sup>67</sup> 如〈声声慢·袁江感怀赠江佩之〉，同上，页 8。

<sup>68</sup> 如〈眉妩·咏扁豆花次丁保庵韵〉，同上，页 12。

<sup>69</sup> 如〈陌上花·辛酉上巳同人修禊于莲溪迫事未赴丁保庵示以诗谱此书后〉，（清）杜文澜，《采香词·卷二》，页 13。

<sup>70</sup> 如〈长亭怨慢·悼顾莺娘为鹿潭作〉，同上，页 9。

<sup>71</sup> 如〈好事近·癸丑冬与黄子湘同从军于邗上重逢话别赋此赠之〉，同上，页 14。

<sup>72</sup> 江北大营今在扬州市邗江区。杜文澜〈好事近·癸丑冬与黄子湘同从军于邗上重逢话别赋此赠之〉（同上，页 14）可见，杜文澜于咸丰三年（1853）起即投入江淮军事工作。

<sup>73</sup> 〈忆旧游·题鲍问梅西湖感旧图〉，（清）杜文澜，《采香词·卷一》，页 13。

<sup>74</sup> 〈眉妩·咏扁豆花次丁保庵韵〉，同上，页 12。

<sup>75</sup> 【清】周曾锦，《卧庐词话》，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页 4645。

其中于苏州任期最长，其所唱和对象及集会地点也多位于苏州境内<sup>76</sup>。这一时期杜氏参与的唱酬活动明显较往常增多，自同治三年到光绪三年冬杜文澜罢官归里<sup>77</sup>，其直接或间接提及友人的作品在《采香词》中所占的比重大大增加。以<大丑·甲子六月克复金陵志喜呈湘乡爵相><sup>78</sup>为界，太平天国战争之后，《采香词》共收录杜氏这一时期的作品 70 首，而其中涉及到同人唱酬的作品共计 35 首，金安清与恩锡分别以 5 首与 4 首之数成为这一时期杜氏主要的唱酬对象。

在这一时期，杜氏所参与的词坛活动也更为丰富。首先，就内容而言，词人们唱酬赠答的情绪不再限于感时伤事，题咏内容也更倾向于日常，如<绛都春·春草携吴愉庭观察泛舟山塘载花而返><sup>79</sup>，<双头莲令·六月二十四日携愉庭由望新桥登舟至黄天荡观荷><sup>80</sup>，赏花题词，颇具文人雅趣。又如有些作品虽然没有注明唱酬者为何人，如<踏莎行·春晓次韵><sup>81</sup>、<菩萨蛮·春闺次韵><sup>82</sup>、<碧玉箫·分咏春灯词禁离愁别苦诸字><sup>83</sup>等，仅从其题名就可见当时题咏春情之闲逸，与扬州军中分咏“九秋”大相异趣。

其次，就词学活动的规模来说，词人自发组织的唱和或集会所影响与波及的范围皆有所增加。《憩园词话》也不吝笔墨描绘了光绪四年（1878 年）由金安清首发的《满江红》唱和活动：“光绪戊寅四月，嘉善金眉生廉访造偶园落成，广招二三百里内友人，作文酒之会。潘季玉观察首唱《满江红》数阕，同人迭为赓

---

<sup>76</sup> 参见《清代吴中词派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sup>77</sup> 据《憩园词话》载：“丁丑春间，觅得咸淳临安志、西湖游览志等书……是冬，罢官旋里，游志益坚”，可见杜文澜于光绪丁丑年（1877 年）免官。【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卷 1734，页 666。

<sup>78</sup> 【清】杜文澜，《采香词·卷三》，页 10。

<sup>79</sup> 【清】杜文澜，《采香词·卷四》，页 7。

<sup>80</sup> 同上，页 16。

<sup>81</sup> 【清】杜文澜，《采香词·卷四》，页 9。

<sup>82</sup> 同上，页 9。

<sup>83</sup> 同上，页 11。

和”<sup>84</sup>，在这次活动中，参与的人除潘曾玮外，仅为词话所记录的则还有李鸿裔（字眉生，1831-1885）<sup>85</sup>、吴云<sup>86</sup>等人。此外，约在同治十一年前后，杜氏与恩锡开词坛于吴中，一时参与者也十分众多。《采香词》中即记录有<歌头·四时行乐词，竹樵方伯师命和即用唐词原韵><sup>87</sup>、<六州歌头·闺中四时行乐词与竹樵师同作用韩南涧体><sup>88</sup>等词，与之相对，恩锡与杜文澜当时词友俞樾《春在堂词录》亦有同调的<歌头·四时行乐词和竹樵方伯，此调自唐庄宗一首外未见有作者，万氏词律于后半阙未注句读，且止三韵，殊为疏略。竹翁原唱于后半第三句、第五句均叶韵，遵词谱也，余亦同之><sup>89</sup>及<六州歌头·闺中行乐词和竹樵方伯><sup>90</sup>，可为当时唱酬之盛予以佐证。

最后，就组织形式来说，这一时期的词坛活动的组织形式也更有规律，很多词学活动有了固定的活动地点。当是时，诸多杜氏友人在苏州等地购置园林，如顾文彬之怡园<sup>91</sup>，李鸿裔之网师园<sup>92</sup>，金安清之偶园<sup>93</sup>，张之万（字子青，1811-1897）兄弟之拙政园<sup>94</sup>，名园栖迟，自然不免觞咏之盛，《憩园词话》即有记录“丙子、丁丑间，吴中文讌，多在顾子山观察之怡园”<sup>95</sup>，稳定优雅的生活环境为词人唱酬交流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

<sup>84</sup> 【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卷1734，页347-348。

<sup>85</sup> 同上，页347-348。

<sup>86</sup> 同上，页350-351。

<sup>87</sup> 【清】杜文澜，《采香词·卷二》，页2。

<sup>88</sup> 同上，页2。

<sup>89</sup> 【清】俞樾，《春在堂词录·卷三》，页1。见于《春在堂全书》（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页387。

<sup>90</sup> 同上，页3。见于《春在堂全书》，页388。

<sup>91</sup> 【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卷1734，页357。

<sup>92</sup> 同上，页347。

<sup>93</sup> 同上，页347。

<sup>94</sup> 同上，页663。

<sup>95</sup> 同上，页357。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一阶段杜氏常与唱和的词人仍与杜氏保持着密切的往来，除了早逝的蒋春霖之外，在《采香词》与《憩园词话》之中，仍然时见杜氏与两淮时期相识的词友丁至和及金安清的往来。金安清此时定居苏州并参与了当时吴中地区的词坛活动，仍然是杜文澜这一时期主要的唱和对象<sup>96</sup>。杜文澜对仍居扬州的老友丁至和也并未冷落<sup>97</sup>，直到晚年仍与其保持着词作酬答，《采香词》的压卷之作也是寄赠老友的<sup>98</sup>。

### 三.其他活动

除却参与集结词社及词家唱酬之外，当时杜文澜参与的词坛活动还包括以下几项。

#### 1.网罗词家

杜文澜自潜心词学以来，对结识词人与收罗其他词家作品即投入了极大的关注。早在任职两淮之时，即颇以网罗本地词人为己任。金德辉（字子石，生卒年不详）是泰州兴化词人，诗词画均可名世<sup>99</sup>，与杜文澜并不相识。当杜氏从老友丁至和处听闻金氏词名之时，已调离泰州，并在词话中对不识此人颇示惋惜：“忆余在泰州时，晏同甫廷尉师奏派总办兴化、东台、盐城、阜宁四县团练，往来于兴化数四，有此词人，竟未访得。后闻丁萍绿言，始知之，自惭俗吏，可哂也”

---

<sup>96</sup> 金安清晚年居住偶园，本人亦对词坛活动极为热衷，亦常发起唱和，参与当时词坛活动。如《憩园词话》载“金眉生廉访以护惜名花旧事，赋归凤曲，绘为图。复画《江上数峰青》一帧，亦纪其事，索题词”。【清】杜文澜，《憩园词话》，《续修四库全书》，卷1734，页482。

<sup>97</sup> 《憩园词话》载（丁至和）“初幕游大江南北，后至六十外，预修扬州志，归住邗江”。同上，页445。

<sup>98</sup> <思佳客·次丁萍绿见怀韵>，【清】杜文澜，《采香词·卷四》，页17。

<sup>99</sup> 金德辉，字子石，祖籍兴化。其生平参见梁园棣修，赵彦俞、郑之侨纂，《兴化县志·卷八·文苑附录》，咸丰二年重修，刊于《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48》（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页255。

<sup>100</sup>。杜氏用“自惭俗吏”四字形容自己的惋惜之情，这种表达事实上强调了书写者和被书写者在权力上的差异，杜文澜时任于江北军中，而金氏则为一介布衣<sup>101</sup>，杜氏惋惜的理由不仅因其错失词友，更因其未能达到其心中与“俗吏”相对之“雅吏”的标准。事实上，杜氏此时任职盐官兼办兵务，并非统管一方的官吏，而于词人所在地兴化也只限于“往来数四”，不识金氏并非意料之外。而杜氏在书写中却强调了自身官吏的身份，也就是强调了其之于任职地区的职责，显然在杜氏意识中，探访结识词家等风雅之事，本应为“雅吏”之分内责任所在。杜氏对未能收录金德辉所表示的遗憾的个例，恰恰暗示了其以“雅吏”自诩的身份认证，以及更多情况下其履行“雅吏”标准的常态。

随着杜文澜与恩锡开词坛于吴中，俨然已成为吴中当地词坛领袖，这时很多周边词人开始依附于杜氏，杜氏本人也开始更有目的地收罗词作。词话中不乏如“余曾索其（周作熔）残稿，录存数阙”<sup>102</sup>，“余誌其语，遍寻乡人，后知金眉生廉访旧与缔交，思刻其（张金镛）遗词，求稿未得”<sup>103</sup>等关于收罗寻访词人词作的记述，而诸如前文所言赵彦俞<sup>104</sup>等词人，也主动交结杜氏，并以自己的词集见投。杜氏这种收罗词人的热情显然也为其周围诸人所知，乃至其家人及友人亦有帮助其寻访词人之举，如杜氏所得钱官俊（字心庵，1824-1877）之词作即来自其亡子杜延章：“《梦蝶生词稿》四册，戊寅冬亡儿延章自邗上携来，病中未及观，并忘为何人作。今病愈，重理旧秩……因函询君之姓名品概”<sup>105</sup>，据叙述推断，杜氏病愈后不记作者名姓，词集应不是杜氏本人要求，多半出自其子对父亲喜好的揣测而自邗上携来。同样的事例还见于“桐乡严芝僧太史辰，知余有词话之作，

---

<sup>100</sup> 【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卷 1734，页 461。

<sup>101</sup> 事实上，据《兴化县志》载，金德辉实为道光二十五年恩贡。梁园棣修，赵彦俞、郑之侨纂，《兴化县志·卷八·文苑附录》，页 255。按《憩园词话》惯例，杜氏素尊贡生为“明经”，而既称“金子石布衣德辉”，当不知金德辉科名。

<sup>102</sup> 【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卷 1734，页 466。

<sup>103</sup> 同上，页 475。

<sup>104</sup> 同上，页 437。

<sup>105</sup> 同上，页 522。

寄赠王眉叔（即王诒寿）《笙月词》四卷”<sup>106</sup>，在这一事件中，或可理解为帮助杜氏收集词人信息，或可理解为冀借杜氏词话为王诒寿（字眉叔，1830-1881）扬名立言，无论是哪一种，友人寄赠词作的目的更加明确。在此时，杜氏对收罗词人的热情已不仅局限于自诩“雅吏”而结识所治之地词人的目的，而成为一种对词学本身的追求。

除却结识或网络词人词作之外，杜氏对地域范围内出色的词人词集的校订出版也不遗余力，如前文提到的校订姚辉第所作《菊寿庵词》四卷，及为丁至和、蒋春霖刊刻《萍绿词》与《水云楼词》等，在此不予赘述。

## 2.推尊前贤

除了自身的词学活动外，杜文澜对推尊一地词坛传统的行为也极为推重。《憩园词话》中就记载了一些这样的词坛活动，如“（沈涛）长子花淑大令宰吴江日，曾为姜石帚建祠于垂虹桥侧，亦有风雅名”<sup>107</sup>，或如“（许乃穀）在杭时，曾有一韵事，约同人诣孤山，重建林和靖祠，补梅数百树。有<买陂塘>词记事”<sup>108</sup>，这些修建祠庙的事迹，或为词人而发，或以词记述，都被杜文澜目为风雅，大力褒誉。

### 第三节 《憩园词话》中的词学同人网络及其“差序格局”

正如前文所言，杜文澜旨在通过《憩园词话》收录其词学圈中的“同人”<sup>109</sup>生平及词作，杜文澜也确实以如实记录当时社会状况与词坛活动得到了后世称誉。然而上一节中所介绍的杜文澜参与或见证的当时地域词学活动，是怎样放映在《憩园词话》所建构的词学网络中呢？杜文澜在《憩园词话》中建构的词学网

---

<sup>106</sup> 同上，页 620。

<sup>107</sup> 同上，页 343。

<sup>108</sup> 同上，页 353。

<sup>109</sup> 参见本文第二章，《憩园词话》第一卷有“就同人所谱新词，或已刊行，或存稿本，均为摘录数阙，自遣吟怀”，同上，页 225。

络又能否如实反映了当时词学活动本身？而他又是如何把这些纷繁的词人和词学活动聚合在一起，建构起他们的关联，并形成他本人所声称的“同人”圈呢？或者是否可以如一些前辈学者的研究所示，这些词人本身即可被视为一个完整的词学群体<sup>110</sup>？

这些问题的答案和杜氏本人对“同人”身份的界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人”一词始于《易》的卦名，“同人于野，亨”<sup>111</sup>，孔颖达疏云：“同人，谓和同于人”<sup>112</sup>，其后该词一直被用于形容志同道合的朋友，亦可引申为同事同僚之意。与杜文澜同时的俞樾即在其《茶香室三钞·明季社事缘起》中有“号召同人，创为复社”<sup>113</sup>之用，可见在当时人眼中，以同人聚合为团体并非罕见。然而如要成为或可被成为一个团体、流派或社团，往往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活动宗旨或纲领，而“同人”一词则不像社团与流派一样有着明确的界定条件，其囊括范围视所处的语境可大可小。《憩园词话》中杜文澜旨在收录其“平生所历词人”，并点明收录身份为“同人”，仅能暗示认可的立场，而就意义本身来说，“同人”之“同”则既可泛指对词的爱好，亦可专指某地、某派或某种身份。

鉴于杜文澜将收录“同人”作为词话创作之目的，因而可默视被收录者均为杜氏词学同人。既称同人，在某一方面必有一定的趋同特点，或因词学观点相似，或因其地域相近，或因其政治身份相仿。然而无论从其中哪一种划分条件来说，与杜文澜的词学“同人”群体都有不合之处。就地域来说，《憩园词话》中江南地区的词人自然占据大多数，然而书中同样也收录了一些湖北籍的词人，以及一些杜氏于游宦期间所见所闻籍贯不明之人。更何况江南本身即是一个较大的范畴，杜氏所录词学同人只是主要集中在吴中与两淮附近。就政治身份来说，《憩园词话》中所载的词人身份包含上至王公下至府吏的各个阶层，虽涉及太平天国

---

<sup>110</sup> 如陈水云在《咸丰、同治时期淮海词人综述》所总结的淮海词人群，即是其中之一。《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60卷第6期，页824-830。

<sup>111</sup>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陆德明音义；【唐】孔颖达疏，《周易注疏·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七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页32。

<sup>112</sup> 同上，页32。

<sup>113</sup> 【清】俞樾，《茶香室三钞》，《春在堂全书》，页540。



战事，但也只是作为记录词坛往事及词人经历的背景，并不存在明显的政治化的叙述，更遑论如遗民词人这种判然两途的分野。就词学观点来说，《憩园词话》中所载词人所属词派各不相同，词学风格也大相径庭，乃至有很多甚至对填词活动并不十分擅长。显然，《憩园词话》所收录的词人群并没有一条明确的主线可以将其归类。因而我们要对这一“同人”所指向的范畴追根溯源，就不得不还原于《憩园词话》的文本中，将杜氏所记载的词人进行详尽的归类，以寻找杜氏的切实所指。

附录中的图 1 与表 1 为对《憩园词话》所收集的词人的整理。图 1 显示了杜文澜与《憩园词话》中所收录的词人的关系构成及亲疏远近，表 1 则显示了憩园词话词人的祖籍与身份。

图 1 展示了杜文澜在《憩园词话》中所建构的词坛人际网络。透过这个网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虽然杜氏对这些词人以“同人”统称，然而就某种意义上来说，杜文澜并非对书中所有的词人“一视同仁”。相反，他的词学网络具有明显的层次：他和网络中的一些词人有着直接的联系，而更多的词人们则是通过与杜氏有着亲密联系的里层网络而形成了间接联系。在不同的时期，杜文澜都有着不同的词学交际网络，而处于网络中央的词人，也各不相同，其中如丁至和之于扬州词人群，顾文彬之于苏州词人群，都处于明显的引进者的地位。结合上一节提到的词坛活动而论，杜文澜参与的词社与唱酬活动主要的活动对象是里层的词人群体，而收罗词家等活动则针对着网络外层的词人群体。

这样的结构恰好契合了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差序格局”的阐述<sup>114</sup>。这种格局用于描述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结构，最初是作为社会学的理论提出的，费氏认为，相对于西方社会关系中常呈现的“团体格局”，中国社会呈现的是一种“差序格局”。在西方社会中，“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得分清楚。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

---

<sup>114</sup> 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中国与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 24。

那也是事先规定的”<sup>115</sup>。与西方明确的团体定义所不同，在差序格局中，人际关系呈现出的是以每个个体为中心的社交网络，“每个人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会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同的”<sup>116</sup>，这一网络以亲疏远近为脉络发散开来，越靠近圈子的中心，与圈子的发出的个体的关系就越密切。

杜氏在《憩园词话》中阐述的词学同人网络，正显现出了一个以其本人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他本人位于这个社交结构的中心，整个词学网络是由其友人及由其友人发散出来的其他词人组成的。杜氏对《憩园词话》中的词人虽皆以“同人”相称，而“同”的范围、程度及内容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差序格局”的概念解释了《憩园词话》中关于“同人”身份的界定，地域、身份、观点皆可被视为界定的某种条件，也都不可被视为界定的唯一条件。这样的差异使身处《憩园词话》词学网络中的个体无法聚合成一个有着明显概念界定的词学团体，而只能被杜氏纳入其自我建构的界限模糊的角色体系。这些同人们在这一体系中的位置无不受到杜文澜这一“差序网络”核心的个体主观亲疏远近的影响，这就导致了一些在词史中颇有建树的词人如编著《词学集成》的江顺诒<sup>117</sup>等，被仅以寥寥几笔带过，而不善词作的吴云<sup>118</sup>、李鸿裔<sup>119</sup>等人，却获得了充分的关注。

#### 第四节 同人之“同”——《憩园词话》词学圈的内在结构

虽然上一节我们已经论述了杜文澜所建构的词学“同人”圈是以其本人为中心发散的差序网络，而无法形成可被明确定义的词学团体，然而这一网络的形成也并非没有其独特的组织规律可循。

---

<sup>115</sup> 同上，页 25。

<sup>116</sup> 同上，页 26。

<sup>117</sup> 【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卷 1734，页 618。

<sup>118</sup> 同上，页 348。

<sup>119</sup> 同上，页 347。

黄光国在<儒家关系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方法论基础>一文分析过中国社会社交格局的产生，他认为，无论是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还是许烺光在其“心理-社会均衡理论”（Psycho-social Homeostasis）<sup>120</sup>中对中国人 PSH 模式的呈现，皆与儒家关系主义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儒家的主张里，“个人与其他任何人交往时，都应当从‘亲疏’和‘尊卑’两个社会认知向度（social cognitive dimensions）来衡量彼此之间的角色关系”<sup>121</sup>，而这种理念又经过潜意识化的过程，传递给个人，最终形成绵延千年的共时性的文化结构<sup>122</sup>。这种解释恰如其分的与《憩园词话》中杜氏对亲疏与尊卑的重视及在词话中不自觉展现的差序格局结构形成了互证，也解释了前文提到的为何在《憩园词话》选人标准中私人关系的因素超越了词学本身的因素。

正如之前所论述，作为一部集结词学的作品，《憩园词话》中的收录原则并非全然出自词学本身的考虑。通过表一，我们可以看到，《憩园词话》中收录的大部分词人皆为官吏，次则为有科名的文人，身份完全为布衣者少之又少。而图一中显示的在杜文澜社交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的词人与杜氏本人亦皆有一定的职务往来。如丁至和、金安清、顾文彬等人参与了太平天国防务，其中金安清官至江苏按察使<sup>123</sup>，顾文彬官至浙江宁绍台道<sup>124</sup>，除丁至和外，他们和杜文澜政治地位相仿，官职与履历也大多相类。

然而“亲疏”与“尊卑”仅仅是在儒家伦理层面的宽泛概念，要讨论它们如

---

<sup>120</sup> 许氏作为心理人类学家的奠基人之一，其提出的社会均衡理论，或简称 PSH 理论，建构了关于心理、行为与文化关系的理论模型，其中对不同文化间的社会及心理模式间的比较尤为关注。有《许烺光著作集》（台北：南天书局，1997）。

<sup>121</sup> 黄光国，<儒家关系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方法论基础>，《教育与社会研究》，2001 年第 1 期，页 17。

<sup>122</sup> 同上，页 19。

<sup>123</sup> 【清】江峰青等修，顾福仁等撰，《重修嘉善县志·卷十九·宦业》，光绪十八年刊本影印，页 74。见于《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 59 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70），页 385。

<sup>124</sup> 【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卷 1734，页 357-358。

何影响了这一词人群体的建构，我们不妨引入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field）理论。场域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意指“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sup>125</sup>，场域的概念牵扯到权力、资本、惯习等各个方面，“根据场域概念进行的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的思考”<sup>126</sup>。就文化生产领域来说，布迪厄承认文化生产具有其独特的自身法则，然而只有正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斗争和制衡在文学场建构中不可忽略的作用，才能更有效地理解整个文化实践活动的运作。

我们回到对杜文澜词学同人圈的建构的讨论，正如前文所言，相对于杜氏所秉持的纯粹的词学观，杜文澜在建构自身的词学网络时，将“亲疏”与“尊卑”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憩园词话》第一卷可以认为是对其本人纯粹词学观点的展现，而具体到第二至六卷对词人的选择则正体现了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制衡的结果。我们可以以蒋春霖、李鸿裔、顾文彬三位词人为例，这些词人分别在杜氏所建构的词学网络中位于不同的维度，占据着词学场域的不同资源，而杜文澜也在他的词话中对几位词人做出了不同的评价：

蒋鹿潭盐参军春霖，江苏江阴人，寄籍顺天。历署淮南嵯尹，曾练乡团御寇，吏治卓越，商民感之。性好长短句，专主清空，摹神两宋。遇文士必引以作词，娓娓不倦。余权泰州金判，始与订交，乐数晨夕，曾为代刻水云楼词二卷，以版归之。别数年，余权泰州篆，忽来晤，面目黧黑，黯然神伤，云将赴浙，依宗湘文太守，赠以川资而去。甫至震泽，亡於舟中，为之堕泪……鹿潭一往情深，性复倜傥，有豪侠气。为词专取神韵，酒酣辄琅琅自歌之。尝为余言，欲采中晚唐佳句入词，冀益深厚。今宗湘文太守续刻其遣词四十九阕，果能不负所约，惟稍务色泽，不免间涉短钉耳。<sup>127</sup>

<sup>125</sup> Pierre Bourdieu, Loïc J. D.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p. 97. 中文译文参照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页 133—134。

<sup>126</sup> 同上，页 133。

<sup>127</sup> 【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卷 1734，页 433-437。

蒋春霖与杜文澜交往一度十分密切，早在杜氏宦居两淮之时，他的填词风格和对词学的爱好就受到了蒋春霖、丁至和二人影响，而杜文澜于咸丰十一年刊刻的《曼陀罗华阁丛书》中也包括了蒋春霖的《水云楼词》。此后，杜氏凭借其出色的吏才青云直上，而蒋氏丁忧去官后，生活十分困顿，直至中年自尽，二人呈现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然而正是这位身份低微的词人，在后世却获得了相当高的词学地位，成为《憩园词话》词人网络中成就最高的词人。谭献于《篋中词》中评价蒋词“流别甚正，家数颇大，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咸丰年间，天挺此才，为倚声家杜老”<sup>128</sup>，此后虽然词界对蒋氏的评价不一，但其地位无疑已置于整个清代最优秀的词人之列<sup>129</sup>。反观这一段中杜氏对蒋春霖的评价，杜氏对蒋春霖对词学的执着给予了着重的强调，而对其词学成就除以“专主清空，神摹两宋”及“专取神韵”形容，并未有太多正面评价，反而提出了“稍务色泽，不免间涉短钉”的批评。杜文澜作为与蒋春霖同时的词人，并不能预知蒋氏来自后世的盛名，我们不能说杜氏对蒋氏的评价略欠客观。但是与其他词作明显不如蒋春霖的词人相比，我们显然发现杜文澜对蒋春霖的评价要严苛很多。我们可以与本不善词作的李鸿裔进行比较。

李眉生廉访鸿裔，一字香严，四川中江人。由拔萃科中顺天己亥榜，为兵部主事。以鄂抚胡文忠公奏调赴楚，复参曾文正公幕府，擢淮徐道，升江苏按察使。年甫三十余，以微疾引退。侨寓吴门，购网师园重葺之，易名苏东邻。盖园在苏了美沧浪亭之东，子美固蜀人也。名园栖息，书画自娱。慷慨乐施，捐晋豫赈以万数千金，不留姓氏。远翥习静，深味禅悦。素工书，尤长於诗古文辞，而词则不多作。光绪戊寅四月，嘉善金眉生谦访造偶园落成，广招二三百里内友人，作文酒之会。潘季玉观察首唱满江红数阙，同人迭为赓和。索廉访词，走笔次韵……此词出，即能道主人心迹，情景俱到，

<sup>128</sup> 【清】谭献，《复堂词话》，见唐圭璋《词话丛编》，页4013。

<sup>129</sup> 关于蒋春霖的历史评价，可详见陈水云，〈蒋春霖研究史述略〉，《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16卷第2期，页46-51。

始知才人无乎不可。其於词，盖不为耳，非不能也。<sup>130</sup>

显然，李鸿裔并没有出色的词学才能，甚至偶一为之，也只是同人雅集时应酬赓和。而《憩园词话》的描述里，则对李氏饱含溢美之词，这些溢美大多与词学无关，但涉及词作之处，也给与了“情景俱到，才人无乎不可”的褒誉。相对于词作本身，杜氏在记叙中强调了李鸿裔青年即居要职的显赫仕途经历，以及购置产业慷慨好施的行为，这样的描述事实上彰显了李氏在政治、经济与社会上的影响力。相较于蒋春霖来说，杜氏对李鸿裔的词作可谓相当宽容，在这样一本以记录词学同人为主要目的的词话中，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优势显然增加了李鸿裔在这一被建构的词学场域中的地位。

丙子丁丑间，吴中文讷，多在顾子山观察之怡园。观察名文彬，字子山，自号艮庵，江苏元和人。乙未举人，辛丑进士，由庶常改刑部，以知府简发湖北，参楚督官秀峰揆伯军事。积功锡花翎，补武昌盐法道，加布政使銜。旋以忧归。时家陷贼中，挈眷侨居上海。咸丰庚申岁暮，粤寇麇逼，势濒於危。与潘季玉、吴平斋两观察，倡议设会防局。事甫定，官文恭招之赴楚，仍欲任以军务，固辞得归。道出皖垣，备知曾文正公军威之盛，遂与潘、吴二君密商於吴晓帆方伯，税轮船以迎李伯相之师，肤功克集，实其首谋也。苏城既复，清釐故业，抚助族姻，不复作出山计。至友劝之，始北上。到都数月，即授宁绍台道，三载即引疾归。其叔子骏叔司马，先於铁瓶巷宅後购地二十馀亩，建武陵宗祠、春荫义庄。辟其东为园，以颐性养寿，颜之曰怡。骏叔胸藏邱壑，善於经营，各书家之秀石奇峰，悉为所得。园内有岁寒、草庐、拜石轩诸胜。因得东坡旧琴，又葺坡仙琴馆，凡十六景，同人分咏。夫人则一景一诗一词，并集苏诗为绝句二百四十四首。又创作怡园词一千二百馀阕，还存六百馀阕，皆望江南调也，刊传於时。观察素喜收藏，骏叔亦好古如饥渴。先有过云楼，藏度已夥，数年来苦心招集，遂冠吴中。其为词集名眉绿楼，厚寸许，长调短令，无不丰神潇洒，出笔欲仙，不拘一格，而自

<sup>130</sup> 【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卷1734，页347-348。

能入律。且才气丰溢，每一题一调，辄叠赋不已。如道光、咸丰间，於都中举秋词社，拈百二十题，各限一调，自作三十馀阕。以碍於篇幅，只录大小调各数阕。秋词亦仅录咏柳一阕，以用韵尤幽峭也。近人作词，谓古人只忌三重四同，每多重字，余则不敢有复。今读此集，有同心焉。<sup>131</sup>

相对于文才斐然而时乖命蹇的蒋春霖，以及拥有丰富社会经济资源，而在词学造诣上有所欠缺的李鸿裔，在杜文澜的词学场域中，顾文彬可谓是两者兼顾的理想人物，顾氏曾于太平天国之战立有战功，官至宁绍台道，且又屡次辞官，颇享清誉，慕风雅喜文墨，不仅拥有冠绝吴中的藏书楼“过云楼”，对词学活动也极为热衷。杜氏不吝笔墨介绍了顾文彬的宦途经历与治世之才，同时对他词学上的才气与影响力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乃至由顾氏组织而与杜文澜并无直接关系的秋社诸位词人也被不厌其烦的记录在词话第六章。

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建构》一书中，布迪厄将文化生产场视为自主的原则与不自主的原则制衡斗争的结果<sup>132</sup>，自主的原则对应着在文化活动本身所应具有的标准，如此处涉及的词学艺术的标准，而不自主的原则则对应着文化活动与外在世界千丝万缕的联系，如财富及社会地位。在杜文澜建构的词学场域中，蒋春霖等寒素词人徒有文才而缺乏社会经济地位，而李鸿裔等官宦词人则占据着社会及经济的资本优势，此外还有同时占据二者的顾文彬，和二者均无特别优势的一众小词人。在一个文学场域中，两个维度的评判都被视为同人圈的重要界定标准，而具体到《憩园词话》的个例，更重要的显然是不能自主的原则。就词话的编排来说，顾文彬与李鸿裔被置于词话第三卷开头，非常引人注目；而

---

<sup>131</sup> 同上，页 357-360。

<sup>132</sup> 布迪厄认为“文化生产场每时每刻都是等级化的两条原则之间斗争的场所，两条原则分别是不能自主的原则和自主的原则（比如“为艺术而艺术”），前者有利于在经济政治方面对场实施统治的人，后者驱使最激进的捍卫者把暂时的失败作为上帝挑选的一个标志，把成功当做与时代妥协的标志”。Pierre Bourdieu, *The Rules of Arts: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中文译文引自刘晖译《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页 265。

后来在文学史享有盛名的蒋春霖则只被排列于第四卷中间不甚引人注目的位置。就杜氏的叙述来说，蒋春霖与杜氏的关系被大大弱化，作为杜氏在江淮时期最重要的词友之一，杜氏并没有对其与蒋氏的私人关系进行太多描述，遑论提及其对杜氏本人词学风格的影响；而杜氏与李鸿裔及顾文彬的交往细节则被详细记录在词话中。虽然《憩园词话》是一部以存人存词为主要目的的书籍，但是杜氏对词作的评判也根据这两种原则而产生不同的分别，仅仅当一个词人只拥有词学上的优势时，词话中的记载才会偏重于词作本身，而当词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达到一定的程度，词话中的记载就会侧重于作者在其他方面的成就，词学这一本来的主旨反而成为了陪衬。这就导致了杜氏对仅仅在文才上占据优势的词人，往往可以较为直率地提出意见，而对拥有丰富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词人，杜氏则很难做到客观，对其词作的评价也更倾向于宽容。

## 第五节 总结

回到本章开篇的那首词，杜文澜记录的西湖山水是掺杂了个人情感的西湖山水，并不是西湖的本身。同样，杜氏在《憩园词话》中书写的词学经历和同人赓和的状况，也并不能代表当时词坛的客观情况，而是杜氏本人经历的投射。在这样的情况下，《憩园词话》建构的词人群体很难被视为界定明确的词学团体，而更倾向于由作者自身发散产生的词学网络。

这种被杜文澜称为“同人”网络的差序格局，事实上受到了尊卑和亲疏的影响——杜文澜本人与位于差序格局中心的人物在经历上或身份上有着高度的重合，显现了很大的“同”的部分，而随着“同人圈”的外扩，被收录词人的经历、身份与杜氏重合部分越来越小。这样“差序格局”的排序并非偶然，在杜文澜人为建造的词学场域中，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共同主导了场域的走向和词人在场域中的地位。对于在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上处于优势的词人，杜氏会特别强调自身与其“同”的部分，将词人置于更加中心的位置，哪怕这样的“同”与词学无关；而一些事实上与杜氏交往密切的词人，却可能因为没有雄厚资本而



被边缘化。在资本的取舍比重上，通过对蒋春霖、李鸿裔、顾文彬三人对比，我们发现相对于词学本身的成就而言，经济和社会资本是更为杜氏看重的因素。这样的发现为我们了解当时存在的词学网络的真实面貌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 第四章 太平天国事件在《憩园词话》中的书写

既然《憩园词话》以收录“同人”为旨，显然承认了这一被书写的词学群体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点，他们或生活在共同的城市，或拥有着相似的经历，这些共性为集体记忆的发生提供了素材，而基于对集体记忆的共同感知与相似感情，很容易令一个群体感到身份上的连结。如果将这群词人共有的记忆抽丝剥茧，这些对共同经历过事件的感知、情感，即成为了构成这一“同人”群体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对于咸同年间活跃在江淮地区的词人来说，发生于1850年末并迅速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战争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南京于1853年被太平军攻占，同年清廷分别于南京及扬州城外设江南、江北大营，一时战火纷飞，城乡动荡，原本商民富庶的江淮地区顿时陷入战乱<sup>1</sup>。太平天国事件如同这一动荡时代的标识，将这群词人对时间的认知分割为战乱前后两个部分，所有身处当时当地的词人都被卷入其中。这样重大的事件在《憩园词话》中被反复提及，无论在杜文澜对词人的介绍与描述中，或是在词人本人的词作里，都可以看到对这一事件的反馈。因而本章旨在通过对《憩园词话》中关于太平天国事件的建构进行分析，探讨《憩园词话》如何收录了词人们对其共有集体记忆的书写，又如何在这样的书写中体现了“同人”的身份认同。

### 第一节 黄鹤已去，杜郎须惊——太平天国与《憩园词话》的城市形象建构

在文学或文学史的书写中，地方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在人文地理学的领域中，“地方表达了面对世界态度，强调的是主体和经验”<sup>2</sup>，因而当人们提起一个地方时，所暗含的象征意义很可能超越空间概念本身。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

---

<sup>1</sup> 以上年代考证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1），页99-124。

<sup>2</sup> Tim Cresswell,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2004), p.32. 本文所引用翻译部分参见徐苔玲、王志弘译本，《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页34。

对地点的描述中不仅隐含着丰富而细微的情感差异，同时也关联着书写者本人的身份认同与所继承的文化传统等更深层的因素。这些因素受到城市本身特质的影响，同时又为城市的特质增加了额外的精神意义，这一切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利罕所言，“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sup>3</sup>。陈平原在《文学的都市与都市的文学——中国文学史有待彰显的另一面》一文中认为：“文字建构起来的都市，至少丰富了我们的历史想象和文化记忆”<sup>4</sup>，然而具体到地域与中国文学的关联，在中国文学史家处却“基本缺席”<sup>5</sup>。在这样的情况下，讨论在中国历史的一个时期中某个群体如何认知并塑造一个地方形象，无疑具有着积极意义。

对于《憩园词话》收录的这群在动荡时局下天涯旅宦的词人来说，城市无疑也是引发感怀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宦居的城市还是记忆中的故乡，皆承载着不同的情感。不同的地方如同不同的符号，对应着独特的象征意义，这样的情况下，词人对一座城市的描述之“同”，也暗示着一定程度上情感与记忆的共鸣。因而本节试图通过分析《憩园词话》中的城市塑造，以探索词话同人们所拥有的集体记忆，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身份认同。

### 一. 记忆、现实与城市

武昌与扬州是对杜文澜有着特殊意义的地方，我们不妨从他本人的一首词谈起，来探讨他对于这两座城市的情感。这首词作于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收录于杜文澜的词集《采香词》中，是杜氏与其友人蒋春霖话旧之作。

记波涵紫堞，雾冥丹梯，频展吟眸。念尔南冠久，问江城玉笛，曾听吹

---

<sup>3</sup> Richard Lehan, *The City in Literature: 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p.3. 本文所引用翻译部分参见吴子枫译本，《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页4。

<sup>4</sup> 陈平原，《文学的都市与都市的文学——中国文学史有待彰显的另一面相》，见《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3期，页32。

<sup>5</sup> 同上，页33。

否。去尘顿如黄鹤，萍迹话浮鸥。自战鼓西来，楚歌不竞，望断空楼。

前游。漫回首，便十里春风，何处扬州。火迷荒岸，任雕搜金粉，都付沧流。素丝暗寻霜色，词客病工愁。怕赋冷晴川，凄凄草碧鹦鹉洲。

——〈忆旧游·与蒋鹿潭话黄鹤旧游〉<sup>6</sup>

一直以来，关于地方与记忆的关系都被学者们津津乐道。地方如同一个“经验的容器”<sup>7</sup>，将被回忆的人物与情节囊括其中，因而似乎格外容易引起人们的记忆与感怀，也成为抒情文学中常见的吟咏题材。在词学传统中，词人由地点引发追忆感怀亦并不罕见<sup>8</sup>，其中众多咏怀古迹的作品更是这类作品中的典型。古迹的留存是过往时光的一种见证，我们对古迹的凭吊也就是对过往时光的凭吊，而过往的时光往往又与现实形成某种对应或对比，从而构成了这类词作的审美张力。与其他很多与古迹相关的词作一样，这首关于黄鹤楼的词作是也是追忆的作品，然而特殊的是其追忆对象却不是古迹本身，而是之前追怀古迹的行为。

因而这首词关系到三个时间点——现在、被追忆的过去、以及被追忆的过去中追忆的过去；两个人物——作者杜文澜与被倾诉的对象蒋春霖；两个地点——黄鹤楼与扬州。全词的结构线索十分清晰，上阕以“记”字开头，定下来这首词追忆的格调，作者回忆黄鹤楼“波涵紫堞，雾冥丹梯”的恢宏景象，继而以“念尔南冠久”，引起长别江城，飘蓬宦海之慨，最后用“自战鼓西来，楚歌不竞，望断空楼”作结，点出自江南回望武汉战事的焦灼和故人零落的无尽哀感。在上

<sup>6</sup> 【清】杜文澜，《采香词·卷一》，页8。本词作于咸丰四年（1854年）。

<sup>7</sup> 爱德华·凯西认为“稳定和持久不动的地方是经验的容器，记忆甚至是由地方导向的，至少是得到了地方的支持”。Edward S. Casey, *Remembering: A Phenomenological Study*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86-187. 本文所引用译文转引自林立译本，见《沧海遗音——民国时期清遗民词研究》，页103。

<sup>8</sup> 林立师在其著作《沧海遗音——民国时期清遗民词研究》中将地方与记忆的关系引入词学领域，探讨了在遗民词人笔下如何选择与建构地点以承载其集体记忆，以助其遗民身份与意识的形成。林立，《沧海遗音——民国时期清遗民词研究》，页103-124。在本段中，林立师对地点、记忆与文学书写的关系做了详尽梳理与分析，本文不予赘述。

阙对往事的记叙完成后，下阙则偏向于抒情，极述“雕搜金粉，都付沧流”的昔盛今衰主题。在时间点上，这首词上阙偏重于记忆中的游览，下阙偏重于现实中的感怀；在人物上，抒情的主人公既是杜氏本人，又是暗含的阅读者蒋春霖；在地点上，“波涵紫堞，雾冥丹梯”所指向的地点是记忆中的黄鹤楼，而“前游，漫回首”则将书写的视角引向现实中的居所。

我们不妨先从地点谈起，地点是事件的发生地，是一切回忆的落脚点，人物来去、时间流逝、古迹本身亦可能在岁月中被摧毁，而地点则恒常存在。黄鹤楼坐落于湖北武昌，作为荆楚一带地标性建筑，历来广为诗人题咏。而黄鹤楼这一地点与本词涉及到的两位词人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杜氏曾于《曼陀罗华阁琐记》中自述身世，其祖籍浙江秀水，幼年丧父，当时其舅储荣正居湖北，杜氏举家依之，褚公待杜文澜相当尽心，“教育逾所生，十余年如一日”，杜氏两任妻子也皆为褚公之女<sup>9</sup>。蒋春霖则是江苏江阴人，少年时随父亲之湖北荆门任上，“尝登黄鹤楼赋诗，老宿敛手，一时有乳虎之目”<sup>10</sup>。对于杜文澜来说，黄鹤楼代表的湖北是儿时记忆的载体，对于蒋春霖来说，黄鹤楼赋诗是他困苦人生中少有的欢乐时光。虽然杜氏本人于何时游历黄鹤楼已无从印证，但可以猜想的是，无论对于蒋春霖或者杜文澜来说，黄鹤楼都承载了很多年少时愉快的，至少是和平的回忆。与“回忆”相对的维度是“现在”。此词作于太平天国争战之时，武昌作为军事要地，已于咸丰三年被太平军占领。其时仍居住在湖北境内的褚家在这次战争中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举家迁往麻城乡间避难，褚荣本人在一次逃难中被太平军所杀，其长子褚文亮以身掩父，身负重伤<sup>11</sup>，文亮幼子也陷于太平军中，越六年

---

<sup>9</sup> 【清】杜文澜，《曼陀罗华阁琐记》，曼陀罗华阁丛书，光绪十八年席氏扫叶山房重修本，页16。

<sup>10</sup> 【清】金武祥，〈蒋君春霖传〉，原载《栗香室文稿》，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江阴金氏刻本。参见冯其庸，《蒋鹿潭年谱考略：水云楼诗词笺校》（济南：齐鲁书社，1986），页116。

<sup>11</sup> 【清】杜文澜，《曼陀罗华阁琐记》，页16。褚文亮（生卒年不详），字晓寅，杜文澜表弟。

始得逃出<sup>12</sup>。而对于倾听者蒋春霖来说，自历父丧，游宦各地，穷愁抑郁，黄鹤楼旧游仿若梦幻。在这样的情况下，杜文澜和蒋春霖共话黄鹤楼旧事，除了怀古和记游这样普遍的主题，是对共同经历的地点的回忆，更夹杂了对国家的动荡和家庭悲剧的咏叹，沉痛之感溢于言表。

然而本词所涉及到的地点却并非仅只黄鹤楼而已。我们不得不注意的是，在这首追怀黄鹤楼旧游的作品中，出现的另一个地方——扬州。“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sup>13</sup>，黄鹤楼本身就富有昔人已矣的伤感意涵；而扬州这座城市，经过杜牧（字牧之，803-852）的<赠别><sup>14</sup>、<遣怀><sup>15</sup>和姜夔（字尧章，1154-1221）<扬州慢>的塑造，也已成为劫灰过后萧条城市的典型。这首词下阕中“漫回首，便十里春风，何处扬州”一句，化用了杜牧“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sup>16</sup>及姜夔“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sup>17</sup>的典故，前者出自杜牧的<赠别·其二>，后者出自姜夔的<扬州慢·淳熙丙辰正日>。我们分析黄鹤楼与扬州之于杜文澜的情感意涵，我们发现，黄鹤楼是杜文澜与蒋春霖留有共有记忆的地点，而扬州地区<sup>18</sup>，则是杜文澜创作此词时和蒋春霖现实中的居所。在这首词中，扬州既是抽象的地点，暗示武昌城昔日繁华与今日冷寂；又是确指之处，杜氏此时与蒋春霖共于淮南出任盐官，现实中的扬州与武汉一样，已屡经劫火。因而杜氏的伤怀不

---

<sup>12</sup> 同上，页 5。

<sup>13</sup> 【唐】崔颢，<黄鹤楼>，万竞君注，《崔颢诗注；崔国辅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页 42。

<sup>14</sup> 【唐】杜牧，<赠别·其二>，吴在庆撰，《杜牧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页 614。

<sup>15</sup> 【唐】杜牧，<遣怀>，同上，页 1214。

<sup>16</sup> 【唐】杜牧，<赠别·其二>，同上，页 614。

<sup>17</sup> 【宋】姜夔，<扬州慢·淳熙丙申正日，予过维扬。夜雪初霁，荠麦弥望。入其城则四壁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鸣。余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其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参见夏承焘笺校，《姜白石词编年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页 1。

<sup>18</sup> 杜文澜时任淮北监掣，其时已“从军邗上”，故应在扬州。

仅是针对黄鹤楼所在地的武昌而发，也是针对与武昌相对的扬州而发，象征性的地点也是现实的地点，被指向的地点也是回忆中的地点，这种象征与确指，回忆与现实的交叠，使本词中的地点描写变得格外值得回味。

那么我们重新回顾这首词作，这首词之所以在无数昔盛今衰的咏史之作免于陷于流俗，而显得意味深厚，正在于一种过去与此刻，典故与现实，此地与彼地，倾听者与讲述者之间的微妙联系。当我们说起“忆”时，往往可以指向时间与空间两种维度，我们回忆过去的时光，也追忆远方的人，或者说空间距离的存在，令我们必然和远方产生一定时间的距离。对于杜文澜来说，记忆中的武昌与现实中的武昌，典故中的扬州和现实中的扬州，每个地点都有着不同的意涵：记忆中的城市象征着包含在过去生活中美好理想，而典故中的城市如同一种即将到来的衰败的暗示，现实中的住所已然为战火所及，而远望的城市杳无音讯更让人焦灼。因而在追忆的层面上，过去、现在、此地、彼地的四个维度都涵括在这首词中，这些元素各自包含着不同的情感，又形成了一个整体。

这四种不同的情感包罗了当时词人对地点可能具有的感情。在《憩园词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作品与这四类情感相呼应。下面这首蒋春霖的词作创作时间略早于杜词，内容同样是时任两淮盐官的蒋春霖对友人话旧之作。

怪西风偏聚断肠人，相逢又天涯。似晴空堕叶，偶随寒雁，吹集平沙。  
尘世几番蕉鹿，春梦冷窗纱。一夜巴山雨，双鬓都华。

笑指江边黄鹤，问楼头明月，今为谁斜。共飘零千里，燕子尚无家。且  
休卖，珊瑚宝玦，看青衫，写恨入琵琶。同怀感，把悲秋泪，弹上芦花。

——〈八声甘州·刘梅史自楚徙吴秋窗话旧〉<sup>19</sup>

<sup>19</sup> 【清】蒋春霖，〈八声甘州·刘梅史自楚徙吴秋窗话旧〉，【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卷1734，页436-437。《憩园词话》所载题名与他处不同，据《水云楼词疏证》、《蒋春霖年谱考略：水云楼诗词辑校》等各本所载词题为〈甘州·余少识刘梅史于武昌，不见且二十年。辛亥余为淮南盐官，梅史自吴来访，秋窗话旧，清泪盈睫，其漂泊更不余若也〉。

这首词与杜文澜的词作非常相似，蒋词也涉及到了地点的迁移与两个人物间的互动。而且虽然其创作时太平天国于武昌的战事尚未焦灼，然而蒋词中仍然弥漫着一种世事变迁的虚幻哀感，在蒋春霖的笔下，人生飘蓬如西风吹聚的晴空堕叶，世事无常如春梦蕉鹿，个人命运湮没在时代的洪流中，浮沉聚散远非一己之力能控制。在这首词中，黄鹤楼如同一个地标，记录着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远离，成为徒然感怀的词客的一种衡量的尺度。

蒋词与杜词的创作一前一后，回忆中也同样出现了黄鹤楼这一地点，有趣的是，在杜文澜词作中，蒋春霖是被倾诉的客体，而在蒋春霖的词作中，又成为了讲述者。无论是讲述或者倾听者，在这种叙述与被叙述的过程中，事实上意味着一种相同感怀的分享。虽然针对的具体事件与背景环境并不相同，但在主题情感以及黄鹤楼的形象塑造上两首词却前后呼应，十分相近。无论是蒋春霖的“共飘零千里，燕子尚无家”还是杜文澜的“去尘顿如黄鹤，萍迹话浮鸥”，所感叹的皆是人生的无常与飘泊，而黄鹤楼的意义是作为一个恒定的地点，衬托了时世与人生的变换。存在于回忆中的黄鹤楼与词人吟咏的“楼头明月”，如同一个不可回归的过去的标志物，象征着人生恒定与美满的一部分，在时间与空间上皆距离现实十分遥远，而他们所处的现实——无论是时间上的“现在”还是空间上的“此地”——在美好过去衬托下则更显凄凉。

如同上文所提及的两首词，时间、地点和人物三种要素的组合和对比为词人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在回忆的维度上，词人自由组合，或者对一个相同处所的过去与现实对比以突显昔盛今衰，或者以宦游之地与故乡对比以突显自己的宦海飘零，或者在相似的时间中故地重访而描写人物心境的对比以突显旧游零落物是人非。而这一切对比的基础是一个相同的时代，以及因为这个时代个人生活产生的巨大变化，它们固然与词人的私人经历息息相关，但同样也可以视为当时乱世之际游宦各地的词人共有的写作模式。词人们身处或怀念的地点也许是扬州或武昌，也许是其他城市。对于每一个词人来说，象征过去与现实的城市可能各不相同，但其核心的情感却是一致的。

## 二. 传统的取舍和集体记忆



正如上文所言，词人们受到战争的影响，他们笔下的城市形象往往是动态的，包含着往昔美好与现实萧索的两面。这种形象并非这群乱离词人的独创，事实上，词人们受到了很多前辈的影响，这些城市形象的塑造往往有迹可循。在反复的书写中，城市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意涵，这些意涵被历代作者反复建构，最终与城市本身形成了某种文化上的连结。然而这并不是说所有城市在作者们的笔下都是一成不变的。文本与城市本身间的互动，往往体现在不同的方面，并且随着时代与作者表达情感的转变而产生种种变化。

我们仍以扬州为例，扬州是战时江北大营的所在地，《憩园词话》收录的很多词人皆有在扬州生活的经验，在他们的词作中扬州也是时常出现的地点。扬州又是一个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城市，关于地点的情感暗示在扬州这一城市形象的建构中体现得十分明显。我们之前探讨了杜文澜词作中牵涉扬州的部分，在他的词作中引用了姜夔与杜牧的诗句，强化了扬州作为“芜城”的典型意象。而这样的引用在《采香词》中比比皆是，仅在第一卷中即有：

西风十里扬州路，听呜咽，寒潮弄远。

——〈月下笛·舟泊茱萸湾〉<sup>20</sup>

十里愁芜凄碧，旗影淡孤城……空剩平桥戍角，共归潮暗咽，似恨言兵。

——〈八声甘州·淮阴晚渡〉<sup>21</sup>

江淹老去，杜牧重来，尊前相对嗟嘘。

——〈声声慢·袁江感怀赠江佩之〉<sup>22</sup>

孤云闲寄天涯，问落拓征衫，归计何日。

——〈瑶华·题丁宝庵十三楼吹笛图即次其自题韵〉<sup>23</sup>

东风甚处，燕子归时春已暮。争似江潮，夜夜犹过廿四桥。

<sup>20</sup> 【清】杜文澜，〈月下笛·舟泊茱萸湾〉，《采香词·卷五》，页5。

<sup>21</sup> 【清】杜文澜，〈八声甘州·淮阴晚渡〉，同上，页7。

<sup>22</sup> 【清】杜文澜，〈声声慢·袁江感怀赠江佩之〉，同上，页8。

<sup>23</sup> 【清】杜文澜，〈瑶华·题丁宝庵十三楼吹笛图即次其自题韵〉，同上，页12。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杜文澜所化用的杜牧的诗句，皆出自〈遣怀〉、〈赠别·其二〉与〈寄扬州韩绰判官〉<sup>25</sup>，而这三首诗恰恰正是姜夔〈扬州慢〉中所化用过的杜牧诗句的典故。杜牧笔下的扬州是旖旎而繁华的，包含着娉娉袅袅豆蔻梢头的绮丽<sup>26</sup>，和“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sup>27</sup>这样回望时对绮业的忏悔，而姜夔的“杜郎俊赏，重到须惊”则是借由杜牧回忆与忏悔中的繁华，进一步将过去的繁丽纳入到现实荒凉的感慨中。也就是说，杜牧在其诗句中赋予了扬州一种情感内涵，姜夔在化用中丰富了这种内涵，在这些词作中，杜文澜使用了杜牧诗句的这些典故，但他其实已并非指向杜牧诗句的原意，而是这些原意被姜夔初次加工后的涵义。

对这一典故的使用并不仅限于杜文澜一人，翻阅《憩园词话》，我们发现杜氏的同侪词人涉及到扬州的词句中也往往选择了相同的典故。在他们的词作中，扬州这一城市紧紧联系着姜夔的传统，寄托着繁华后衰落的回忆：

廿四桥头，早勾销、十年一觉，梦随春去。

——沈鸿〈金缕曲〉<sup>28</sup>

只愿香痕不散，依然是、豆蔻初稍。

——宋翔凤〈满庭芳〉<sup>29</sup>

萧条。对流水，想杜牧重来，冶思难消。

<sup>24</sup> 【清】杜文澜，〈减字木兰花·题画〉，同上，页 12。

<sup>25</sup> 【唐】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吴在庆撰，《杜牧集系年校注》，页 545。

<sup>26</sup> 【唐】杜牧，〈赠别·其二〉，同上，页 614。

<sup>27</sup> 【唐】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同上，页 1214。

<sup>28</sup> 【清】沈鸿（字问秋，生卒年不详），〈金缕曲〉，参见【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卷 1734，页 295。因本章旨在分析《憩园词话》中“同人”的身份认同，因而所选词作皆出自《憩园词话》，并不以词人本人词集为准。

<sup>29</sup> 【清】宋翔凤（字于庭，1776-1860），〈满庭芳〉，同上，页 391。

——丁至和<忆旧游·与马竹渔夜话湖上旧游><sup>30</sup>

任卷起十里珠帘，剩凉碧摇烟，乱蛩幽咽。

——张熙<解连环·题丁萍绿十三楼吹笛图><sup>31</sup>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这样的感怀在这些词作的主旨中回旋反复，在所有这些牵涉扬州的典故中的“杜郎”，事实上都是“重到”的杜郎，是经过姜夔的设想与追忆加工过的“杜郎”。经过姜夔的这一媒介，杜牧与扬州的联系在这群词人眼中具有了新的内涵。在漫长的文学历程中，人们通过回忆来记住回忆者，在这种被近于仪式化的追忆的活动中，地点正是重要引发的媒介<sup>32</sup>。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地名就如同一种符号，通过不同时代的作者的不断建构，而赋予此地一种特殊的意涵，杜牧、姜夔与扬州就这样联系在了一起。这样的联系并非由这批词人首先发掘出来，事实上，从杜牧到姜夔，他们对扬州的描述在文学史的反复征引中确已被经典化，而杜文澜及其同人对被姜夔词化用过的杜牧作品的化用，事实上正是将这层已被经典化的内涵挪用于其所处的现实中的扬州，加入了这场关于“扬州”的复杂互文之中。然而在不同时代、情况与文学传统中，城市所被赋予的意涵可能并不一致。以扬州来说，除了杜牧与姜夔所塑造的文学形象之外，这一城市还拥有着其他的象征意义，譬如“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sup>33</sup>一脉作为江南秀美城市的典范，或者“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sup>34</sup>中繁华奢靡的代表<sup>35</sup>。在扬州的诸多意象中，词人们选择追溯的传统却如此一致。或繁华或绮靡的扬州被自动忽略了，只

<sup>30</sup> 【清】丁至和，<忆旧游·与马竹渔夜话湖上旧游>，同上，页 449-450。

<sup>31</sup> 【清】张熙，<解连环·题丁萍绿十三楼吹笛图>，同上，页 456。

<sup>32</sup> 参见 Stephen Owen, *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26。

<sup>33</sup> 【唐】徐凝，<忆扬州>，《全唐诗》（台北：艺文印书馆，1960），页 2854。

<sup>34</sup> 【南朝】殷芸著，周楞伽辑注，《殷芸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页 132。

<sup>35</sup> 关于扬州这座城市在文学中所具有的内涵，很多论著都予以详述。如余敏芳，<宋代扬州词城市符号解读>，《现代语文》，2010 年第十二期，页 56-61。

有和词人所处时代相称的“昔盛今衰”的文化符号才被词人们广泛而一致地采用到词作里。这种塑造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群体意识，他们关于时事的感怀与扬州城的这一象征符号互相强化，选择性忽视掉扬州城在历史中积累的其他象征意义，仿佛他们所经历的个人与时代命运本身即与这座城市有着天然的连结。

《憩园词话》并非一部区域性的词话，然而由于词话为杜文澜对其自身的经验和记忆的书写，所收录的词人也与杜氏本人活动范围大致重合。在相近的时间内在某座城市生活的共同经历显然令这群词人很容易产生相似的情感，这群词人选择这样一种文学传统完成对扬州的塑造，显然与太平天国时期他们正于扬州生活密不可分，战争给与他们直接的刺激与经验都与这座城市连结在一起。这种选择非常个人化，显然只对这群词人本身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无论是上一节中对空间的回忆，还是本节提到的对一座城市文化传统的选择继承，都包含了这些乱世词人的独有的体验，凭借着这种体验，城市、时代与词人本人产生了特殊的关联。而这些对城市分享着相似情感与的个体，事实上也分享了相似的生活经验和个体记忆，这为他们形成一个“同人群体”而产生的身份认同提供了基础。

## 第二节 东风回首，不是江南——《憩园词话》同人词作中的“昔盛今衰”

如何处理过去一直是《憩园词话》词人群体所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不管是他们对时间还是空间的回忆，都提醒着他们一种巨大的差异的存在。《憩园词话》同人圈中大多数词人的身份为官吏或是获得科名的文人，小部分布衣词人也或为府吏或为幕僚，和政权皆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而能够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中各安其所。对于他们来说，太平天国运动无疑是对原有生活秩序的破坏，他们目睹并经历了战争造成的悲剧，由于他们的立场与清廷站在一起，他们自然将一切生民涂炭、经济崩塌的责任都归因于“粤匪作乱”。在当时，杜文澜、金眉生、宗源瀚等很多词人均直接参与了清廷的军事活动，如杜文澜本人即自咸丰三年起从军于江北大营<sup>36</sup>，并以战争参与者的身份编著了《平定粤匪纪略》<sup>37</sup>，其他没有直接

<sup>36</sup> 【清】杜文澜有词名为<好事近·癸丑冬与黄子湘同从军与邗上，重逢话别，赋此赠

参予战争的词人也不乏因太平军进攻而罹遭不幸或以身殉国的个案，即使此身得以幸免于难，也大多遭遇了或亲友亡故或家园被毁或辗转流离的种种悲剧，这样同仇敌忾的政治认同感加深了词人之间的共同联系。

表现在词作中，即体现为词人们对过去与现实差异的耿耿于怀，这种今昔差异所带来的情绪不仅如第二章所言作用于杜文澜的词话中，也同样作用于这些词人的词作里。因而观察《憩园词话》中牵涉太平天国的词作，会发现它们对流淌的时间和“今”与“昔”的互动皆有着一种特别的关注。

顾文彬的这首〈忆旧游〉可以代表当时词人的一种典型情绪。

记虹桥贯酒，萤苑寻诗，惯泊雷塘。烽火迷瓜步，叹六朝金粉，劫惨红羊。二分月子来照，瓦砾万家霜。把仙观琼花，歌楼玉树，一炬荒凉。

帆樯。渺天末，似避戈惊鸿，寥廓回翔。远浦推篷望，恨乱鸦残堞，遮断垂杨。料得玉钩斜畔，鬼唱咽寒螿。便骑鹤人来，萧声寂寂应断肠。

——〈忆旧游·明月扬州，旧游历历，自经兵燹，纾道避之，感而赋此〉<sup>38</sup>

在这首词中，词人并没有使用太多抒情性的语句，而是以赋笔详细铺叠了扬州在“红羊惨劫”前后风物的变化，整首词的内容正如题名所写，由“明月扬州，旧游历历”与“自经兵燹，纾道避之”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境构成。时间、地点和人物三个要素在词学抒情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词学创作中，词人常常通过在相似的情境下强调某一种要素的变化，以达到突出的效果。这首词也同样，见证并到访扬州的始终是作者本身，所前往的也皆是旧游之地，而正是横亘其中的时间，将原来的“仙观琼花”、“歌楼玉树”的六朝金粉之地，变成了一个“乱鸦残堞”、“鬼咽寒螿”的城市。今与昔之间的反差被客观呈现出来，自然而然表达了作者面对昔盛今衰的扬州的无尽哀感。

---

之》，见《采香词·卷一》，页13。

<sup>37</sup> 【清】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光绪十八年，上海席氏扫叶山房重修本。

<sup>38</sup> 【清】顾文彬，〈忆旧游·明月扬州，旧游历历，自经兵燹，纾道避之，感而赋此〉，参见【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卷1734，页362-363。

类似手法的作品在《憩园词话》中简直可谓比比皆是。又如丁至和的〈忆旧游·与马竹渔夜话湖上旧游〉：

记吟衫拂絮，画桨冲烟，买醉虹桥。唾绿湖波腻，荡香尘十里，花雾迢迢。沸云艳歌金缕，飞度一枝箫。看夕照平山，楼台倒影，莺燕都娇。

萧条。对流水，想杜牧重来，冶思难消。卧柳堤阴老，问眉痕深浅，今为谁描。翠舷甚时同扣，明月送归潮。俚寄语盟鸥，空城断角吹丽谯。<sup>39</sup>

在无常乱世中，今与昔的变化显得尤为突出。词人们面对满目疮痍的“现在”时，很喜欢用“回首”、“忆”、“旧时”等等强调过去时间的回忆性的字眼来突显今昔之间的差异。和上一首顾文彬的词一样，本词也以“记”字开篇，引起对往昔追忆的叙述。这首词结构非常清晰，以“萧条”二字为界，上阕和下阕明显形成一种对称的对比格局。上阕所写旧游欢乐，下阕所写为现实伤感。上阕中出现的柳絮、画桨、楼台，以及同游的诗客，在下阕中也皆得到了对应——柳絮成阴，翠舷无人同扣，“楼台倒影”变为了“空城断角”，当年“吟衫拂絮”的同游人也已不在，剩词人一人“卧柳堤阴老”，唯有盟鸥堪语。然而和顾词不同的是，丁至和并没有用类似“红羊惨劫”等词语直接将这些变化归因于战争，而只是进行了简单的今昔对照，仿佛只是对故人旧游的单纯怀念，但是词中“杜牧重来”的典故与“空城断角吹丽谯”等描写，却无不暗示着作者隐藏在个人背后的家国感怀。

“国家不幸诗家幸”<sup>40</sup>的表述在诗歌史上并不缺乏案例支持，家国的不幸对诗人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令诗人创作出的抒情文体更具思想深度和文学价值。然而相对于历来以“言志”<sup>41</sup>自诩的诗来说，在词这种“意内言外”

<sup>39</sup> 【清】丁至和，〈忆旧游·与马竹渔夜话湖上旧游〉，同上，页449-450。

<sup>40</sup> 【清】赵翼，〈题遗山诗〉，《瓯北集》，见曹光甫校点，《赵翼全集·六》（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页621。

<sup>41</sup> “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出自《尚书·舜典》。参见【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陆德明音义；【唐】孔颖达疏，《尚书·卷三》，《续修四库全书·卷41》

<sup>42</sup>“要眇宜修”<sup>43</sup>的文体中，家国之思的表达就要委婉含蓄得多。以《憩园词话》同人作品而论，直接描写战争过程与战争场景的作品并没有太多，大多数作者则倾向于采用寄托、隐喻和对比的手法，来突显这场巨变对周围环境或他们自身产生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词人们描写今昔差异时，往往包含着隐藏的情绪主旨或不忍及不便直言的言外之意。以丁至和此词为例，楼台与空城的对比并非仅仅旨在描摹环境差异，而在词人描摹景物雕琢字句背后的“为何”，才是这首词真正试图表达的内涵所在。然而丁氏此词的委婉主要表现在手法上，词作中点明了为何产生今昔差异的原因，词人的用心与词作的主旨尚十分明确，而《憩园词话》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同人词作，在缺乏写作背景和词人经历支持的情况下，甚至很难追溯作者的感怀是因何而发。下面这首作品即属于这样的情况：

司马门前，自仲文老去，几度沾衣。重巡莎径，一片庭草萋萋。星灵暗淡定伤心，景物全非。对昔日传经旧市，一般都付莺啼。

屈指清凉未久，听蝉吟高树，露咽风凄。记得绿阴共醉，花萼留题。瞢腾枕上，送斜阳、冉冉低迷。且莫问、朱轮何似，一枝聊许幽栖。

——黄之驹《汉宫春·咏介休中七星槐为介存兄旧治》<sup>44</sup>

据《憩园词话》载，黄之驹本为广东吴川人，幕游江南，与丁至和结为至交，后又因其兄介存于山西介休为官而前往山西<sup>45</sup>。此词所咏之七星槐即位于山西介休，关于词作书写的年代与其兄生平经历已很难考证，然而题名既云“旧治”，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页 552。

<sup>42</sup> “意内言外谓之词”，【清】张惠言，〈词选序〉，《词选（附续词选）》（北京：中华书局，1957），页 7。

<sup>43</sup> “词之为体，要眇宜修”，王国维，《人间词话》，《人间词话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5），页 48。

<sup>44</sup> 【清】黄之驹（字季刚，生卒年不详），〈汉宫春·咏介休中七星槐为介存兄旧治〉，参见【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卷 1734，页 464-465。

<sup>45</sup> 其事迹参见【清】杜文澜，《憩园词话》，同上，页 463。

大约其兄长此时已经去官乃至辞世，时过境迁、人物皆非的感慨在这首词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词人在词作中点明了“景物全非”的主旨，在意象上也选择了今昔相对的种种景物进行对比——往日莎径对应着今日的萋萋庭草，往日的传经旧市唯剩今日啼莺，而往日“绿荫共醉，花萼留题”的欢乐时光也已风流云散，只余今日的“蝉吟高树，露咽风凄”。词人表面上吟咏的是旧物旧地，致力于描绘今昔之间的差异，但却并未直言感慨的由来，令人无法确指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所在。但是仅从词作中暗含的典故与使用的语码来看<sup>46</sup>，我们却发现这首词与之前引用的乱世感怀的词作没有不同。这首词起句用了晋朝殷仲文（字仲文，？-407）的故事，《晋书·殷仲文传》载：“仲文因月朔与众至大司马府，府中有老槐树，顾之良久而叹曰：‘此树婆娑，无复生意’”<sup>47</sup>，作者使用这一典故紧扣所咏之物七星槐，以“司马门前”点出旧地，“自仲文老去”暗示时间流转，故不再，“几度沾衣”则是词人本人的心绪写照。树木本身婆娑而无生意，而作者以树起句，不复生意的自然不仅仅是树木本身，很容易联想到个人身世乃至国运兴衰。而词作末句则化用了杜甫（字子美，712-770）《宿府》中“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sup>48</sup>这一名句，杜氏的诗句本身即在个人辗转飘蓬的命运之外，包含着

---

<sup>46</sup> 将语码理论引入对词作的解读，始于叶嘉莹先生的<对常州词派张惠言与周济二家词学的现代反思>一文，在文中叶先生借鉴了西方符号学的观点，并将其运用在对词作幽微之意的生发阐释上：“首先是洛特曼（I. M. Lotman）所提出的文化符码之说，其次是另一位符号学家艾考（Umberto Eco）所提出的显微结构（micristructure）之说，前者是指诗歌语言中的某些语言符号，在某种文化中被使用得长久了以后，便会携带有丰富的文化信息，从而引起说诗者对文化传统方面的某些已成定型的联想，后者则是指诗歌语言中的另一类语言符号，此类语言符号并没有文化传统中某种定型的联想关系，但却在语言符号结构中包含有许多可以引发读者之联想的细致而丰美的质素。”叶先生认为，这种说法十分契合词学创作“兴于微言”的传统，词人在创作中选用富有启迪性的语言符号，“令读者在接受中可以产生很多自我创造的空间”。《中文学刊·第一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1997），页155。

<sup>47</sup> 【唐】房玄龄等著，《晋书·列传第六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4），页2605。

<sup>48</sup> 【唐】杜甫，<宿府>，《钱注杜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页461。



关于家国情怀的关切。此外，词作中的斜阳、芳草、莺啼等等意象，都是历来词人写作时常常使用的语码，斜阳往往暗示着衰落的国家<sup>49</sup>，“庭草萋萋”暗示着时间的流转与家园的衰败<sup>50</sup>，而“一般都付莺啼”也明显脱自陈亮“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赏，都付与、莺和燕”这一忧国伤时的名句<sup>51</sup>。因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我们无法说实词人的本心，但词人们之间心领神会的相似语码，乃至物是人非的主题一再出现的本身就足以给阅读者足够的阐释空间。

值得补充的是，过去之所以令词人们产生如此强烈的感怀，并非因其与现实完全隔绝，有时恰恰正是因为词人们在现实中看到与过去相关或相似的场景，反而激发起词人的伤感之情。因而《憩园词话》“同人”们在词作中关于“今”与“昔”的敏感并非仅仅体现在展现过去与现在不可调和的对比上，相反，寻找过去与现实的相似之处也成为了这种伤感情怀的一种表现：

小队湾头试玉鞭，东风回首十三年。清时破寺仍钟鼓，野寺春灯自管弦。  
寒似水，梦如烟。绿杨依旧画桥边。宵来一枕孤篷雨，不是江南一惘然。  
——张熙《鹧鸪天·邗江道中》<sup>52</sup>

<sup>49</sup> 斜阳在词作中常常作为对衰弱国家的暗指，如辛弃疾“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朱彝尊“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等都是以斜阳暗喻兴衰的名句。【宋】辛弃疾，〈摸鱼儿·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页66。【清】朱彝尊，〈卖花声·雨花台〉，《四部备要·集部·曝书亭全集》（上海：中华书局影印，1935），页206。

<sup>50</sup> 萋萋用于形容草色，如白居易名句“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崔颢“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等，往往包含着周而复始生长的青草与一去不回的时间与人事的对比，后世作者往往。【唐】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1042。【唐】崔颢，〈黄鹤楼〉，万竞君注，《崔颢诗注；崔国辅诗注》，页42。

<sup>51</sup> 【宋】陈亮，〈水龙吟·春恨〉，姜书阁笺注，《陈亮龙川词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页105。【清】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认为此句“言近旨远，直有宗留守大呼渡河之意”，页111。

<sup>52</sup> 【清】张熙，〈鹧鸪天·邗江道中〉，参见【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续修四库

东风起，水悠悠。古湾头。尚有旧时残垒在，使人愁。

黄昏细雨扁舟。垂杨外、来往一群鸥。灯火寂寥三两处，是扬州。

——赵彦俞《倚栏令·晚泊茱萸湾》<sup>53</sup>

相对于顾文彬、丁至和等人对今昔之间巨大差异的关注，张熙和赵彦俞所关注的则是往昔与现在的联系。不管是回首十三年里仍一如既往的春寺钟鼓，还是故战场中残存千年的旧时残垒，都将词人的思绪又现在拉回到往昔，然而这种往昔却并没有给词人提供安慰，反而勾起了词人时迁事易的感伤。词人的叙述表面关注于现实与过去的一致，如绿杨画桥古湾，而在这些一致的背后，却暗含着词人并未说出的不一致的存在——不能回去的江南和灯火寂寥的扬州。一致的破寺孤钟、寒水垂杨及象征着破败的古湾残垒都以一种萧条的姿态呈现在词人面前，在回忆面前，仿佛是衰败的事先预告，而真正令词人怀念的那些绮丽繁荣却已经不存在了。这种含蓄的写法令整首词的情感表达更为蕴藉而深刻，杜文澜即评价张熙《鹧鸪天》“咏扬州军中事，清时一联，神来之笔，不可多得”<sup>54</sup>。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直接将过去与现在的不一致之处进行对比，还是将过去与现在相似之处联系起来，这些作品中词人所蕴含的共同情感却是相同的——过去是丈量现实的尺度，现实停留在被战火摧毁的状态，永远无法企及过去，无论似与不似皆令人伤感。

本节分析了今昔对比的不同案例，词人们或直书因连年战乱而产生的巨变，或对战乱避而不提而仅仅关注个人生活中今与昔的差异本身，或与之相反，去描写今与昔的一致之处，然而这几种情况所承载的这群词人的群体情感与集体记忆却是相似的。在烽火连天国运飘摇之际，词人们聚集在相近的区域，对不可挽回的逝去时光的情结，以及或明或暗展露的对战争的厌恶与国运的担忧，成为了经历了共同时代的词人们理解与沟通的暗语。因而在记录与阅读的过程中，词人们

---

全书》，卷 1734，页 455。

<sup>53</sup> 【清】赵彦俞，〈倚栏令·晚泊茱萸湾〉，同上，页 438。

<sup>54</sup> 同上，页 458。

因相似的身世凝结在一起，增加了彼此的共鸣与归属感，哪怕在不知身世的情况下，词作本身也包含着互相理解的通道。正如《论集体记忆》一书所言：“个体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但也可以确信，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来实现的”<sup>55</sup>，在书写与阅读的过程中，词人们相互提醒着过去与现实的差异，藉此，每个词人个人化的情感得到了肯定与安慰，而促成了这个时代这个群体间的身份认同。

### 第三节 转徙流离，得传是编——太平天国战争中“同人”词作的整理

除去在词作中展现出对太平天国战争的同仇敌忾，现实中的词坛活动以另一种方式展示着词人们群体意识的凝结，其中最为明显的表现即是当地词坛对太平天国时期家破人亡的同人散佚词作的收集整理。

太平天国战争持续十余年，位于“天京”周遭的江南城市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很多词人遭遇不幸，大量词作也尽付劫灰。这样的情况下很多词人的词作仍然可以得到保存，有赖于当地词坛的同心协力与互相帮扶。根据《憩园词话》中的记录，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及战事过后，虽然江南地区秩序混乱，但自发收集亡故词人散佚作品的事例仍并不少见：

（汤贻汾）其诗词稿，为李子禄名嵯参军从间道携出。旧友吴平斋（名藻），其戚曹恺堂诸君，重为刊刻。<sup>56</sup>

会遭寇乱，转徙流离，此编（《倚晴楼诗词集》）失於逆旅。赖其（黄燮清）女夫宗子城太守景藩，冒险往搜，竟得完璧。韵甫亡後，子城商之张鹿

---

<sup>55</sup>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ies*(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p.44.中文译文摘自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页 71。

<sup>56</sup> 【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卷 1734，页 387。

仙、胡月樵两观察，诸迟菊孝廉为之校订，同治癸酉刊於武昌。是编之传，盖有隐为呵护者。<sup>57</sup>

（徐汉苍）歿後，恩竹樵方伯刻其稿，余为校刊。<sup>58</sup>

（宋志沂）诗词稿均前失，赖其友刘泖生太守，就平日所存，录示其弟有年及其高足李彤伯，刻于吴门。<sup>59</sup>

在当时人人自危的战争环境下，词人们如何冒险保存亡故词友词作，或对战争中被毁词稿整理出版，通过以上几则轶事可见一斑。战乱之中保存词稿需要花费相当多的努力，黄燮清与汤贻汾的词作险些流失于战乱之中，若非亲友冒险携出，后人将不复可见，即使并没有散佚危险的词作，如要刊刻，也需要有人校订整理，有人解囊刊印。词为小道，然而在这样波诡云谲的大时代风潮中，却得到了如此多的关注和保护，对共同敌人的同仇敌忾化为了同人群体的凝聚力，留存词稿的努力如同生者对死者的契约，因为在战乱中被冒险救出的，绝非仅仅是残存的文字，而是逝去词人籍“存言”而达以不朽的期望。

这样的慷慨义举并非仅仅对逝去词人单方面有着有利影响。通过这些案例我们能够发现，词人们对散佚词作的同人作品校订整理，慷慨刊刻，乃至冒险往搜，在当时的词坛中已成一种风会或佳话。如《憩园词话》收录的以上几则所示，很多此类活动的发起者本是逝者亲属及朋友，而随着刊刻和校刊活动的进行，这些词坛佳话也随着词集的流程口耳相传，无论是殉难的词人或是慷慨协助的词友，都籍因这一佳话而声名更著。《憩园词话》记录了这样的故事，正体现了这些佳话在差序格局的社交网络下流播的过程。

这种为逝者“存言”的理念也贯穿了杜文澜《憩园词话》的写作过程。除了上述一类得以保全的词人作品之外，对于一些乱后不见词集传世的词人，杜文澜

---

<sup>57</sup> 同上，页 280。

<sup>58</sup> 同上，页 444。

<sup>59</sup> 同上，页 518-519。

在编写词话之时也特意收录，以为词人存作：

迨癸丑春，粤逆陷扬郡，（谢元淮之词）全付劫灰。今於黄韵甫（黄燮清）大令所辑国朝词综续编中见其二词，能守律法，录一阕以存故人之谊。<sup>60</sup>

（沈鸿）诗词稿均失，惟萍绿词中有题十三楼吹笛图一阕，与实庵太史（陈元鼎）之作，异曲同工，因附录之。<sup>61</sup>

（宋翔凤）司马著作等身，兵燹后流传甚少，深可慨已。今於词综续编中得读其香草词二阕。<sup>62</sup>

杜文澜收录这些词人词作的目的非常明确，几乎每一则类似的条目中，杜氏都刻意强调了“粤逆陷扬郡，全付劫灰”，“诗词稿均失”，“司马著作等身，兵燹后流传甚少”等存录此位词人词作的背景，也并不讳言“以存故人之谊”的存录目的。然而与上文提到的那些对散佚词作的整理出版不同，杜文澜所留存的这些作品却往往已被朋友词集或《国朝词综续编》<sup>63</sup>等词选收录，就这个角度来说，杜氏若仅仅只为替故去亲友存言，似乎并无刻意重录这些词作的必要。因而我们可以推测，杜氏所谓的“以存故人之谊”，并不仅仅意指对故人词作进行保存，而更可视作为对故人“同人”身份的强化。因为无论是词集或是词选，所关注的都仅仅是词作本身，而《憩园词话》以收录词坛“同人”为内容，也以“同人”群体为潜在的读者对象，杜氏将这些分散于各类词集词选中的词作整理出来，将这些词家纳入到“同人”的范围内，突出了这群词人身份上的归属，也便于其他“同人”的阅读检索。这样的做法恰可视为《憩园词话》“存留同人”这一写作目的

---

<sup>60</sup> 同上，页 279。

<sup>61</sup> 同上，页 294-295。

<sup>62</sup> 同上，页 390。

<sup>63</sup> 《国朝词综续编》为清代词人黄燮清等人于同治年间编纂的一部词选，上海中华书局于 1935 年曾于丛书《四部备要》中收录该书影印本。

的佐证。

#### 第四节 总结

《憩园词话》一书所录词人们何以构成“同人”的原因，集中体现在本书对太平天国的战事书写上。对于这群词人来说，他们对共同经历的战事的深刻感受将他们连结为一个整体，无论是对城市与地点的相似情感，还是对“今”与“昔”之间差异的敏感，都成为他们互相理解与集结的密码。除此之外，他们在战争中的同仇敌忾还表现在对逝去词人词作的保存出版，这些佳话的记录和传播无疑有助于当时当地词人身份认同感的产生。当然，并非所有拥有这样的感触与经历的词人皆可被这一群体视为“同人”，构成上一章所提及的差序网络的亲缘与朋友关系仍然是这一同人网络连结的基础，这就保证了凡词话中所提及“今”与“昔”及其发生的地点、所录的事件能为“同人”们所熟悉。而其他词人若和身处这一网络中的同人们没有地域、亲缘、朋友等关系上的连结，即使分享有相似的感受，也很难得到同人们的身份认同。

然而我们仍然不应忽视，这些词作和案例皆出自杜文澜的筛选与记录。杜氏本人也在他的词话中参与了“存留词作”的活动。然而他的留存，却不仅仅是对可能散佚不见的词作的保存，而是对流传在外而被他界定为“同人”的词作进行的再整理，这样的过程无疑包含了杜文澜本身对同人身份的界定与思考。

创作上的相似度与身份上的认同感无疑都是构成词学群体的重要元素，通过本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太平天国时期，无论在词作中还是行为上，词人们都展示了一个群体应有的凝聚感，从这个角度说，《憩园词话》的“同人”已具备构成一个词人群体的基本条件了。

## 第五章 余响与结语

### 第一节 《憩园词话》的余响

《憩园词话》的创作持续到杜文澜的晚年，至其离世后始有钞本行世<sup>1</sup>。在其去世之后，吴县潘钟瑞于光绪八年（1882年）五月对此书校订两遍完毕，光绪十年又经武进费念慈<sup>2</sup>（1855-1905）重新校读毕。因该书面世时杜文澜本人已归道山，且该书始终没有正式刊刻，所以在当时词界并未得到广泛传播，更未引起特别的关注或讨论。在这样的情况下，潘钟瑞对《憩园词话》内容进行的批点就成为了解当时当地词人对《憩园词话》反馈的可贵途径。

潘钟瑞，字麟生，出身于吴县地方大族潘氏，《近代词人考录》中对潘钟瑞的身世有所记载<sup>3</sup>。潘钟瑞热心词坛活动，在点校《憩园词话》之外，也曾助杜文澜校订《词律》<sup>4</sup>，并参与了很多当世词人词集的校刊活动<sup>5</sup>。潘氏虽然年辈较小<sup>6</sup>，但是实际上与杜氏年龄只有七岁之差，他与杜文澜身处于同样的一个时代，也见证了在《憩园词话》中发生的多数词坛事件。潘钟瑞本身也是一个词人，著有《百

---

<sup>1</sup> 参见林滢，〈《憩园词话》版本小考〉，见《剑南文学》，2003年第1期，页87,77。

<sup>2</sup> 唐圭璋编《憩园词话》中作“费念孙”，应为误钞。杜文澜，《憩园词话》，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页3005。

<sup>3</sup> 朱德慈，《近代词人考录》，页85。

<sup>4</sup> 【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页546-547。

<sup>5</sup> 潘氏协助校刊词集的词人包括王寿庭、仲湘、刘履芬、贾敦艮等人，参见沙先一，《清代吴中词派研究》，页144。

<sup>6</sup> 杜文澜与潘世恩之子潘曾玮（1818-1886）共事于江北军中，交情匪浅，而潘钟瑞则为潘世恩侄孙，潘曾玮侄辈。其年辈关系详见〈潘氏家族词人世系图〉，见沙先一，《清代吴中词派研究》，页140。

不如人室词草》（一名《香禅词》），其词作风格介于吴派与常派之间<sup>7</sup>，杜文澜评价其词作“究心律吕，能以清气行乎句间，妍丽尽致”<sup>8</sup>。

在词话中，潘钟瑞的批注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主要针对杜文澜的词学观进行评论，或以此为基础，对自身的词学观点进行阐释。如：

凡调中应用去上处，押入声韵，则作去入，盖入可作上也。鞠人（黄曾）此首，押入声多以入作上。<sup>9</sup>

数年前余购得默卿（谢元淮）碎金词韵一书，套版分色刻印均极精致。既而又收得碎金词谱，两书遂称合璧。然所谓韵与谱者皆未详备，诚如憩园之言，不敢引以为据也。<sup>10</sup>

必不可染指一语，似太偏。月坡（孙麟趾）词即尚流利者，虽不至竟如曲，而已在界限之间。<sup>11</sup>

这类评点往往涉及到词学创作中比较专业的方面，其内容多是对杜氏观点的阐释或附和，或根据其自身的创作经验为杜氏的论点提出例证。潘钟瑞与杜文澜同样对格律很有研究，词学观点也颇为一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潘钟瑞对杜文澜的观点皆表示出赞同的态度，即使偶有意见分歧，潘氏在提出自己的建议时也极为委婉。然而除去在词话第一章针对杜文澜词学观的批点，这一类的评点在全书中并不多见。

在更多的情况下，潘钟瑞的评点往往针对其与杜文澜共同相识的词人而发，

---

<sup>7</sup> 沙先一于《清代吴中词派研究》一书中论及潘氏词人受到吴派与浙派影响，参见页140-144。

<sup>8</sup> 【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页2959。

<sup>9</sup> 同上，页2908。

<sup>10</sup> 同上，页2870。

<sup>11</sup> 同上，页2857。



或叙述与该词人的社交关系，或介绍自己收罗词集的经历，或陈述自己与该词人的交往状况。其体例大致如下：

剑人（蒋敦复）此书初稿，余曾见之，名宫调谱，后乃改名。其书于十二律逐一分按，既而又更改错换，自以初稿为误也。当时余颇疑剑人自歧其说，尚涉游移，未曾细读。迄今思之，意剑老必有所据，惜未与讨论，殊悔疏忽矣。<sup>12</sup>

铭州词，三十年前曾见之。又有与同人唱和之词，匏庐（沈涛）观察所作亦不少，则乱后又曾及见也。<sup>13</sup>

于庭（宋翔凤）先生碧云庵词两卷，洞箫词一卷，余皆从友借得，倩人录副藏之。佳词似不止此。

次公（孙广文），余老友也。始因王养初（王寿庭）以识之，难中会于申江，极讌饮之欢。克复后，犹来苏，目已渐朦，不能翔步矣。然尚爱吟如命。其澣月楼词，见其所刻同人词选中，有汤雨生（汤貽汾）、薛慰农（薛时雨）、王椒畦（王学浩）诸人，各自为卷。其诗集名始有庐，已刻。<sup>14</sup>

时轩（潘诚贵），余弟也。补之（潘希甫）叔父次子，椒坡（潘介繁）之胞弟，惜早卒。而著箭红词，曾镂版，兵乱失之。今其子志颖列贤书，乃掇其诗赋试帖并前词刻之为听香室遗稿，恨不得呈政于杜老矣。<sup>15</sup>

养初（王寿庭）虽为藩吏，特居其缺，公事悉委之承办案友，而刻意吟

---

<sup>12</sup> 同上，页 2852。

<sup>13</sup> 同上，页 2892。

<sup>14</sup> 同上，页 2919。

<sup>15</sup> 同上，页 2920。

咏。所为古今体诗亦隽逸高超，曾刻数卷，皆自为精选者。……寇至，养初殉难，刻本无片存，印本亦不复得。余承刘泃生（刘履芬）太守以词一本见赠，即采入此编之原本也。余拟与子绣族叔香隐庵词并遴选而重刻之，奈有志未逮耳。<sup>16</sup>

与对杜氏词学观点上的简略呼应相对，在这些条目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潘钟瑞对梳理社会关系的关注和对记录词坛活动的热情。潘钟瑞显然抓住了杜文澜“存留同人”的词话主旨，并自觉将自己纳入了杜文澜的“同人”网络之中，融入并丰富着这一网络。潘氏的评点不啻于对《憩园词话》的一种回应，我们在之前几章中所论述的《憩园词话》的特点在他的批点中也均能找到例证。

在书写方式上，潘氏批注的关注点首先集中在这些词人与他本人的社会关系上，因而在批点中如果需要补充对某位词人的介绍，往往会以“次公，余老友也”、“时轩，余弟也，补之叔父次子，椒坡之胞弟”这样的语句开始，以强调词话中所收录的词人与自己的关系。此外，和《憩园词话》一样，潘氏批点中关于人物的部分并不倾向于对词人经历的客观描述或全面评价，反之，却不乏对词人生活细节和人际往来的叙述，而这些细节和往来往往又与潘氏本人的经历相关。以其关于孙灏（字次公，1813-1869）的批点为例，潘氏所记录的“难中会于申江，极讌饮之欢”显然并非孙灏人生中重要的事件，而只是因为潘氏本人参与其中而被记叙下来，同样的视角延续在之后对孙灏目盲及其词集刊刻情况的描写中，在批点中，相对于被书写的词人孙灏，潘钟瑞本人的存在更为突出，整个小段完全是以潘氏的视角出发，所描述的也只是潘氏本人见证和参与的事件。这种相当个人化的叙述方式与《憩园词话》不谋而合，无论是杜文澜还是潘钟瑞，他们对个体与词学网络间的联系与互动展现的这种巨大热情，正可视为对建构同人网络这一写作目的的附和。正如第二章所言，杜文澜对材料的选取与编排中致力于将被记叙者编织到他所处的社交网络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潘钟瑞批注中对已置身于这一网络的词人们与己关系的着重强调，即可被视为对这一网络的自觉融入。

---

<sup>16</sup> 同上，页 2961。

在记叙的情感倾向上，潘钟瑞与杜文澜的态度也颇为一致。二人经历着一个共同的年代，见证了太平天国为整个江南社会造成的悲剧，杜氏身为朝廷官吏并从军于江北大营，潘钟瑞虽未直接参与战争，但其所处的家族潘氏几代位居高位，在苏州当地亦是显赫望族，他们对这场战争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情感皆十分相似。如同第二章所言，《憩园词话》在存人过程中往往隐含一种由今昔差异而带来的感伤情绪，潘钟瑞对这些词话中叙及的词人们也并不陌生，因而在批注中，在论及这些词人时也自发对这种情绪也进行了一系列回应。以上文罗列的段落而论，今与昔的对比与时间的流逝是潘氏批点中十分敏感的话题，“过去”和“现实”两重元素每每在同一个段落中出现，将生活的经验切割成两个部分，词人之风雅与词作之隽永只存留于往日美好时光中，而此后，无论是目盲的孙灏，词作版刻尽失的潘诚贵（字树轩，1829-1855），还是殉国的王寿庭，皆只留下惨痛的经验。如同《憩园词话》中出现的情形一样，这样的经历未必与战争有着直接关系，然而在批点中，潘氏选择使用的“克复后”、“乱后”、“寇至”等等分割时间的词语，却刻意将这些人生无常之感与这场战争关联起来，突显了美好过去与凄凉现实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二人所书写的同人间相互关系上，与杜文澜在《憩园词话》中所建构的“差序网络”相对，潘钟瑞在评点中也建构了以其自身为中心的规模较小的“差序网络”。这个网络作为对杜氏原有网络的呼应，所牵涉的词人几乎皆为已被《憩园词话》收录的同入，然而，鉴于杜氏与潘氏之于这些词人的亲疏远近之别，同样的词人在二人的差序网络中或处于不同的地位。如在《憩园词话》中，杜文澜只是于秦光第（原名廷姬，号次游，？-1851）处偶见潘诚贵之词，摘录一阕，并未花费太多笔墨，而潘钟瑞在批点中却因其与己的亲缘关系而详述了这位族弟的生平和社会关系，并为未能将其词集《箭红词》“呈政于杜老”而遗憾。通过这个案例可以看到，潘钟瑞这种以本人为中心编织的差序格局词学网络，并不意味着对杜文澜原有网络的推翻或重建，相反反而强化了自身与《憩园词话》同人间的联系，可被视为对《憩园词话》词学网络的补充和拓展。

通过以上三条，我们可以清楚可见，潘钟瑞在涉及存人的批点中和杜文澜保持了极大的一致性，在记叙的原则方面，他们同样重视词人间的相互关系大于词

学本身内在元素；在叙事情感方面，由太平天国战争带来的今与昔间的巨大变化同样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体现在了对词人生平的记叙上；此外，潘钟瑞也同样以他本人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呈现差序格局的社交网络，而这一网络与杜文澜原有的同人网络形成了一种呼应，补充扩展了杜氏网络的深度和宽度。因而，潘氏的批点可以视为对杜文澜《憩园词话》宗旨的全面回应。在批点中，潘钟瑞与杜文澜分享了针对于相同事件、相同地点、相同人物的相同感受，这些基于共有时代、相似身份与相近词学交际圈而产生的共同点，稀释了两人词学观的不尽相同之处，而令潘钟瑞产生了词学同人的身份认同感。

《憩园词话》旨在建立一个“同人”网络，然而词话中的“同人”们虽以词而聚合，而词学元素却绝非丈量同人关系的绝对标准。不管是杜文澜还是潘钟瑞，皆首先将这部词话看作社交网络的集结，词学限定了这一社交网络的属性和活动内容，但本质上“存人”才是这一词话的根本目的。正是出于对这一点的共识，潘钟瑞以他的批点呼应了杜文澜同人网络的建构，并愿意用他本人的经验丰富并完善这一网络，这也是潘氏批点之于《憩园词话》的意义所在。

然而，正如前文所言，《憩园词话》未及正式出版杜氏已然过世，词话并未得到广泛流传，且词话创作于杜文澜晚年，收录于词话中的很多词人先于杜文澜而去，也未及目睹杜氏建构的这一同人网络，潘钟瑞的点评几乎成为被收录的词人如何看待并呼应这部词话的唯一史料。潘氏的点评是否能代表当时被书写的同人的普遍态度我们已无据可考，《憩园词话》一书也因出版等种种原因并没有获得清代词坛的后世论者的广泛关注，既乏当世的回响，又乏后世的传播，杜文澜所建构的“同人网络”最终并没有形成一个有着明确界定的词派或词人群体。偶有研究者论及到，也往往只是以其为收录“淮海词人群”、“吴中词派”等地域性团体的词人的例证。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杜文澜仅仅是记叙了当时词坛同人的活动，而并未彻底完成他本人存留同人的期许。

## 第二节 研究小结

从很多角度来说,《憩园词话》都可算是一部有着重要价值的词学著作。这固然在于前人所言“存人存词存史”之贡献<sup>17</sup>,也在于这部词话是第一部完整记录作者自身所处词坛交际网络的词话作品,词人间如何唱酬、交流、互相影响,词坛活动如何组织,乃至词人的官阶及相互亲属关系对其交往的影响,都借由这部词话完整而清晰地呈现给后人,令人可以一窥当时词人交往与词坛网络之概貌。从早年的“偶一为之,未曾精善”<sup>18</sup>,至咸丰丁巳年(1857年),与蒋春霖、丁至和开始的早期词学唱酬,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采香词》及《水云楼词》的刊刻,再至同治癸亥年(1863年)九秋词社的成立,再至晚年吴中区域词人间的唱酬,《憩园词话》大致勾勒了杜文澜一生由初始到成熟的词学历程。作为他晚年回顾生平的存人之作,这部词话记录了这个漫长过程中他亲身所历所闻的词人与词坛旧事,这是一部回忆性的作品,也是杜氏平生词学经历的总结。

回顾《憩园词话》的主要内容,可以发现整部词话被清晰地分为两大部分,以收录杜氏词学观为主要内容的第一章与旨在留存同人的第二至六章。二者的宗旨与纲领不乏相互矛盾之处,归其原因,在于前者是杜文澜作为词学家个体对自身词学理念的阐述,而后者则是杜氏将自身置于词学同人网络之中对整个网络中词人的回忆。写作目的的不同导致了书写方式的不同,而在这部词话中,杜文澜屡屡违背其自身词学观以求存录同人,显然视后者更较前者重要。

回到杜文澜创作这部词话的初衷,“就同人所谱新词,或已刊行,或存稿本,均为摘录数阙,自遣吟怀”,“暇时展观,如亲旧人,如游旧地”,这种态度本身即强调了这部词话的私人性。因而在词话中,杜文澜采用了偏重细节叙事与突显社交网络的书写模式,以强化“同人”间关系网络的建构。这种私人化的写作方式显然决定了《憩园词话》并非一部旨在成宗立派的作品,作者并未刻意强化本人的词学立场,然而正是这样的态度,令词话的内容更加真实,也能够更加客观

---

<sup>17</sup> 关于《憩园词话》之独创性与价值,其中黄琪雅在《杜文澜及其<憩园词话>研究》一文<《憩园词话》之价值>一节中论述已至为详细,如其书对逸词之收录,与他本互证之考据价值,乃至对后世词话的启迪价值,皆各有例证,珠玉在前,不予详述。国立中央大学硕士论文,页148-162。

<sup>18</sup> 【清】金吴澜,〈杜小舫方伯校注戈选宋七家词序〉,《宋七家词选》,页1。

地展现当时的词坛风会。在词话中，杜氏所收录的“同人们”呈现了一种以他本人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的状态，差序网络随着“亲疏”与“尊卑”等因素的影响而向外扩散。杜文澜本人并没有特别意识到这一格局的存在，然而事实上，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共同影响了词人在一个词学场域中的地位，这一格局主导着杜氏在词话中建构的词坛网络的运作。

可以说，杜文澜建构的同人网络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词人群体，然而无论如何松散的词学组织，既称同人，则暗含着建构者寻求身份认同的努力。对于《憩园词话》所记录的词人来说，太平天国战争这一场当时当地词人所共历的灾难，集中体现了他们的政治态度及共有情感的相似之处，为词话的潜在阅读者建立一种身份认同提供了土壤。在这场战争中，词人之间的情感得到了共鸣，而同样在阅读词话的过程中，杜文澜的叙述又再次强化了这种共鸣，词人间的相互联系就此得到了加强。

回顾本文所写内容，本文以《憩园词话》同人网络为中心，探讨了杜文澜在本书中如何建构了一个词学群体。第一章阐述了本文的写作目的并对前人文献展开综述，第二章简述了《憩园词话》的概况，包括本书的写作目的、书写模式及叙事情感；第三章详述了《憩园词话》词学网络的同人活动，分析了词话同人网络中隐藏的差序结构，以及影响这一结构的各项要素；第四章则从“太平天国”角度探讨《憩园词话》词学同人的身份认同，从词人们对时间、空间等元素的把握，以及战争期间的词学互动和相互帮扶出发，探讨了这些词人建构身份认同的可能性；此章前半部分从潘钟瑞对词话的评点出发，以展示当时当地词人对《憩园词话》同人网络的呼应之一角。

前人述及词人群体，多以流派、地域、身份等为界限，以清词来说，诸如广为人知的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临桂词派等等，它们往往兴起于某一处特定的地点，有着既定的词学宗旨，或如遗民词人等共享相同政治身份，或如女性词人群体以性别而区分，这些标准都是客观而易于定义的。然而通过对《憩园词话》词人群体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客观的条件固然是形成词人群体时重要的因素，但在词人的真实交往中，词人形成一个群体或产生身份认同却可能并非出于这些非此即彼的因素。真实词人的社交状况很可能与其他社会交际状况相似，以

发生者本人为核心，形成由“亲疏”和“尊卑”为导向的差序格局。这一格局也受到适才所提的流派、政治身份、性别等因素的制约，如词学观点或政治倾向相左的词人很难形成亲密的唱酬关系，但是在这样的网络中，更多的是场域间各项元素的制衡而非某项因素的单一作用。本文以《憩园词话》的词人群体作为标本，以求展示当时词坛真实的交际状况。试图通过对《憩园词话》所建构的词坛网络的分析，展现出词学活动的一种新的可能——这群词人关注于本身内部的联系超越于与外界的关系，他们没有被称为一个词学群体，然而却以同人相称，事实上也有着自我认可的身份认同。

回顾历来词学的发展史，在清朝的主流词派中，事实上也存在着类似的案例，即使如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等影响波及全国的词派，其初始的建构格局也可视为由其宗主而生发出来的关系网络。以常州词派为例，张惠言编订《词选》的最初目的本即是为其坐馆的金家子弟学词所用，早期常派的主要词人也是由张氏昆仲周围的几位关系密切的词人组成<sup>19</sup>。与《憩园词话》的同人相比，这些成型的词派可能只是拥有着更清晰的界定，历时更久远，发展更完善，词学宗旨也更为明确。

时至光绪年间，传统文学的黄金年代行将结束。晚清时局动荡不安，更深刻的内忧外患接踵而来，咸同乱世之际这群同人的唱和、交往并没有得到后世广泛的重视。至不到四十年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被视为正统文学的诗赋尚且受众日减，作为小道末技的词学的发展空间更是在新文学的挤占下失去了大规模生长的土壤。我们可以做一大胆的假设，如果《憩园词话》能够在当时得以出版流播，或时局稳定假以时日，杜文澜所建构的词学“同人”群体或许会渐趋发展，而成为一个成熟的词学流派。或者至少，《憩园词话》的“同人”结构是否可被视为词学流派产生初期的一种雏形。这些都并不妨可以作为一种有趣的猜想。

谨陈管见，难详阙疑。聊为引玉，以待诸贤。

---

<sup>19</sup> “常州词派的初始成员，《词选》原附录七位，即黄景仁、钱季重、陆继辂、左辅、李兆洛、恽敬、丁履恒，他们都是常州人，皋文昆仲的朋友，后郑抡元补入皋文昆仲及三位歿人，即金应城、金式玉和郑抡元本人，他们仨都是皋文入室弟子。”朱德慈，《常州词派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24。





## 附录

表一·《憩园词话》所录词人表

姓名	籍贯	与杜文澜关系	词学著作	身份
周之琦	河南祥符	于楚幕中相识	《金梁梦月词》、《心日斋十六家词》选集	官员
戈载	江苏吴县	苏州词坛前辈	《词林正韵》、《宋七家词选》、《翠微花馆词》	官员
谢元淮	湖北松滋	于两淮相识	《海天秋角词》	官员
黄燮清	浙江海盐	与其婿宗景藩相识	《倚晴楼诗词集》	官员
姚辉第	河南辉县	受其婿嘱托，校订《菊寿庵词》	《菊寿庵词》	官员
陈元鼎	浙江钱塘	金安清赠其词稿	《鸳鸯宜福馆吹月词》	官员
沈鸿	江苏会稽	于丁至和《萍绿词》中见其词		官员
俞樾	浙江德清	由曾国藩结识，与恩竹樵也有唱酬	《春在堂词录》	官员
潘曾沂	江苏苏州	与其弟潘曾玮相识	《船庵词》	官员
潘曾莹	江苏苏州	与其弟潘曾玮相识	《小鸥波馆词钞》	官员
潘曾绶	江苏苏州	与其弟潘曾玮相	《睡香花室词》、《秋碧	官员

		识	词》、《同心室词》、《忆佩居词》、《蝶园词》、《花好月圆词》	
潘曾玮	江苏苏州	相识	《玉淦词》	官员
潘遵祁	江苏苏州	相识	《西圃集》	官员
潘希甫	江苏苏州	与其兄潘遵祁相识	《花隐庵词》	官员
潘介繁	江苏苏州	与其弟潘遵祁相识	《晓梦春红词》	官员
汪藻	江苏苏州	与其兄汪锡珪相识	《绣蝶庵词》	官员
张应昌	浙江杭州	同乡，以世执相往还	《烟波渔唱词》	官员
沈涛	浙江嘉兴	同乡，相识		官员
恩锡	满洲	恩师	《词律》校订	官员
李鸿裔	四川中江	相识，参与金眉生偶园落成时<满江红>唱和		官员
吴云	江苏归安	订交三十年，同居十载之挚友，参与金眉生偶园落成时<满江红>唱和		官员
许乃穀	浙江杭州	与其子许道身相识		官员
顾文彬	江苏元和	相识	《怡园词》	官员
勒方錡	江西新建	相识	《樽州词》	官员
应宝时	浙江永康	于苏州相识	《射雕山馆词》	官员

曹楙坚	江苏吴县	与恩锡相识，恩锡取其集重刻，为其校订		官员
汤贻汾	江苏武进	与吴云相识，吴云为之刊刻词集	《画梅楼倚声》	官员
宋翔凤	江苏苏州	老友	《香草词》、《碧云庵词》、《洞箫词》、《乐府余论》	官员
黄曾	浙江杭州	从顾文彬处借其词集	《瓶隐山房词集》	官员
张泰初	浙江杭州	与金安清相识	《横经堂诗余》	文人
王振	广西马平	与曾国藩等共结文社		官员
冯登府	浙江嘉兴	于冯家购得碑铭原迹，同乡	《种芸仙馆词》	官员
章黼	浙江杭州	于盛幼兰处借其词钞	《梅竹山房词钞》	文人
秦绶业	江苏无锡	于苏州贾益谦处相识	《微庵词录》、《虹桥老屋词剩》	官员
韩闻南	江苏江浦	于友人处得其词	《雪鸿吟馆词》	官员
秦光第	浙江嘉兴	为金澍诗友		官员
孙灏	浙江秀水	为金澍诗友，于小绿坡处相识	《澗月词》	文人
潘诚贵	江苏苏州	为秦光第诗友	《箭红词》	文人
严保庸	江苏丹徒	于黄文涵处知其词作		官员
徐本立	浙江德清	通过俞樾相识，	《词律拾遗》、《荔园词》	官员

		为刻其《词律拾遗》		
蒋春霖	江苏江阴	于泰州相识，为其刻《水云楼词》	《水云楼词》	官员
赵彦俞	江苏丹徒	与蒋春霖相识，以其词见投	《瘦鹤轩词》	文人
张鸿卓	江苏华亭	于奉贤相识	《绿雪馆词钞》	文人
朱和羲	江苏苏州	张文虎曾于苏州为其姬香滨索词	《万竹楼词选》、《草衣道人词》	布衣
徐汉苍	安徽合肥	恩锡刻其稿，为其校刊	《碧琅轩诗余》	布衣
丁至和	江苏扬州	相识，为其校刊词集	《萍绿词》	文人
丁至德	江苏扬州	丁至和之弟		文人
张熙	江苏苏州	于扬州相识		官员
余焜	浙江兴化	与丁至和相识		文人
金德辉	浙江兴化	与丁至和相识		布衣
黄之驹	广东吴川	于丁至和处知其词	《宋人词说》	布衣
周作熔	浙江湖州	与丁至和、蒋春霖相识		官员
张金镛	浙江平湖	与金安清相识	《绛跗山馆词》	官员
张炳堃	浙江平湖	张金镛之弟	《抱山楼词》	官员
张修府	江苏嘉定	与金安清、吴云相识		官员
周学濬	浙江乌程	于乌程相识		官员
马书城	山西介休	于扬州相识		盐官

宗源瀚	江苏上元	于泰州相识	《治春词》	官员
施燕辰	浙江山阴	于东台相识		官员
姚燮	江苏镇海	于顾文彬处见其画册	《疏影楼词稿》	文人
章存元	浙江杭州	女婿		官员
张维屏	广东番禺	于九江剿匪，同舟者口诵其词		官员
朱绶	江苏元和	顾文彬常称之，于曹楙坚集中亦见其词	《止堂词》	文人
范铠	浙江乌程	汉阳幕中同事范军楨祖父	《苕溪渔隐》	文人
如山	满洲	于楚中相识，曾为《采香词》作序		官员
宋志沂	江苏长州	与刘履芬相识，刘履芬为其刻印词集	《梅笛庵剩稿》	官员
钱官俊	浙江秀水	杜延章携来词稿	《梦蝶生词稿》	官员
沈秉成	浙江归安	曾为杜文澜《苏楼春眺图》题词		官员
沈传桂	江苏苏州	自顾文彬处所见	《清梦庵二白词》	文人
潘钟瑞	江苏苏州	助校《词律》、《词话丛编》	《百不如人室词草》	文人
王寿庭	江苏苏州	于郭秀虎处得知，曾与潘钟瑞等结社	《吟碧山馆词》	府吏
杨长年	江苏南京	弟子		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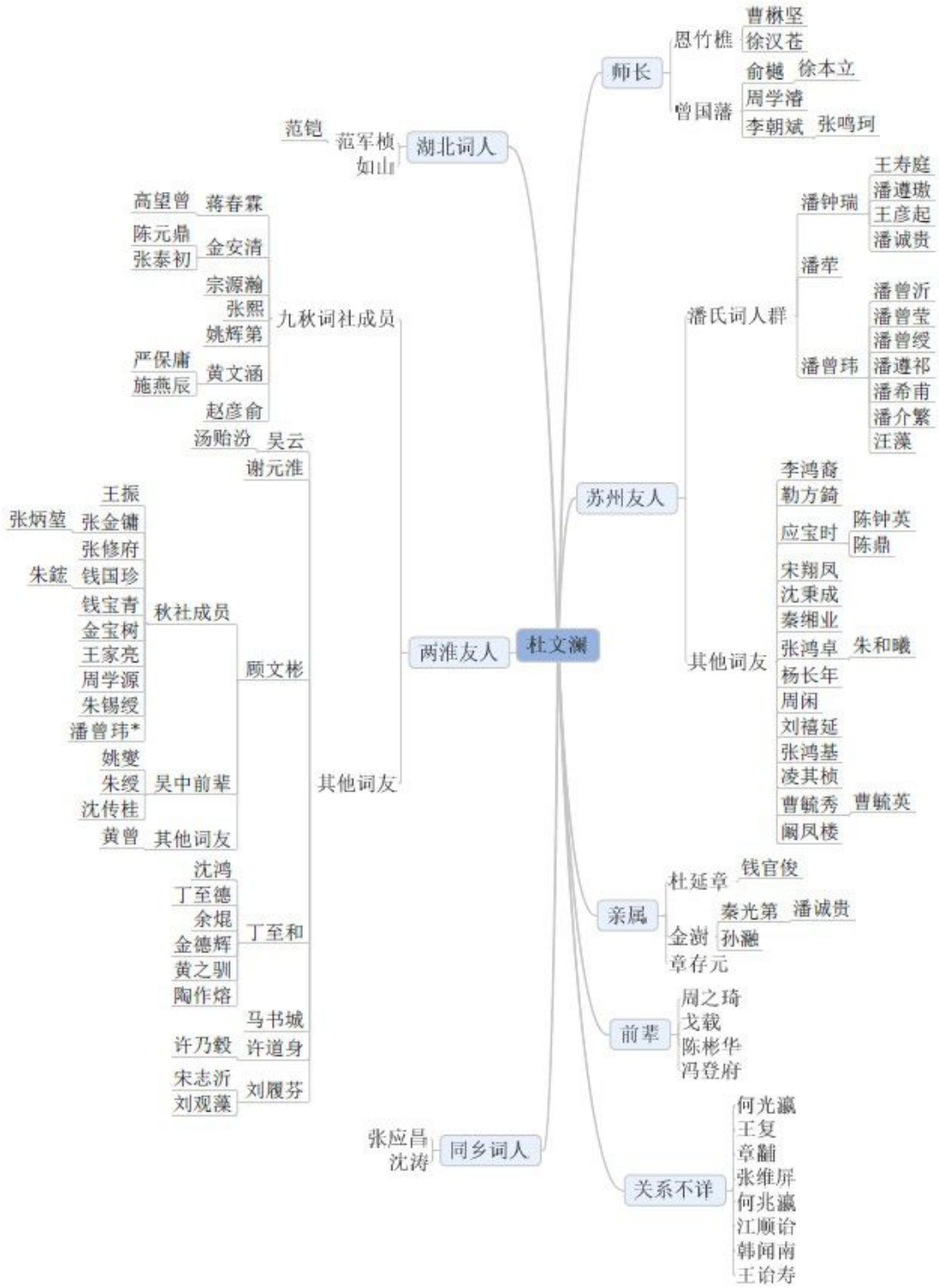
高望曾	浙江仁和	与蒋春霖等人唱和	《茶梦庵烬余词劫后稿》	官员
刘履芬	浙江江山	因购刻《资治通鉴》相识	《鸥梦词》	官员
刘观藻	浙江江山	刘履芬之弟	《紫藤花馆词》	文人
周闲	浙江秀水	同乡		官员
张鸣珂	浙江嘉兴	于李朝斌处相识	《寒松阁词稿》	官员
刘禧延	江苏苏州	不详	校《古韵通说》有校勘记、《中州切韵谱》	文人
潘遵璈	江苏苏州	与潘钟瑞同社	《香隐庵词》	文人
张鸿基	江苏苏州	不详		文人
潘萃	江苏长州	不详	《锦瑟词》	文人
凌其桢	江苏苏州	不详		文人
曹毓秀	江苏苏州	不详	《桐花馆词》	医生
曹毓英	江苏苏州	曹毓秀之弟	《钿梅馆词》	文人
王复	江苏苏州	不详		小吏
陈彬华	江苏苏州	不详	《瑶碧词》	文人
王彦起	浙江杭州	于友人集中常见	《静绿轩词》	文人
陈钟英	湖南衡山	与应宝时相识		官员
陈鼎	湖南衡山	陈钟英之子		文人
曾国藩	湖南长沙	上司		官员
钱国珍	江苏扬州	于友人处见其词稿		官员
朱鉉	江苏扬州	钱国珍之舅	《月底修箫谱词选》	文人
何兆瀛	江苏南京	不详	《心庵词》	官员
闾凤楼	安徽合肥	同事十余年		官员
江顺怡	安徽旌德	于友人处钞其词	《愿为明镜室词》	衙官

王诒寿	浙江山阴	友人严辰知杜氏有词话之作，以词寄之	《笙月词》	官员
钱宝青	浙江嘉善	顾文彬词社中人		官员
金宝树	江苏苏州	顾文彬词社中人		官员
王家亮	不详	顾文彬词社中人		
周学源	浙江乌程	顾文彬词社中人		官员
朱锡绶	江苏太仓	顾文彬词社中人		官员

按：

- 1.本表资料来源以《憩园词话》所载为准，籍贯不详者参考朱德慈《近代词人考录》予以补充。
- 2.“身份”一栏中，凡被授官者（生前或逝后）无论是否赴任皆称官吏，有科名者称文人，其余称职业，未有科名且职业不详者称布衣。

图一·《憩园词话》差序网络交际表格





## 参考书目

### 中文书目

#### 专书:

- 【清】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
- 万柳，《清代词社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
- 【清】万树著，恩锡、杜文澜校刊，《词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万竞君注，《崔颢诗注；崔国辅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
- 王国维，《人间词话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5。
- 王定安等，《重修两淮盐法志》，载《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陆德明音义，【唐】孔颖达疏，《周易注疏》，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陆德明音义，【唐】孔颖达疏，《尚书注疏》，载《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戈载著，杜文澜笺注，《宋七家词选》，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8。
-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济南：齐鲁书社，1996。
- 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清】叶申芑，《本事词》，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
- 【唐】白居易，《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 毕然、郭金华译，Maurice Halbwachs 著，《论集体记忆》，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
- 孙仲权，《清人词话》，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
- 冯其庸，《蒋鹿潭年谱考略；水云楼诗词辑校》，济南：齐鲁书社，1986。

- 刘晖译, Pierre Bourdieu 著,《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 朱祖谋,《国朝湖州词录》,上海:上海书店,1994。
- 朱崇才,《词话史》,北京:中华书局,2006。
- 朱德慈,《近代词人考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朱德慈,《近代词人行年考》,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 朱德慈,《常州词派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
- 【清】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四部备要·集部》,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35。
- 【清】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清】江顺诒,《词学集成》,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
- 【清】江峰青等修,顾福仁等撰,《重修嘉善县志》,见《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1970。
- 许烺光著,王芃、徐隆德译,《许烺光著作集》,台北:南天书局,1997。
- 严迪昌,《近代词钞》,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严迪昌,《清词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 【宋】苏轼,《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
- 【清】杜文澜,《采香词》,上海:席氏扫叶山房重修本,1892。
- 【清】杜文澜,《曼陀罗华阁琐记》,咸丰同治间秀水杜氏刊,1892。
- 【清】杜文澜,《初学史论合编》,上海:席氏扫叶山房重修本,1892。
- 【清】杜文澜,《古谚谣》,上海:席氏扫叶山房重修本,1892。
- 【清】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上海:席氏扫叶山房重修本,1892。
- 【清】杜文澜,《艺兰四说》,上海:席氏扫叶山房重修本,1892。
- 【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
- 【清】杜文澜,《憩园词话》,见《续修四库全书》卷173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三》,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12。
- 李猛、李康译, Pierre Bourdieu 等著,《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 吴在庆,《杜牧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

- 吴江霖、戴健林，《社会心理学》，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 吴熊和、严迪昌、林玫仪，《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
- 【宋】辛弃疾，《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沙先一，《清代吴中词派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 【清】张岱，《陶庵梦忆》，北京：中华书局，2008。
- 【清】张德瀛，《词征》，参见唐圭璋辑《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
- 【清】张惠言，《词选（附续词选）》，北京：中华书局，1957。
- 陈启能编，《书写历史（第一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 【清】陈性，《玉纪》，上海：席氏扫叶山房重修本，1892。
- 林立，《沧海遗音：民国时期清遗民词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
-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1。
- 【清】金武祥，《粟香室文稿》，庚子江阴金氏刻本，1900。
- 郑学勤译，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北京：三联书店，2004。
- 周俊富辑，《清代传记丛刊》，台北：明文书局，1985。
- 周梦庄，《水云楼词疏证》，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
- 周焕卿，《清初遗民词人群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周密，《武林旧事》，北京：中华书局，2007。
- 【清】周曾锦，《卧庐词话》，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
- 【清】赵翼，《瓯北集》，见曹光甫校点《赵翼全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 【清】俞樾，《春在堂词录》，见俞樾，《春在堂全书》，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 姜书阁笺注，《陈亮龙川词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 费孝通，《乡土中国与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莫立民，《近代词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 夏承焘笺校，《姜白石词编年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清】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4。

徐苔玲、王志弘译, Tim Cresswell 著,《地方: 记忆、想象与认同》,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

【南朝】殷芸著,周楞伽辑注,《殷芸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郭嵩焘,《养知书屋诗文集》,新北:文海出版社,1966。

黄嫣梨,《蒋春霖评传》,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

黄嫣梨,《清代四大女词人——转型中的清代知识女性》,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

曹济平、马兴荣、吴熊和,《中国词学大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梁园棣、赵彦俞、郑之侨,《重修兴化县志》,刊于《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清康熙敕制,《全唐诗》,台北:艺文印书馆,1960。

清史馆编,《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98。

【清】曾国藩,《曾国藩家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

【清】谭献,《复堂词话》,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

【清】繆荃孙编,《续碑传集》,台北:明文书局,1985。

## 期刊论文:

朱惠国,〈论宋翔凤词学思想及其意义〉,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页77-82。

刘崇德、刘超,〈谢元淮年表〉,见《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页17-22。

【清】杜文澜,〈淮鹺纪略〉,见《近代史资料》,1987年第66期,页1-12。

余敏芳,〈宋代扬州词城市符号解读〉,见《现代语文》,2010年第12期,页56-61。

陈水云,〈咸丰、同治时期淮海词人群体综论〉,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6期,页824-830。

陈水云,〈蒋春霖研究史述略〉,见《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页46-51。

陈平原,〈文学的都市与都市的文学——中国文学史有待彰显的另一面相〉,见《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3期,页32-48。

陈桂清,〈考据与微言——宋翔凤的词学与经学〉,见《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页73-77。

林滢,〈《憩园词话》版本小考〉,见《剑南文学》,2003年第1期,页77、87。

黄光国,〈儒家关系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方法论基础〉,见《教育与社会研究》,2001年第1期,页1-34。

曹树基、李玉尚,〈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页33-44。

戴倩,〈词清笔婉 言外殊多感——杜文澜《采香词》二卷初探〉,见《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年第8期,页91-92。

### 学位论文:

邓昭群,《晚清梦窗词学之研究——以校刊、编选为探讨范围》,国立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2007。

黄琪雅,《杜文澜及其〈憩园词话〉研究》,国立中央大学硕士论文,2014。

刘超,《谢元淮词学研究》,河北大学硕士论文,2008。

李南,《宋翔凤年谱》,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1。

李献伟,《清代词人周之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

林滢,《杜文澜词学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

夏迎春,《〈采香词〉笺注》,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

颜妙容,《清代词学尊体之论述研究》,国立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论文,2004。

## 英文书目

### Books: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6.

- Bourdieu, Pierre, and Wacquant, Loïc J. D.,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Bourdieu, Pierre, *The Rules of Arts: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Casey, Edward S, *Remembering: a Phenomenological Study*,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 Cresswell, Tim,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2004.
- Halbwachs, Maurice, *On Collective Memories*, edited,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oser, Lewis A,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 Homi K, Bhabha,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 Leuthold, Steven, *Indigenous Aesthetics: Native Art, Media, and Identit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4.
- Owen, Stephen, *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Articles:**

- Hayden, White, "An old Question Raised Again: Is Historiography Art or Science", *Rethinking History*, 4.3(2000): 391-406.
- Barrera, Jos Carlos Bermejo, "Making history, talking about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40.2(2001): 190-205.